

K250.6
31
2:2

革命史资料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一·北京



4 · 829926

革命史资料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1981年9月第一版·1981年9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¹/₃₂ 印张：6³/₄ 字数：166,000
印数：1—30,100册 定价：0.75元
统一书号： 11224·44

目 录

骑田岭上瞻中原

——忆湘南暴动的一个片断

.....肖 克(1)

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

.....陈再道(7)

军调三人小组第二十六小组斗争记

停战之后——上校代表——艰巨任务——

第一回合——针锋相对——揭穿阴谋——

挤走汉夫——易里上校——话中有话——

内战爆发

.....李逸民(46)

一位卓越的红军指挥员

——忆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

.....黄松坚 姜茂生 磨力 李治平(65)

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

——记中央苏区保护山阵地战

.....邓克明(89)

向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工作的回忆

.....王亚文(99)

浴血奋进

——从郭村保卫战到黄桥决战

-张震东 (117)
- 马本斋同志在鲁西北张同钰 (142)
- 回忆北伐军团长蒋先云吴仲禧 (156)
- 董必武同志早年活动点滴吴家骥 (167)
- 忆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建的兴国模范县
.....周爱民 (179)
- 护送叶剑英、周恩来同志到苏区
.....卢伟良 (185)
- 夏曦同志牺牲的经过袁福生 (189)

专 访

肖劲光同志遭受王明路线迫害的一段经历

——访伍修权同志

-本刊记者 石肖岩 (191)

书 信

关于李汉俊

- 李书城致觉明的一封信..... (197)

关于瞿秋白烈士的资料

瞿秋白烈士被捕和就义经过

-宋希濂 (201)

我所知道的瞿秋白烈士就义前后

-高春林 (209)

騎田嶺上瞻中原

——忆湘南暴动的一个片断

肖 克

一九二六年春，我去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年春天，转到我党领导下的叶挺部二十四师，任连政治指导员。就在这年夏季武汉政府军队进军河南讨伐奉系军阀的征途中，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后，在南进中任连长。十月，起义军在东江失败，我流落广州、粤北，生活十分困难，但对革命毫不灰心，决心回湘南找党的关系。

在大革命时期，湘南十几个县，农民运动热火朝天，群众基础很好。这时，各地党组织已遭破坏，农民协会均被解散。广大农民群众把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仇恨隐藏在心头，他们渴望着革命的烈火重新燃烧起来。

我回到了湘南，急切地四处走访，寻找党的组织，终于找到了一个参加过大革命学生运动的老同学。双方都表明自己加入了共产党。他说，临武县有个地下党支部，中心在牛头汾，负责人是贺辉庭（贺于一九二九年被临武豪绅杀害），我便请他立即去牛头汾找贺辉庭同志联系。过了一天，他回来了，说贺辉庭同志欢迎我去和他们接头。于是，我们两人一起到牛头汾，经中共临

武支部研究决定，恢复了我的组织生活，这样，我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工作。

在临武支部，我参加了两次会。一次是在党员傅昌表同志家里。傅昌表后来到来阳参加了湘南起义，据黄克诚同志说，他在来阳县小水铺不幸牺牲。另一次会是在野外开的。我们研究了如何发展组织，扩大宣传和开展革命斗争。大约到牛头汾半个月左右，有一天，贺辉庭同志告诉我，宜章县的黄沙区有个以碛石彭家为中心的党支部，领导人叫彭晒，打进了地主武装，当民团团团长，掌握三十多支枪。他们派了个代表来与我们联系。当晚，贺辉庭带我到傅昌表家与碛石村来的同志见了面。来人叫彭暎（一九二九年二月在江西大柏地作战牺牲），中等身材，圆圆脸。他热情而小心地介绍了宜章碛石彭家和那一带的革命发展情况，还告诉我到碛石联络的办法：平时，可直接找承启学校校长吴汉杰（湘南起义后，长期参加革命战争，解放后在广东工作，已去世），他是我们的同志；如放寒、暑假，就到村里找“周攸华”，那是支部的联络代号。

不久，我赶回嘉禾老家，同南昌、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家和从长沙衡阳读书回乡的八名党员，互相串联，建立了嘉禾南区党支部，并推举曾在大革命时期在嘉禾办过农民协会又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党员黄益善同志（后参加湘南起义，曾任红四军连、支队党代表，四军军委秘书长，长征前牺牲）为支部书记，还通过临武支部告诉了碛石支部。于是，我们三个支部基本上串联起来了。

不久，听到朱德同志带领部队在宜章起义的消息，我们惊喜若狂。我得到支部同意，约了另外两位同志一同去碛石，参加宜

章的年关暴动。走了两天半，翻山越岭，终于到了碣石。碣石已在头一天宣布暴动，挂起红旗了。承启学校已经放假，我们就直接到村子里找“周攸华”。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知道。正好对面来了个三十多岁、气质不凡的男子汉，他询问我们：“你们找谁？”我说：“找‘周攸华’。”他惊疑地说：“我们村子里没有什么‘周攸华’。”我肯定地说有。他又问了其他的人，都说不知道谁是“周攸华”。他颇严厉地对我们说：“走！跟我走！”于是把我们带到一个有武装警卫的大房子里去了。里面有一个好象是负责的人接连不断地问我一些问题：“你认识‘周攸华’吗？”“在哪里认识的？”“找他干什么？”我把自己的姓名告诉他，并任意说周是我在衡阳的同学。他听了我的介绍和回答的语气，随即大笑起来，说：“算了，不用问了！”原来他就是彭晒同志（彭在湘南起义后参加红军，一九二八年七月红四军二十九团（宜章农民团）由井冈山回湘南溃散后牺牲），他早已知道我的政治态度。一会儿，彭睽进来了，我们虽然认识不久，也算老朋友了。于是一切释然。领我来的那位是周廷彦同志，他也是参加湘南起义之后上井冈山的，后来在赣南牺牲了。我们说明是来参加起义的，这样就和碣石支部接上了关系。第二天早上，我们见到彭儒、吴统莲（后改名吴仲廉）等同志，晚上，开支部会，支部书记彭晒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组织委员吴统莲把我们三人的组织关系正式接收下来。从此，我们便参加了宜章黄沙区碣石的年关暴动。根据支部决定，我担任了新成立的农民革命武装——独立营（后为二团三营）副营长（营长为彭晒同志）。因为队伍不多，只编一个连，我又是连长，彭睽是党代表。他们知道我在叶挺部队工作过，所以叫我主要负责军事工作。彭晒同志是全面领

导。彭燮同志为支部宣传委员兼任连党代表，他又是村农民协会委员长，主要管地方工作。彭晒、吴统莲同志经常到队伍中来讲政治课，教革命歌，支部在暴动中充分发挥了领导骨干作用。

我们把队伍整顿一下，就四处游击。附近大黄家有个恶霸地主，有武装，群众都恨他。我们乘夜包围，打死了大恶霸，使广大农民群众振奋起来。我们还协助各区、乡建立苏维埃政府，组织农民协会，宣传分田地，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把地主的田契、账本集中起来，当众烧毁，把打土豪所得的浮产分给穷苦的农民，只十天半月，整个黄沙区以及靠近广东边界莽山附近的农民都发动起来了，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

我们在宜章西南山区坚持了两个多月的革命斗争。此时，朱德、陈毅的部队正在郴州、耒阳一带，对湘粤两省国民党反动派威胁很大。国民党派湖南、广东两省军阀白崇禧、许克祥、范石生等，南北夹击，占领了宜章到衡阳的大道。工农革命军主力和宜章县委向东转移，我营因处于较偏僻的宜章西南山区，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就靠近白沙区梅田镇，和白沙区的领导人王政（区委书记，宜章人）、欧阳祖光（区苏维埃主席）领导的农民起义武装汇合。为统一指挥，合组为宜章独立营，男女老少五、六百人，枪七、八十支，梭镖三百多杆。敌军占领宜章城后，反动民团又占领了黄沙，逼近梅田。当时我们虽然力量薄弱，但士气旺盛，雨夜袭击了离梅田十二、三里地之敌，给了敌人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敌人增兵进攻，我们退到麻田村。麻田村是骑田岭南麓一个大村庄，松杉参天，地势较好。但敌人又从临武、梅田几路进逼，我们决定从麻田北面上山，登上了黄岑岭。黄岑岭是骑田岭的主峰之一，背靠岭海，瞩目中原。当我们登上山峰时，队

列里红旗迎风招展，梭镖倒插云天，战士们唱着嘹亮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当时，我曾写诗赞道：

农奴聚义起宜章，晃晃梭镖刺大天。

莫谓湘南侧岭海，骑田岭上瞩中原。

队伍在骑田岭地区活动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我们和上级领导失去了联系，又离开家乡，就象没娘的孩子一样，不知怎么办才好。我们几个领导人多方计议，认为现时毛泽东同志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正在宁冈、酃县（当时还不知道井冈山这个地名）一带活动，也估计到朱德、陈毅同志的部队和宜章县委及胡少海同志率领的宜章农民武装，一定东去。于是，决定向东。四月中旬的一天，在龚璠（朱德同志派到宜章西南地区做改造散兵游勇工作的同志，这时期同我们行动）、欧阳祖光和我的带领下（王政率少数武装及老小转回梅田地区坚持斗争，故未东行。彭晒不久前调县机关工作，也未随军），从骑田岭向东进发，经廖家湾、黄家湾下山，深夜从摺岭附近越过宜章至郴州大道，继续前进，登五盖山，向东下去，到达郴县三区，汇合了这里的农民梭镖队，一同向东。走了一天多，郴县三区的农民军，有不少的老小妇女，不利于行军作战，区委就带他们回去了。宜章独立营仍向东前进。

约在四月二十日左右，我们在资兴县东南三、四十里的龙溪洞地区，遇着毛泽东同志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毛部是应湘南特委的要求去湘南活动，打了汝城地区之敌，回师井冈山），久离上级的梭镖营，真象孤雁得群，大家都感到无比地高兴。这是第一个与毛泽东同志部队会师的湘南暴动的农民军。我们首先见到的

是一连长陈毅安同志（一九三〇年陈在红三军团当师长，第一次打长沙牺牲）。陈毅安领我们十几个同志去见毛泽东同志。走了几里，遇见师部派来的通讯员，他把我们领到前面村落中有几间铺子的小街上。通讯员大声招呼：“宜章独立营来了！”铺子两边许多人跑出来欢迎。我们问：“毛师长在哪里？”一个同志对我说：“这就是。”群众中一位身材较高大，满脸笑容的红军领导人过来和我们握手，他就是我们久已闻名的毛泽东。同他一起的还有师党代表何挺颖同志。毛师长亲切、详细地询问了我们的情况，并告诉我们：朱德同志的队伍大概向东去了。还把今后的行动方向告诉了我们，要我们一起行动。

宜章独立营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进到酃县、宁冈地区，找到了宜章县委和宜章农军领导人胡少海等同志，并编入由宜章农民军组成的红四军第二十九团。

从此，我们参加了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伟大的井冈山革命斗争。

陕 北 公 学 校 歌

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之地， 努力，努力，争取国防教育的模范，
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 努力，努力，迎接抗战胜利的曙光。
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 我们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
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 我们献身于新社会的建设，
忠诚，团结，紧张，活泼， 昂首看那边，
战斗地学习！ 胜利就在眼前！

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

陈 再 道

（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一场震惊中外的事件在武汉地区爆发了。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把这次事件诬蔑为“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的反革命暴乱”；把我和钟汉华等同志打成“策划‘七·二〇事件’的罪魁祸首”，武汉军民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七·二〇事件”平反后，钟汉华、王震、陈再道、王任重、陈丕显同志在一起（左起）

当时，外电纷纷报道：“武汉发生了反毛叛乱”，“陈再道上将曾有效地控制了武汉”，……时隔数年之后，我已经出来工作了，一些国外出版的刊物，仍把“七·二〇事件”说成是“陈再道扣留了谢富治和王力，发动了一次反对中央文革的‘兵谏’。”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党中央推倒了林彪、江青一伙强加于武汉军民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沉冤十一年之久的“七·二〇事件”得到了彻底平反，被颠倒的历史终于重新颠倒过来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作为这次事件的当事人，感到有责任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人民，有必要详细说一说“七·二〇事件”的真相。

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间，我因病在北戴河疗养。听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便给林彪写报告，说身体已经好了，可以回去参加运动。林彪很快同意了我的请求。路过北京时，我顺便去看望向前同志，说起了这件事情，徐帅对我说：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军区没有问题，“四大”一搞起来，问题就会成堆的。他（指林彪）是主张在军队开展“四大”的。当时我想得太简单，没有嚼出徐帅话中的味道。

回到武汉，短短几个月时间，形势急转直下。到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一月风暴”刮起时，我和钟汉华同志（武汉军区政委

员)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一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了在新的情况下稳定军队,稳定局势,与林彪一伙坚决斗争,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二十八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坏人”。并且对我们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我当时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二月初,我们的会议还在进行中,武汉和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却强行占领了汉口“红旗大楼”(长江日报社所在地)。二月八日,他们用《长江日报》的版面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以下简称《二·八声明》)。这篇声明唯我独革,充满了极左思潮,什么“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什么“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二月九日,他们又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接管的,造成一种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

《二·八声明》出来后,造反派到处冲杀,就连不同观点的群众也要进行批斗游街。二月十一日,他们竟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闹得乌烟瘴气。武汉军民对这种打砸抢的行为愤然不满,强烈要求武汉军区对《二·八声明》和二月九日社论表态。军区支

左指挥部的干部甚至要“罢工”，他们找到叶明同志（军区副政委），说：“军区再不表态，我们不干了！”

军区党委听取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于二月十八日发表《严正声明》，批判《二·八声明》中的错误观点，并且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战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军内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个《严正声明》，是武汉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表态性文件。发表这个声明，军区党委是慎重的，不仅交给司、政、后机关干部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而且报告了军委文革小组。徐帅当时是小组组长，他同意军区的表态。我和钟汉华同志也看过《严正声明》，认为发表它是完全应该的。

二月底，会议结束，周总理把我和钟汉华同志找去，要我们回去后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总理当时满怀忧虑地说：“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总理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八条命令以及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军委十条命令公布后予以释放）。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

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以上这些作法，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冲一冲武汉军区

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关注。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成员根据武汉和北航红旗赴汉的造反派提供的材料，于二月中旬起草，经王力修改并下令发表的。据这个监督组成员交代说：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因为这些地方压制造反派最厉害），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四月六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泡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

这两个东西一出来，军区很被动。十条命令公布的当天，武汉的造反派就到军区支左办公室贴大字报“挑战”。接着，他们违反中央的有关规定，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提出什么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揪出“武老谭”，为工总翻案，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武汉军区。

此前，我和钟汉华同志于三月中下旬离开武汉，再次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看到《人民日报》四月二日社论和十条命令，又听说武汉出现反复，我们非常恼火。一天小组讨论，我发言放了一炮。我说：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坚决拥护。但为了避免军队犯错误，建议中央文革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给各地派上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

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搞错。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接受指示也行。总之，既要把支左工作搞好，又要避免军队犯错误。发言记录整好后，秘书同志问我，要不要登简报？我想了想说：“登，提个建议嘛。”于是登了简报。“七·二〇事件”后，林彪的几员大将把我的这个发言说成是“公开扬言，妄图改组中央文革！”

四月十七日，秘书同志看到一份传单，印有江青四月十六日在人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的讲话。江青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觉得武汉的情况和成都不一样，问题没有成都那样严重，中央对武汉的情况不了解，应当汇报一下才好。请示总理，总理很快就同意了。

四月十九日，总理在钓鱼台主持会议，中央文革的成员全体参加，听取我们的汇报。江青不知从哪里听说武汉有五万人绝食，问我们有没有这回事，我们说没有这回事。江青马上向我们作检讨，说她听了一面之词，讲得不对。并且解释说：武汉的国民党渣滓很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的人留在武汉，插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很复杂……。在汇报过程中，中央文革其他成员都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最后，总理叫中央文革尽快接见一次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不要再冲武汉军区了。江青当即表示同意，并且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二十一日就接见他们。但她不参加，理由是她的身份不同，参加接见会抬高武汉造反派的“身价”。我们见江青这么郑重其事，当然高兴。

第二天下午，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江青送来当天的《文革快报》，内容是中央文革驻汉“记者”的“情况反映”，说武

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十九日会议的有关指示，问这些指示是否属实？江青在上面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晚上，我们查明情况，立即给中央文革写书面报告，说明我们确实给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十九日会议的要点，但传达时作了规定，不准再往下传达。记者听到的，不过是负责支左办公室工作的一位同志列席常委会后，回去给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的风，仅此而已，并没有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压造反派的意思。当然，事情没有处理好，我们有责任，接受批评。二十一日凌晨两点钟，中央文革又派肖华同志前来没收了我们十九日的会议记录，同时让肖华同志转告我们，不准再提十九日的汇报，二十一日日的接见也已经取消，中央文革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从这以后，中央文革“说话算话”，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一概不答复。

大概四月二十七日，会议结束。许多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接到通知，让他们参加“五一”庆祝活动，我和钟汉华同志接到的通知却是：会议完了，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百 万 雄 师

“五一”前夕，我和钟汉华同志回到武汉，这时，武汉地区各个群众组织已经分化为两大派。军区支左方向的正确与否，是争论的焦点所在。武汉和南下的所谓造反派，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武斗事件，甚至绑架钟汉华同志，慢骂、围攻和殴打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给武汉军区施加压力。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五

月十六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十七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地方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坚决反对对干部不加分析，一律打倒。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〇事件”发生前，已拥有一百二十余万人了，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武汉军区驻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我们从内心讲，也同情他们，只不过所处的位置不同，不能公开表态支持他们罢了。

与百万雄师相反，造反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人数越来越少了。我们从大局出发，仍然着重做他们的工作，采取各种措施保护他们，生怕把这批文化大革命的“闯将”搞掉了，交不了差。

六月四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大方向正确和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实行大联合。《公告》发表后，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对《公告》也不太满意，认为我们太软弱了。

卑鄙的手段

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之所以闹得这么凶，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策划操纵的结果。这件事情的内幕，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初步揭开。

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亲信交待：“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即不亲林彪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哪些人不亲林彪，吴法宪等人心中是有底的。五月份以后，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先后给武汉军区空军刘丰等人打了四五次电话，要武空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大军区跑。

四月份，中央文革派遣大批北京各院校的造反派到外地，以“调查”为名，进行反军乱军活动。北航红旗的几个造反派到武汉后，召集武汉造反派的头头们开会，说什么“武汉的谭震林，中央是饶不了他的。”这个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瞎说，事实上，中央文革和武汉的造反派头头就有着直接的联系。林杰、吴传启和戚本禹的秘书五月初先后接见武汉造反派的一个头头时说：

“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这是一场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需要把全国的老造反派统一组织起来。”“武汉的谭震林是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中央五月十六日要发文件点军内问题，这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借东风。要激化矛盾。口号要明确，一是要打倒陈再道，二是不要把张体学与王任重分开来提，三是要为工总翻案。”

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数是年轻幼稚的娃娃们）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

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电报发出之前，中央文革的一个“记者”把电报拿给武汉造反派驻京联络站的头头看，给他们打招呼，说电报是经过康生批准的，“中央”急需有关武汉军区的材料，希望他们大量收集，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

“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林彪在臭名昭著的《八·九讲话》中说：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文化大革命，让各种坏事暴露出来，把各种隐患诱发出来，问题就解决了。在这个讲话中，林彪既表白了他整武汉军区的一贯用心，也供出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时所采取的反革命策略。

林彪之所以对武汉军区不放心，事出有因，由来已久。早在延安时期，钟汉华同志负责审干工作，发现叶群参加过三青团。当时，叶群痛哭流涕，林彪也大发脾气，但钟汉华等同志坚持原则，据实给叶群作了结论。一九六四年军委讨论毛主席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我发言说：“主席的指示是一九六〇年战略方针（林彪主持制订的）在新形势和新条件下的重要补充和发展。过去的方针，今天看是有缺陷的，当时看也有缺陷，没有主席指示的全面，成龙配套。”我的发言有批评林彪“南放北顶”作战指导思想的意思，因此引起了一场“风波”。黄永胜等人对我进行围攻，硬说我把主席的指示和原来的方针对立起来了，是否定过去的方针，反对林彪。同年，叶群到广州军区搞调查，说什么大

比武是“拼凑尖子”，“弄虚作假”，“锦标主义”，“冲击了政治”等等，把大比武说得一无是处。许多同志认为要用“两分法”看待大比武。我也持这种观点，发言说：“大比武的成绩是主要的，主席看过大比武，没有说大比武不好。”叶群调查大比武，实际上是为林彪整罗瑞卿同志罗织罪名。我们讲公道话，当然得罪了林彪。一九六五年，林彪到武汉，我因在外检查工作，没有赶回来接他，而黄永胜却专程从广州赶到武汉来迎接林彪。相比之下，我对林彪实在有失恭敬。后来，我听其他同志讲，林彪在武汉大骂罗瑞卿同志，并且有所指地说：“你们武汉，有没有罗瑞卿？”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湖北省军区给武汉军区写报告，说要像修韶山那样修林家大湾（林彪的家乡），而且要把路修成能并排通行四辆大卡车的柏油马路。这个报告，我们压了下来，没有批准。说实话，我当时还是好心，害怕帮了林彪的倒忙。

这几件事情，我们没有违反党性，也不是什么非组织活动，但林彪却长期怀恨在心，费尽心机地要“把隐患诱发出来”。当然，林彪整武汉军区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打倒我们。他的主要目的，是要从武汉开刀，为“揪军内一小撮”制造口实，打倒一大批军队的负责同志，扫清篡党夺权的道路。

我是不打倒他的

接到中央文革六月二十六日的电报后，我们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做好赴京汇报的准备。七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七月十天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

决问题。我当时不便多问，以后才知道，改变计划是因为毛主席要巡视大江南北，并且要到武汉横渡长江。

七月十四日清晨，总理为主席打前站，乘飞机到了武汉。随同总理来的，有李作鹏和海空军的作战部长。中午，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带着北航红旗四名造反派也由重庆赶到了武汉。主席是晚上到武汉的，随行的有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和总参作战部的一个副部长。总理亲自为毛主席打前站，据说是想看看武汉的形势，究竟是不是象中央文革说的那样漆黑一团。另外，想通过武汉军区，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促进他们联合起来，稳定武汉的局势，为毛主席横渡长江创造条件。总理还设想，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会，把武汉问题解决好，这对于解决其它省的问题，对于稳定全国的形势，会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七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主席两次召集总理和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以及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谢富治、王力汇报云、贵、川问题和武汉问题，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主席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主席还让总理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军区的工作。

七月十五日开始至十八日，总理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和驻汉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同志开会，连续四天听取我们的汇报。这个会议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杨成武、余立金、郑维山以及李作鹏、刘丰和作战部长们也断断续续参加了。十八日下午，总理做了总结讲话，大意是：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但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

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作。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总理在讲话中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并且为军区承担责任，说我们解散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这个总结讲话的提纲，据说是总理亲自拟的，并且送主席审阅过。当时，我们没有体谅总理的难处，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总理苦口婆心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总理为了消除我们的顾虑，在汇报会召开之前，就告诉钟汉华同志说：主席临动身时讲了，要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七月十八日晚上，总理要赶回北京，临走之前特地带我们去见毛主席。主席一见我们就问：“你们怎么样啊？”我心事沉重又有点气鼓鼓地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席笑着说：“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我听主席这么说，心里踏实多了，赶忙回答：“要是犯了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作检查。”主席说：“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去开会，你一开会，就下不了台。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并且嘱咐我们：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做好了，思想工作做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题。我对主席说：

“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王力认为我这是在将他的军，满脸不高兴，气呼呼地说：“百万雄师就不听文革的！”主席明白我的意思，说：“他们要打倒你们，

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并且要谢富治和王力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思想工作。主席说：“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段话，也是当时讲的。

大约十点多钟，我们告辞出来，主席把我们送到走廊上，招呼几位服务员和我们握手，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员



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接着又对我们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我们和服务员同志握手时，都忍不住笑起来了。

疯狂的破坏

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为恐慌。七月十三日，总理决定到武汉，中央文革不通知武汉军区，却由吴法宪通知刘丰，说夜里有一架一级专机要到汉口机场降落，让刘丰等人作接机准备。专机具体什么时间到，

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刘丰把总理接到武空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七月十三日，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还两次打电话给刘丰，要刘丰把空军某部王新（原政委）等人立即召到武汉。更令人奇怪的是，与解决武汉问题和保卫主席安全没有丝毫关系的江腾蛟，也从南京窜到武汉。

李作鹏等人以及总参和海、空的作战部长们到汉，据说是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是经过主席、总理同意的。这里面有没有林彪的预谋，很感到怀疑。他们在王家墩机场开设了“三军”指挥所，给林彪搞阴谋活动提供了条件。刘丰根据林彪、吴法宪的意思，竟背着总理，私带电台、保密机和总理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七月十六日，谢富治、吴法宪还布置空军那个人召集武空刘丰和王新等人开会，让他们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和钟汉华。

本来，总理是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七月十三日夜里，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在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总理考虑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造反派听文革的，让他去也好，可以帮助做造反派的工作，于是同意了。但是他们到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他们而且指定要让刘丰带路。王力在车上问刘丰：“你们空军的观点，是不是和军区一样？”刘丰一时不知怎么回答，空军那个人帮助说：“有不同意见。”在湖北大学门口，谢富

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七月十五日，武汉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并把他们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武汉军民包括高级干部一时都被弄糊涂了，他们深怀疑虑：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

在四天的汇报过程中，谢富治和王力一付凶相，态度极为蛮横。凡是不合他们口味的，我们讲一条他们驳一条。谢富治说：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百万雄师坏。三钢三新揪“武老谭”，是把矛头指向当权派，大方向是对的。你们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不转变，你们自己考虑。我们当时不知道主席在汉，也不知道主席和他们议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所以和他们顶得很厉害。记得在我们要我们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时，有人插话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韩东山同志当即反驳：“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话不能简单地对下面讲，要说出个道理来。”谢富治听了这话，眼睛都瞪直了，他恶狠狠地说：“你反对林副主席！”七月十六日，即汇报会的第二天，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认为他们一定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早已经定好了，汇不汇报都是一个样。决定起草检讨，反正早晚要用。

谢富治和王力公开身份后，总理无可奈何，只好让他们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做工作。七月十五日和七月十六日夜里，谢、王到造反派的据点，登台接见并发表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慰问和支持他们。七月十七日夜里，谢富治和王力一行跑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谢富治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们”的名单。名单开好后，谢把名单装进了口袋，就一句话也不说了（七月二十七

日，名单上的十三个人一齐被逮捕，其中八人一直被关押到一九七二年才被批准“保外就医”）。这时，王力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王力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百万雄师的同志不客气地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

第二天，百万雄师总站向所属组织传达王力的指示。不传达还好，一传达群众都跳起来了，坚决不同意王力的讲话。

“七·二〇事件”发生的前几天，王力还多次和北航红旗造反派谈话，说什么中央要对武汉问题公开表态，百万雄师和四川产业军是同类型的保守组织，搞武斗厉害的头头要处理。陈再道问题严重，六七年还在保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人民内部矛盾，支左又犯了路线错误，要公开作检查。武汉问题这么严重还算好的，其它省的问题更严重，主要是军队的问题等等。七月十六日和七月十九日，王力两次把主席在武汉的谈话记录拿给这些人看。这些人不仅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给武汉造反派，而且卖力地兜售王力的黑货，进行煽风点火。武汉造反派则到处张贴大字报和大标语，表明谢富治、王力是支持他们的。

谢富治、王力的倒行逆施，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引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反感。七月十七日，百万雄师有针对

性地贴出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喇哇喇！”“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七月十八日，标语口号又点出了王力的名字，要他下连当兵，到工农群众中去。

七月十八日夜里，主席和我们谈话之后，谢富治和王力带着刘丰等人，到机场送走总理，随后直接从机场溜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总理离开了武汉，谢富治和王力更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佩戴着造反派的袖章，视察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致伤人员，并先后在大会上讲话。王力疯狂地喊道：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王力讲完话，谢富治又要刘丰等空军负责人挨个“亮相”。过去埋怨抓人抓得太少，要“多抓几个造反派”的刘丰，此时摇身一变，说自己是小学生，支左犯了错误，希望造反派帮助纠正，以后要坚决和造反派站在一边等等。

谢富治、王力这天晚上的活动，成为爆发“七·二〇事件”的导火线。

第二天，七月十九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听到这些，武汉军民肺都气炸了。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一篇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

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有理，还是有罪？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一场反击林彪路线的革命壮举即将发生了。

百万雄师过大江

七月十九日，我们按照预订的计划，上午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通过我和钟汉华同志的检讨；下午三点多钟，又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请谢富治和王力出面做工作。王力开始说他不讲话，但谢富治讲完后，王力又说他要讲话。王力用教训人的口吻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象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王力从一九六五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讲起，一直讲到六七年军队支左。胡说什么武汉的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的前身）是陶铸的官办组织，是用来破坏工人运动的。而工人总部则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点燃了武汉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烈火，要大树特树工人总部。还胡说什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军区看不到这一点，因此发表《二·一八声明》、《三·二一通告》，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力滔滔不绝，一直讲到夜里十一点多钟。而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开始行动了。晚饭后，省直机关的干部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到军区大院门口，要求谢富治和王力接见他们，回答问

题，并且解释清楚，王力到水院他的“四点指示”，究竟是什么意思，用心何在？

散会后，我和钟汉华同志送走谢富治和王力，赶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朱鸿霞、胡厚民等人。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犯了错误，感谢宽大。正是这个时间，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起来“造反了”，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报的消防车一起涌进军区大院，他们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凭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军区机关干部的家属子女纷纷端茶送水，慰问他们，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

事情一发生，军区领导同志即赶到现场做工作，同时告诉王力，说百万雄师听了他在水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占领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军区领导正在做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团也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还有扩大的可能。王力听说后冷笑几声，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既不叫醒已经睡觉的谢富治，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大约拖了两个多钟头，北航红旗那几个造反派的再三要求，王力才叫醒了谢富治。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到了东湖宾馆，无法扭转局势了。

七月二十日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师就冲进来了。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而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谢富治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两百多名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在我们四周。我是第一次和百万雄师“谈判”，谈的结果很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他们也答应先回去。

王力看见这个情况，壮壮胆子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多数是独立师和二十九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成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王力赖着不走，北航红旗几个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风，气势汹汹地辱骂他们。他们忍无可忍，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谢富治有块老干部的牌子，他们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总理的住处离谢、王的住处仅隔百米左右，他们连去都没有去，主席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和事后检查，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迹象。这就是所谓的“七·二〇事件”的真相。林彪、江青一伙说“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怀着险恶用心的无耻捏造。

这天上午，主席叫我们把王力找回来，我因有伤，又考虑到主席的安全，因此，留在东湖。钟汉华同志赶到军区大院，和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同志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同时又不能讲出毛主席在武汉，放王力是毛主席的指示。磨到中午时分，钟汉华、叶明、孔庆德等同志设法将王力悄悄地弄出来，转移到二十九师师部的六号楼。六号楼位于小洪山北侧，紧挨着军区指挥所，周围是部队的营区，比较安全。当晚，叶明、韩东山同志准备再次把王力转移到更完全的地方，却发现王力“失踪”了。

就在七月二十日这天，武汉军民一起涌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工人、农民和驻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地进行游行示威。机关干部和学生们的游行队伍，也象江水一样

滚滚而过。他们张贴标语，高喊口号：

“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

“打倒王力！”

“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

“欢迎周总理到武汉！”

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武汉军民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音喇叭反复播放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正直勇敢的武汉人民以为，这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一定能够引起中央的重视，从而采取正确的方针解决武汉问题。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样的做法，恰恰是林彪所希望的。

危言耸听

七月二十日上午，事件刚刚发生，林彪便亲自写信给毛主席。当时周总理在北京，但林彪不找总理，叶群叫秘书把信送给戚本禹修改，并特别交代秘书要告诉戚本禹，这封信是林彪的意思。戚本禹看了信，觉得“这是大事”，不敢作主，于是找到陈伯达和关锋一起修改，最后，落款又不知怎么签上了江青的名字。林彪、江青勾结一起，派邱会作和张春桥分别乘专机飞往武汉和上海。邱会作临走时，江青交代他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邱会作把这封信放在贴身的汗衫内，于下午两点十分赶到了武汉。张春桥也于下午四点二十分赶到上海，安排“迎接”毛主席。

邱会作到武汉后，立即和主席身边的人“商量”，决定把主席转移到上海。五点多钟，邱会作见到毛主席，邱说：林彪、江青派我来送信，叫我把信亲自交给主席。外面形势不好…，林彪和江青耽心主席的安全，请主席转移，另给林彪、江青回个信，哪怕几个字也好。主席边看信边笑，将信将疑，走不走，走，到哪儿，到长沙，到上海，还是到南昌？没有下定决心。延至晚上八点多钟，主席同意去上海。二十一日凌晨两点钟，主席坐空军的汽车，在刘丰等人的“护送”下，绕道前往王家墩机场。到机场后，邱会作再次向主席讨回信，主席问他：为什么要转移？又说：想游泳，现在看游不成了。不写信，你回去同林彪、江青说说，就这么办！林彪、江青给主席的信写的什么内容，从来没有清查过。一九七四年，张春桥在京西宾馆的一次讲话中不打自招地供认说，主席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觉，把张春桥等人叫到身边。主席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我在那里，为什么不和我通气呢？我想，毛主席对林彪、江青是存有戒心的，如果没有戒心，不论书面还是口头同意林彪的“兵变”之说，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七月二十日，总理听说武汉发生百万军民反对王力的游行示威，即决定重返武汉。下午三点五十四分，总理乘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行途中，吴法宪造谣欺骗总理，说王家墩机场不能降落，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机场，要劫总理。同时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说：“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研究时军区有人参加，要不消息怎么传出去的！请向一零一（即林彪）报告一下”。吴法宪把总理坐的飞机调到离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降落。总理下飞机时，林彪和吴法宪指使王新等人

以反“兵变”为名，紧急调动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机场，一片刀光剑影。总理不以为然，把秘书和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同志以及两个中队的警卫部队丢在山坡机场，仅带着两名卫士，乘汽车赶往武汉。总理到武汉比邱会作晚了八九个钟头，主席已经决定去上海了。

总理一到武汉，就叫孔庆德和牛怀龙同志（独立师师长）把王力找回来。并让孔庆德同志通知百万雄师，派一百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代表坐一架飞机（由于林彪插手，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七月二十一日，总理又叫我们去找王力，一心想把局势稳定下来。

王力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七月二十日下午，叶明同志担心再次把王力抓走，不好交差。便叫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当时在军区大院）回去，万一情况紧急，先把王力带进指挥所藏起来。

谁知张昭剑为了邀功请赏，达到政治投机的目的，竟哄骗王力说，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隐瞒了他所在的二十九师参加揪王力的事实）是搞“暴乱”，现在已经包围了二十九师师部，外面的喊声就是抓王力的。

王力吓得屁滚尿流，跟着张昭剑，在小洪山上连滚带爬，一直躲到第二天。

王力在山上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有组织，陆海空三军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就是百万雄师。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尤其卑鄙的是，张昭剑竟然对我们封锁消息。七月二十一日

上午，总理叫我们找找王力，我们派人找到二十九师，师参谋长根据张昭剑的交代，只说王力在安全的地方，不告诉他们的具体情况。我们觉得二十九师这样做十分反常，便向总理作了汇报。

刘丰不知怎么得到王力在二十九师的消息，他中午窜到二十九师。一去就冲着张昭剑大骂武汉军区，说：武汉军区这窝子都是些什么人？你张昭剑不要奴隶主义！你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陈、钟的？善于投机的张昭剑说：“我听空军的。”刘丰把王力转移到武空司令部，王力要刘丰“采取彻底革命的方针，特别对人武部要采取彻底革命的方针，要创造一个革命的大军区！”

七月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多钟，王力在李作鹏、刘丰的护送下到达山坡机场。清早，刘丰打电话给吴法宪，说他亲自把王力接出来，转移到山坡。武汉情况紧张，电话里不敢讲。与此同时，武空也向吴法宪报告，说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独立师全付武装，坐着卡车、摩托车，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等等。吴法宪接到这些电话后，都迅即报告了林彪。

这天上午，总理在王家墩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同志和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总理让叶明、孔庆德同志住到二十九师，暂时主持军区的工作。并且让他们转告我和钟汉华同志，要赶快表态，争取主动，这样他才好说话。总理还说，武空仍是双重领导，要听军区的话，不能随意表态。总理在谈话中没有责备军区。

但是，总理的话，李作鹏和刘丰等人根本不执行。当天，李作鹏叫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汉单位发电报，说“七·二〇”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甚至指使在武汉保卫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军舰发表《严正声明》，恶毒攻击和诬蔑武汉

军民，《严正声明》杀气腾腾地说：“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吴法宪和刘丰串通一气，说空军要对“七·二〇事件”发表声明，打倒陈再道。总理发现制止，他们不仅不听，还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林彪。七月二十三日，刘丰从吴法宪那里听到消息，马上打电话给张昭剑说：“武汉军区问题大了，不是一个陈、钟问题，‘七·二〇’是林彪派邱会作来处理的，武汉军区有鬼！”张昭剑听了这话，立即宣布二十九师脱离武汉军区，并且扬言要把军区领导同志“统统打倒！”尤其狠毒的是，张昭剑对抗总理的指示，把叶明、孔庆德同志赶出二十九师，以致叶明同志几乎被打死！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回北京，林彪、江青组织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他们。本来，总理坐的飞机比谢富治和王力坐的飞机晚起飞半个小时，但林彪、江青为了扩大声势，却让总理坐的飞机提前降落，逼总理参加他们搞的欢迎仪式。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听取谢富治的汇报。谢富治汇报后，林彪决定：把“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七·二〇事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的名义调陈、钟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不敢来，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林彪的决定，把总理处理“七·二〇事件”的打算全部推翻了。会后，林彪又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处理武汉问题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之后，先经中央文

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需要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关锋第二天对王力说：林彪之所以要采取这样非常的措施，不是为了欢迎你们回京，而是为了毛主席被迫离开武汉。阴险狡诈的林彪，明明是自己胁迫毛主席离开武汉，反过来却把罪名加在我们头上，用主席的名义来打击敢于反对他的武汉军民。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中央文革对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武装游行），声讨“七·二〇事件”，开始了一场对武汉军民空前规模的舆论围剿。

进 京

七月二十二日早上，我想请示一下总理，看总理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办。总理住处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说：主席已经走了，总理也离开了东湖。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三点钟，我们收到了林彪以中央名义调我们进京“开会”的电报。五点二十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三遍播放谢富治和王力“胜利回京”的消息。尽管如此，武汉军民声讨王力的游行队伍还是连绵不断。当二十九师师长率领两卡车战士护送我们去机场时，见战士们佩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振臂高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一路上通行无阻，顺利地到达了机场。我们到了之后，牛怀龙、蔡炳臣（独立师政委）、巴方廷（武汉市人武部政委）和其他进京“开会”的人也陆续到达，一

共是十五人。刘丰这天进进出出，发号施令，已经俨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他规定我们不准离开屋子，并且召集我们的秘书、保卫干事开会，要他们和我们划清界限，对我们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实际上是把我们软禁起来了。

七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多钟，我们飞抵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总理交代宾馆的工作人员：要严守纪律，注意保密。为了保护我们，总理还下令给京西宾馆增派了警卫部队。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又策划了新的阴谋。我们一到，吴法宪就找到刘丰，对他说：“你们这次要旗帜鲜明，狠斗他们！”上午，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我们刚住进京西宾馆，造反派就知道了，并且冲了进来，这显然是有预谋的行动。傅崇碧同志派人把我们藏进电梯，熄了灯，让电梯悬在半中腰。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问傅崇碧同志，这样保不保险，有没有办法叫造反派退去？傅崇碧同志说：造反派不听我的，我没有办法了，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总理找到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负责保证我们的安全。总理声色俱厉地对谢富治说：“我不管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代！”谢富治一出面，造反派很快就撤走了。总理这天上午还打电话给吴法宪和戚本禹，要他们分别去做三军造反派和文艺口造反派的工作，不要冲击京西宾馆。戚本禹接到总理的电话后，马上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总理的指示不好办！”根本不做工作。而吴法宪则告诉总理，说他接到电话后，找了三军造反派的头头，做了工作，但三军造反派不仅不同意总理的意见，反而要求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等人交给三军造反派批斗。

其实，吴法宪做工作是假的，耍花招才是真的。文艺口造反

派撤出京西宾馆后，三军造反派就立即包围了京西。三军造反派的行动是林彪派叶群到京西宾馆找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串连”布置的，叶群要求三军造反派包围京西宾馆，“插红旗、占位子，静坐游行示威，连续搞它几天。”还要求他们到处张贴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揪“黑后台”徐向前的标语口号。为了给三军造反派鼓劲，叶群让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加三军的游行示威，甚至亲自出马，邀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绕京西宾馆游行，表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欢 迎 大 会

七月二十四日，我们到京的当天晚上，中央文革根据林彪的“第二步骤”，开会研究关于“七·二〇事件”的报刊宣传口径。中央文革决定：一、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点出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会议还决定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召开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和出席大会的人员名单。会议情况书面报告了林彪。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钟，离大会开始只剩下两个小时时间了，林彪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江青、陈伯达、关锋、姚文元表示“拥护”林彪的意见。江青和陈伯达说：林彪的意见“十分英明”，请林彪“一定参加”。关锋甚至建议，为了“壮大声势”，应请在京汇报的黄永胜、冼恒汉

等人也参加大会，而“住西山的那一位（指叶帅等）就可以不参加了。”林彪对关锋的意见非常赏识，夸奖他说：“关锋同志的意见很好，应当壮大声势，并使这个声势扩大到全国去。”果然，这天下午的大会，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没有参加。

下午四点多钟，林彪爬上了天安门，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派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作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大会进行中，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行动如此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王力连连点头，回答说：“就是，就是。”在谈话中，王力表示对叶、徐两个老帅和南京、福州军区很不满意；蒯大富又问王力：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蒯大富还留心观察了林彪，看见林彪对“打倒陈再道”和“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都举手赞成。

第二天，蒯大富和韩爱晶联合召开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两总部会议，传达林彪、王力的指示。清华造反派为了“揪军内一小撮”，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和各地造反派驻清华的“联络总站”，准备大干一场，迎接林彪文化大革命“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阶段”。据蒯大富交代，他们当时分析：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〇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把反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为

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蒯大富等人的分析，完全切中了林彪分裂军队的反革命目的和篡党夺权的罪恶野心。

指鹿为马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们接到通知，说下午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通知称我们为同志，并附有中央复电的全文和主席的批语。批语说：“林、周及中央文革，拟复报如下，请酌定。”复电共五条，其中第二条，主席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二字，内容是：“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毛主席称我为同志，使我深受感动，当时如果没有这两个字，林彪要整死我们是很容易的事情。

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名义上是讨论问题，实际上是斗争我们。会场有意布置过，武汉军区的位置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我和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指定在第一排“就坐”，但只准站着，就和接受审问一样。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会议开始，谢富治首先发言说：“七·二〇”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谢富治讲完，吴法宪发言。这天早上四点多钟，叶群打电话

给吴法宪，要他开会之前同张秀川串连一下，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帅，同徐帅划清界限，让徐帅对“七·二〇事件”表态，把揪徐帅的“旗帜”抢到手，不要为三军造反派抹黑。吴法宪受到指使，气势凶凶地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关系，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在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吴法宪的话完全是信口胡说，总理三次打断他的话，要他讲主要的，但他仍然滔滔不绝，并攻击徐帅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帅听到这里，气愤地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说完，徐帅写了张条子递给总理，忿然离开了会场。据说陈毅和谭震林同志没有发言，也是中途离开会场的。

会上，我申辩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吴法宪不等我把话讲完，领着刘丰和几个打手冲过来，扒掉我们五个人的领章帽徽，拳打脚踢，不许我们讲话。会议中间休息时，受到指使的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对我们进行武斗。总理在休息室听秘书周家鼎同志报告后，气愤地说：“真是荒唐！”并且跑着赶了过来，想制止他们，但这时人已经溜掉了。总理后来批评吴法宪搞武斗不对，而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

派的精神。”中央常委的扩大会议搞武斗，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会议从中午开到吃晚饭，吃过晚饭又接着开，我低头弯腰地站了六七个钟头，实在支持不住。我看见康生坐在那里不讲话，心想，康生年事高，又是文革顾问，和他讲讲，也许能让我们坐下来，于是喊：“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六十岁的人了，念我革命四十年……”话没说完，康生脸一变，恶狠狠地训道：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说着又逐条解释那个有五条内容的电报，经他解释，我比反革命还要反革命，主席称我同志的意思也完全变了样。康生和江青还一唱一合，说党里有坏人，军队里也有坏人，张国焘、彭德怀、罗瑞卿就是坏人，是解放军的败类。陈再道煽动部队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中央、中央文革，也是解放军的败类，是解放军的奇耻大辱等等。林彪的几员大将和江青的几名走卒在会上也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所有到会的人都必须发言，表明自己对“七·二〇事件”的态度。

按照毛主席的批语，是用不着开这样的会进行“讨论”的。林彪、江青开这个会，目的是要指鹿为马，进行一次政治测验，看看党内军内谁敢再反对他们的极左路线，谁要是反对了，其下场就和陈再道等人一样，“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阴 谋 得 逞

“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江青预谋已久的反革命方针，是

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六七年一月十日，“一月风暴”前夕，林彪就在关锋、王力等人“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上批示“完全同意”。接着，他又让林立果写“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让吴法宪“把要揪的人的名单和材料交给在北京串连的军队院校的学生，由学生们去揪。”妄图在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的同时，再打倒一大批军队的负责同志，把党政军大权统统夺到手。林彪、江青一伙从有意给武汉军区出难题到“诱发”“七·二〇事件”，就是为了实现“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反革命步骤。

七月二十二日，王力在回北京的飞机上对北航红旗的造反派说：“这下子，要抓住武汉事件解决‘军内一小撮’问题了。”同一天，林立果之流“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署名“红尖兵”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声讨“七·二〇事件”和“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闻、社论、评论、文章、图片连篇累牍。从七月二十六日开始至八月二十八日为止，《人民日报》就发表和转载了二十二篇社论，其中有一天竟登了四篇之多，整版都是社论。中央文革还要求新影等制片厂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拷贝”把《北京支持你》搞出来。八月六日，这部纪录片用专机送武汉首映。所有这些，在我党的新闻史上是从来未有过的。

七月二十七日，林彪、江青一伙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敢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信中诬蔑我们和武汉人民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了我和钟汉华同志的职务。刘丰连升三级，当了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八月八日，林彪、江青一伙用专机把武汉造反派的头头们和新到职不久的刘丰等人接到北京。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吴法宪和黄永胜等人两次接见他们，进行谈话。据他们整理的《中央首长接见武汉造反派代表讲话纪要》，这些“中央首长”说：“武汉出现了反革命叛乱，矛盾暴露的充分，武汉军区和专政机构的问题都是在这场大风暴中彻底解决了。”“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武汉的‘七·二〇事件’是个分水岭，它检验一切组织，一切人的政治态度。”“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从七月二十一日开始，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和王力等人还到处发表关于“七·二〇事件”的讲话，提出“文攻武卫”、“砸烂公检法”和“改组人武部”等其它反动口号，各地小报则大肆宣传，疯狂地煽动“揪军内一小撮”。

七月三十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一个有各地造反派一百多名头头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蒯大富在会上传达了林彪和王力在天安门上作的黑指示，说：现在要解决军内问题，全国都要注意这个新的动态。同一天，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也

在武汉传达王力、关锋的黑指示，说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地方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来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第三个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中央用这么大的决心，这么大的气魄处理陈再道制造的“七·二〇事件”就是这个转折的标志。武汉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拉开了序幕，吹响了进军号。八月二日，中央文革接见武汉造反派一个坏头头，要他们向各地派人，介绍和推广他们与军内走资派作斗争的经验。据这个坏头头交代，武汉造反派先后派出了几万人，在全国各地冲击军队，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

这场“揪军内一小撮”的反革命浪潮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徐向前、徐海东、王任重、彭绍辉等同志被打成“七·二〇事件”的“黑后台”，徐帅和徐海东同志的家多次被抄。许多军队负责同志被批斗监禁，惨遭迫害，甚至连一些公社和大队的人武干部、民兵干部，也被打成“陈再道式的人物”，不能幸免。湖北、河南因为“七·二〇事件”大揪“四个一小撮”（党内、军内、公检法内、百万雄师内），后果就更为严重了。独立师被打成“叛军”，林彪亲自下令取消番号、代号，撤离武汉整训改编。在东湖宾馆多年担任警卫毛主席任务的部队，竟被刘丰、张昭剑等人武装押送到农场。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在“七·二〇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十八万四千余人，仅武汉市就打伤打残六万六千多人，打死六百多。如果算上林彪、江青一伙在一九六八年、六九年挑动造反派之间进行武斗的伤亡人数，那就更加骇人听闻了。

八月九日，林彪针对武斗升级、“全面内战”的局势，总结

出“打”的“四种情况”（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好人打坏人），说什么“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是最大最大最大”，否则，“反动的东西就不能暴露”。林彪、江青一伙愚弄和残害干部群众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一九六七年，林彪、江青一伙先刮“一月风暴”，后“揪军内一小撮”，打倒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阴谋得逞之后，他们又借成立“革命委员会”和召开党的“九大”的机会，把一大批死党、亲信和打砸抢分子安插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在组织上形成反革命帮派体系，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场持续多年的空前浩劫。

丢车保帅

中央文革在开会研究“七·二〇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生对“揪军内一小撮”叫得最凶。康生说：“为什么不能提军内一小撮？”第二天，也就是七月二十五日，康生告诉王力，说他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了毛主席（在上海），毛主席同意开“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八月一日《红旗》杂志两篇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关锋主持起草，王力看过以后由陈伯达签发的。八月中旬，毛主席批示，说这两篇社论是“大毒草”。同时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要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划掉了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并且批示：“不用。”退给了林彪。消息传来，林彪、江青一伙慌做一团。叶群把毛主席退回来的文件，悄悄地锁进保险柜。然后叫林立果给江青写封信，说“红尖兵”文章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原来是没有的，后来有是别人加进去的。江青和康生则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说

社论是陈伯达签发的，主要怪陈伯达。八月下旬，毛主席要追究责任。江青说：不能错误人人有份，不能怪陈伯达。把责任都推给王力等人。康生更是出尔反尔，赖得一干二净，他说请示毛主席时，毛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根本就没有同意过“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揪军内一小撮”是王力等人私自提出来的。就这样，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串通一气，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打成“变色龙”、“小爬虫”，关进了监狱。小野心家、阴谋家罪有应得，大野心家、阴谋家却蒙混过去了。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期间，江青在广州见到钟汉华同志，她恬不知耻地说：“我对不起你，我也是上了林彪的当，他是副主席，他上了天安门，我也跟着上了天安门。林彪当时是想一箭双雕，通过‘七·二〇事件’，既打倒陈再道同志，又谋害毛主席。请你转告陈再道同志，向他道歉。”江青以为，用这几句话，就可以把她和林彪互相勾结的一段肮脏关系一笔勾销。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不干好事的人，那怕把自己说得再清白，也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结 束 语

一九六七年“七·二〇事件”是人民群众起来反对林彪、江青之流的革命行动，它遭受了残酷的镇压。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原因很多，但归根到底，是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制度太不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太不健全。经过十年浩劫，我们的党和人民有了血的教训，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了，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愚弄人民、残害人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有了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是一定能够成功的!

最后还必须说明一下,我在本文里点到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其中除极少数像朱鸿霞、胡厚民这样的坏人外,大多数群众在当时是受蒙蔽的。我希望并且相信,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湖北人民,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

抗日战略座谈会上的斗争

一九三八年,长沙中苏友协负责人翦伯赞先生在该会召开了一次抗日战略座谈会。

座谈会开始,翦伯赞先请国民党陆军大学盛某讲述,那位姓盛的一开始就摆出一副战略教官的姿态,滔滔不绝地说什么克劳塞维茨说的,持久战要有一个强大的战略后方,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最后结论说到蒋介石是怎样的英明,从抗战开始就把首都放在重庆,把四川作为大后方。这一简单的内容,他不厌其烦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接着翦伯赞请徐特立同志讲话。徐老一开始就说,我们八路军在东北、华北敌后打游击,从来没有什么前方后方,有敌人的地方都是我们的前方,有人民群众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后方……刚说到这里,那个姓盛的教官竟用手掌拍着桌子说:这是什么战略,是放屁!徐老沉着冷静,据理驳斥他:不是吗?我们八路军靠人民群众,用此等战略战术牵制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日寇兵力,也才保卫了你们的蒋先生安然住在重庆吗?!

(胡大愚)

军调三人小组第二十六 小组斗争记

李逸民

(全国政协委员 总参政治部顾问)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停战协定在重庆签字以后，三人小组



李逸民同志近影

决定在北平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部的三个委员是我方叶剑英，国民党方面郑介民，美方罗伯逊。在三委员下设执行小组，执行小组是军事调处执行部在中国广大地区执行任务的主要人员。四六年三月以后，我曾在朝阳地区第二十六小组任我方代表，亲自看到了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的罪行，也看到美帝国主义借调停为名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

停 战 之 后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停战协定正式生效以后，冀热辽地区

在军事上暂时处于稳定，但是从许多迹象来看，国民党在积极备战，偷偷调动部队，冀热辽军区的所在地承德也很不安全。当时我正在军区政治部任宣传部长。

由于停战，我们党内和干部中的一些同志和平思想日趋严重，记得当时还给懂外文的同志发了一张表，说准备让到南京去当外交官，给我也发了一张，我没有填，我说：“我当不了外交官，也不想当。”当时心里比较闷，不安心于在承德工作。不但我，许多干部都不安心，还有一批游击干部，认为和平已经到来，可以回家种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要做好工作也不容易，同时又感到全国胜利是没有问题的。我和胡耀邦、吴子立、邱会作四人都是南方人，就想去南方新四军部队工作，以便全国胜利后在老家干。在走以前，我们都想到北平看看。

三月，我们四人去向冀热辽分局请假，要求到北平看一看，书记程子华同志同意了。当时承德就有军事调处第十一小组（我方代表段苏权），所以美国提供给执行小组用的飞机常来承德，我们就搭美国飞机到了北平，住在翠明庄招待所。

上校代表

一天，我上二楼去看李克农的秘书冯铨，在楼梯口正好碰上执行部我方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带着十几个青年去看电影。他一见我就说：“哟！李逸民，在这里又碰上了你，你怎么来的？”我说：“坐美国飞机来的。”罗问：“来几个人？”我告诉了他，并说是来北平看看，然后准备请示去南方新四军部队工作。罗说：“来北平看看可以，现在我去看电影，你别走了，十点多钟我让警卫员来叫你，有事跟你谈。”

十一点左右，罗看完电影回来了，把我叫到三楼他的房间里，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你们谁也不能去南方，他们三个还得回承德去，你留下，准备到执行小组朝阳第二十六小组任我方代表。”他向我介绍了二十六小组情况，美方代表是汉夫上校，国民党方面是姓马的上校（忘其名），所以我也是上校衔。

我当时还不懂上校多大，罗说：“上校就是三颗星，你今晚就打扮起来，明天在协和医院开会，这就算到职了。衣服、日用品你去找我的秘书。”

谈完话出来，我赶快去找罗的秘书，秘书说：“二十六小组没有我方代表，所以罗让你去，你现在到东安市场买一副上校白牌牌，再买一点日用品，我给你找一套料子服。”并给了我五元钱。我立即到东安市场买来了白牌和牙膏、牙刷、肥皂等日用品。罗的秘书给我弄了一套毛哔叽军官服，弄了一顶大盖帽。打扮起来后，他上下看了一下，说：“蛮像国民党军官，你就穿这套衣服，还要有一套换洗的，以后再给你找。工作怎么开展，李克农同志会找你谈的。”

第二天，我穿上那套衣服去找李克农同志。他见是我，开口就说：“你这个李逸民，怎么又搞起执行小组来了？”我说：“是罗瑞卿同志让我搞的。”他说：“好好好，快坐下。”他又很快看了一下我说：“你应该懂得礼貌，进房应该把帽子摘下来。”我赶快把帽子摘下抛在一边。

艰 巨 任 务

李克农同志向我布置任务：“二十六小组是新成立的，驻地在朝阳（朝阳地区原归十一小组管），你的任务一是监视国民党

部队不能进朝阳。另一个任务比较复杂，原任十一小组我方代表陈某某，在谈判时被他们用酒灌醉，同国民党签订了两个极不合理的协定。一个是要我们的游击队从建平县撤出来，建平是我们游击队的根据地，而且是个战略要点，我们是不能撤出来的；另一个是从朝阳到绥中有一条二三百里长的公路，我们用不上，而国民党却通过它源源不断地运兵和战争物资，所以游击队常常破坏它，协定却规定双方使用，共同保护，这实际等于保护国民党运输，也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你要想法把这两个协定推翻。”

这两个任务，前一任务，即看住国民党军队容易些，而要推翻两个协定是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他们可以借口前任签订的协定，后任必须执行。但是我还是接受了任务。临走时，李克农同志又说：“要了解详细情况，可以找宋时轮同志谈一谈，怎样对付美蒋代表的阴谋，他很有办法。”

第一回合

从李克农同志处出来，我就到协和医院找到宋时轮同志，向他请教执行小组应该怎么搞。宋说：“没有什么不好搞的，我们学他们的办法，你打过麻将吗？”我说：“打过。”他说：“执行小组就是打麻将的原则，‘损人利己，两面三刀’，这八个字在党内是很坏的作风，但是对付敌人倒是个好办法，这是我们向他们学来的。”宋还向我介绍了执行小组的其它情况。

当天，二十六小组在协和医院开了个碰头会，我先到十分钟，一会儿汉夫来了，穿着美国军官服，三十来岁，长得很结实，圆圆的脸，蓝眼睛，高鼻子，显得很秀气。而国民党马上校却是一脸酒刺，象桔子皮似的，有点象大草包。

大家坐下后，汉夫首先开口说：“小组的任务是监视双方部队不能调动，要调动必须向小组报告，谁私自调动就是破坏和平，小组有权执行规定。”口气相当厉害，他又说：“我们小组的第二个任务就是执行那两个协定。”当时我在会上没有提出抗议，因为我反正心里有数，不能执行只对一方有利的协定，更不能执行为国民党备战有利的协定。所以我只发表了一点意见备个案。我说：“关于那两个协定怎么执行，以后好好商量。”汉夫很警惕，当场就说：“这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就是执行。”我说：“不对，这两个协定有错误。”他说：“有什么错误，你们陈代表都是签了字的。”我说：“签了字不假，但是在签字前，陈代表被国民党方面马代表灌醉了。”汉夫一听我这话里有文章，赶忙否认说：“那天根本没喝酒，陈代表还参加了舞会。”我说：“今天在这里不谈了，以后好好调查一下。”汉夫不开口了，最后说：“今天我们就是碰个头，明天出发。”他又问：“我们是三个人一个飞机，还是另派？”我灵机一动，说：“还是要另派飞机，我的家属都在承德，我必须去安排一下，同时工作也要作一番交代，因此我想去承德。”他俩坐一架飞机去了，我到了承德，主要是想和当时十一小组代表段苏权同志商量一下对策。

段苏权同志办法很多，而且对搞执行小组也有经验。他对我说：“你去当二十六小组代表，是去解决过去未解决好的问题，而且一定要解决好，否则要犯错误。”我们商量结果，暂时不到职，看他们怎么搞，见机行事。

段苏权同志那时还兼着热河军区的司令员，建平游击队归他指挥，他说：“建平游击队是国民党眼中钉，不仅不能撤，还要

扩大，只有这样才能制止美蒋的内战政策。”段让我到十一小组先住上一两个月不到职。请示分局，分局也同意这么做，于是我就在承德住下来了，一方面了解一些情况，另一方面静观二十六小组事态的发展。

不到两个星期，汉夫和马上校到北票侦察我们的游击队，游击队看到吉普车向驻地开去，就开了枪，结果汽车司机被打死，汉夫的胳膊被打伤，打来了电报，要我赶快到职。正在我和段苏权同志商量去还是不去的时候，执行部我方负责人李聚奎同志来了，他是专程来承德催我到职的，他说：“你必须赶快去解决打伤美国人的问题，美国代表已向执行部写了报告，罗伯逊很生气。”

看来和美国人争吵一番是不可避免了。临行前，我准备了一下，我打听到汉夫是个酒鬼，又爱占小便宜，所以买了两箱雪花牌葡萄酒，又从旧货摊上买了一对银咖啡杯，请银匠刻上“美方代表汉夫 中共代表李逸民赠”的字样。到了朝阳，我让翻译张天民同志先把礼物给汉夫送去。我心里想，他只要收下礼物，后面的文章就好做了。若不收，则意味着即将有一番大争吵。

汉夫这时还在医院里，张天民同志把东西送给他以后，他高兴极了，对张天民说：“李代表想得真周到，这些东西我一定留下作永久纪念，将来我和妻子一人一只杯子对喝咖啡，就会想到李代表。”他还当场打开一瓶葡萄酒喝了起来。

当天晚上，我就去看他，他躺在床上，胳膊上缠着纱布。看我进去，满脸笑容地说：“李代表，你为什么这时才来，我已经等你好久了。”我说：“家务事多，到现在还没处理完，一听说出事，我就赶快来，很对不起，伤怎么样了？”他说：“你们

八路军就是喜欢打枪。”我说：“抗战八年，打枪打惯了。”他说：“那天根本不应开枪，吉普车上挂着美国星条旗，开枪的地点离吉普车还不到三百米，应该看得清清楚楚。”我说：“你不了解情况，我们游击队设备很差，没有望远镜，也没有电话机，你们去了我又不在，这就很难免了，幸好就负一点伤。”他说：“是啊！开了几十枪，我们车向后转了，他们还继续开枪。”我说：“算了，你们根本不应于我不在时，双方就去，本来有规定，去游击区应三方面同去。”他说：“等我伤好了慢慢再谈吧！”我说：“已经打报告了没有？”他说：“报告没说什么，罗伯逊也没批什么，请您别介意。”我一听，什么事也没有了。

当时执行小组的事并不多，开始我们都在一起吃饭，但我们的人吃不惯西餐，同时在一起吃饭也很不方便，于是就分开起了，他们还给请了个大师傅。每人每天四美金的伙食费，所以吃的非常好，每顿七、八个菜，早晨每人七、八个荷包蛋，米饭、馒头随便吃。美国人有时请我们去吃饭，都是西餐。为了礼貌，我们也请汉夫来吃中餐，汉夫这个家伙就喜欢吃，来过两次，吃得津津有味。他同我开玩笑说：“李代表，我们的伙食我也吃不惯，我把我那份伙食费拿来同你们一起吃吧！”其实他也真想来，除了嘴馋外，主要想来听点消息，拉拢我们的人。以后他没来，我们也没有去请他。

针 锋 相 对

汉夫的伤好了，开了正式的执行小组会，讨论执行那两个协定问题，汉夫公开站到国民党方面，为其辩护。因此我们也只有针锋相对。我说：“他定的协定我负责不了。”汉夫说：“按照外

交惯例，前任外交官订的协定，后任应该执行。”我说：“我不能执行，因为协定本身是错误的。我方代表是被你们用酒灌醉后签字的。”他说：“那天根本没喝，还跳了舞。”争来争去，整整吵了一整天，毫无结果，可以看出，汉夫已经很疲劳，我继续说：“你们若一定要我执行，我就回去了，到那时，杨（得志）苏（振华）纵队把朝阳打下来，我就管不了啦。”汉夫一听这也有点软下来，最后他说：“我们已经争吵一天了，再吵两天也吵不完，我提个意见，咱们作个谈话记录，各谈各的意见，打个报告给北平，从此会上再不提这两个协定，以后再谈。”我当即同意了，并重复了一遍他的话，问他：“咱们把今天的谈话搞个备忘录，你的意思是说从今以后这两个协定不再谈了，对吗？”他说：“是这个意思。”我要翻译当场将汉夫的话翻成中文。国民党代表马上校不同意，汉夫说：“你怎么不同意，我都已经说了，我是主席，是说了算的。”马一看汉夫发火，也就同意了。我当即提议：“咱们马上打个报告，从今以后不再谈这两个协定的事。”实际上是把协定取消了。双方把备忘录打成中文和英文本，三方都在上面签了字。我怕汉夫第二天后悔，要他当晚把签了字的备忘录送给热河省政府主席刘多荃一份。我也发了电报给叶剑英同志，美国也打电报给罗伯逊，马上校报告郑介民。

第二天一早，汉夫果然后悔了，他说：“我昨天那个讲话有毛病，两个协定不能不执行。”我马上说：“不能这样做，我们已经开过会，怎么能变呢？如果真要变，那我要回北平向周恩来汇报，说你推翻了谈话。”他说：“说是这么说，也就算了。”我说：“那我也不去北平汇报了。”

揭穿阴谋

在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千方百计进行捣乱，有一次，他暗地组织了一批建平县的所谓“民意”代表，到朝阳军调小组请愿，说游击队如何如何不好，老百姓都反对等等，要求游击队撤出建平。我一看那批来人的打扮和言论，判断不是土豪劣绅，就是地痞流氓，所以当场向他们拍了桌子，训斥他们一顿。

汉夫一看我火气那么大，赶忙出来调解，说：“不要发火，我们可以好好调查。”我说：“明天就出发调查，但是游击队可能开枪。”汉夫被上次受伤情形吓坏了，一听要开枪，马上说：“我们不去调查也可以，是否听听这些代表的意见”。我说“我不听，这是国民党老一套宣传法，不信你可以一个一个找他们谈。”汉夫说：“为什么要一个一个谈呢？”我说：“这样可以查清楚他们的身份来历。”

汉夫找了五六个人分别了解，果然不是地痞，就是流氓，我对汉夫说：“怎么样？这些人就是所谓民意代表，这就是马上校玩的花样。”在这种情况下，汉夫也就不好公开为马上校说话了，而且自己也觉得下不了台，对马上校发了火，说：“你怎么搞这么一批人来胡闹，一个好老百姓都找不出来吗？”我趁机说：“国民党就是爱搞这一套假民意，我看让他们走吧！”汉夫拍起桌子说：“统统给我滚！”那些代表中有些人不识时务还要闹，汉夫对翻译说：“把卫兵叫进一个班来，把他们一个个赶走。”卫兵一进来，一会儿就把这些“代表”赶跑了。

当时马上校感到很尴尬，但作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主人既然说了话，他哪还敢说半个不字，会后马上校来找我，带着警

告的口吻说：“李代表，以后你要注意，你玩弄了美国代表，也玩弄了我们。”我坦然地说：“我们是要和平的，根据停战协定，我们应该团结，将来还要共同建国呢！”

挤 走 汉 夫

我刚到执行小组时，汉夫和马上校认为我是乡巴佬，好欺负。经过一段工作，汉夫对我的看法慢慢变了，他说我不象个工农分子。有一次谈话，他拿着一瓶印度名酒，边喝边问我到八路军前在社会上做过什么工作，我对他是很警惕的，只说在大学里念过书，在社会上做了一些事情，以后就参加了革命。他又问我上的什么大学，我没有告诉他。他看我懂英文，觉得很奇怪，有一次他问我：“李代表，你每次会上都要看英文记录，你的英文是在什么地方学的呀？”我说“在大学里学的”。其实，我是在国民党监狱中学的。他又问：“那你平时为什么一句英语也不讲，总是带着翻译，自己连一个英文字母也不提？”我说：“我是自学的，只会看，不会讲，也不会写文章。”他问：“你平时看过什么英文的书？”我说：“读过爱伦堡的小说。”他说：“那是美国工人作家，是左派对不对？”我说：“是啊，他的小说写得好，很生动。”他不相信我不会讲英语，说：“你可能是八路军干部中最自尊的一个吧？你从来也不讲一句英语，我讲英文你也说听不懂。你只讲中国话，真是一个顶刮刮的中国人，不过也未免太自负了吧！”是的，我作为一个中共代表，当然要坚持讲自己国家的语言，这是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也表示自己民族的尊严。

有一段时间，我单独和汉夫细细谈起蒋介石时时在准备内

战，到处制造磨擦，调兵遣将的情况。由于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一边倒的既定方针和汉夫的个人立场，他根本听不进我的话，总认为共产党不对国民党让步，是我们在玩花样。这样，就造成汉夫在任何场合都袒护国民党的利益，有时还表现得非常鲁莽，态度也非常顽固，因而给我方的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维护我军的利益，根据中央对冀热辽分局的指示方针，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制止国民党和美帝勾结，制止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同时也要想法把汉夫这个顽固分子挤走。于是我做了以下几件事：

推翻两个协定以后，我们的建平游击队没有撤。而从建平到朝阳有一百多里的电话线，是敌十三军通话用的，我就想法让游击队把这段电话线割掉，并把这个责任推到十三军头上。一天晚上，我去找汉夫，告诉他：“我接到我们司令部电报，国民党部队从建平到朝阳一带有调动，而且还准备破坏这段电话线和交通，使我们执行小组不好调查。”汉夫说：“不会的，这段电话和交通是国民党要用的！”我说：“不信，你就等着看吧！我的消息是可靠的。”

与汉夫谈过以后，我就打电报给冀热辽军区司令部，要他们指挥游击队把沿铁路线的电话线统统割掉。这工作对我们游击队来说真是拿手好戏，一个晚上就砍去一百几十里的电线杆，电线也收走了。

第二天，国民党代表马上校提出抗议：“中共游击队破坏了电话线，现在已经不能通电话，这是中共部队的挑衅。”为此，汉夫召集了三人小组会议。我提出：“这个问题要调查，在和平时期，我们是不会搞的，而是国民党为了调动军队进攻承德，使

小组又无法调查。”

汉夫因为事先已听我说过国民党要破坏电线的事，现在事情果然发生了，所以他也提出调查，说：“你们不要争吵了，我们马上去调查，搞清楚究竟是谁搞的。”但是马上校反对调查，因为沿线都是他们的部队，一调查，他们的军事部署就暴露了。汉夫一听就急了，说：“问题是你们提出来的，我们要去调查，你又反对，要不问题就是你干的。”马上校看到美国人发了火，立刻就软了下来，同意去调查。我马上给冀热辽分局打了个电报，要他们通知沿途群众，让他们说法一致，用帽徽、领章、军衣等来说明砍电杆是国民党军队干的，并要求在三天内准备好。

为了拖延三天时间，我装起病来。第二天我就没起床，汉夫来看我，我说：“我感冒了，不过两三天就会好的，不妨碍我们去调查。”汉夫说：“那就等你病好了再说吧！”

三天后，我起了床，于是就出发调查了，一路问老百姓，说法都差不多，有的说看得清清楚楚是穿着国民党军装的部队干的，有的说，“那天老百姓都不敢出门，破坏交通线的部队都带有警犬（那时只有国民党部队才有警犬）。破坏后，他们还到村里来要老百姓烧开水、做饭，还要杀鸡。”人们都说亲眼看到的。调查了十几个村庄，老百姓都这么说，这时我看到汉夫已经很疲劳了，我问他：“还要调查吗？”他说：“不用调查了，一切证明是国民党部队干的。”马上校说还应调查，汉夫坚决地说：“不调查了，回去开小组会，三方各打自己的报告。”

回到朝阳，开会时，汉夫说：“我同李上校看法一致，有老百姓的谈话作依据。”因此汉夫在我的报告上签了字。

报告到了北平，马歇尔批了汉夫一顿：“为什么这么一点事

都调查不清，你们调查的就是不对。”后来汉夫告诉我说：“我受了批评，不过我不怕，最多回美国去。”

另一件事是，当时叶柏寿（建平）有一座一百几十米长的铁路桥，是国民党调兵的交通要道。这时我们已经了解到国民党军队违反停战协定，调动军队，因此游击队千方百计把这座桥炸掉，但每次都炸得不理想，一两星期就修复好了。我觉得很奇怪，在一次外出调查时，他们正在修桥，我到铁桥上看了会，看出游击队炸不得法，每次炸的是桥头，桥虽被炸断，一头掉在江里，一头在岸上，只要用火车头一拖就吊起来了，必须炸中间才对。所以我调查回来就给军区司令部去电话，告以炸桥的方法。不久，果然把桥中间炸断了。这一炸两三个月修不起来。

桥被炸后，汉夫警觉起来。他对我说：“桥炸了很可惜，那是你们国家的财产，一时修不起来，这是很大的破坏，肯定是游击队搞的。”我说：“不一定！”他不打自招地说：“这有什么不一定的呢？国民党十三军的供给运输要靠它，而你们用不上。”我说：“也可能是我们的部队搞的，也可能是国民党的军列爆炸。”他冷笑着说：“别扯了，炸桥那天根本没有军列通过，你那天不是去看桥了吗？”他怀疑是我搞的名堂，也开了会，各打各的报告。报告到了北平，但没下文。

当时阜新煤矿的煤主要归国民党军用，因此冀热辽军区司令部想破坏它，所以给我来了电报，让我想法到阜新看看应如何破坏好，但总找不到机会。一次，游击队炸了煤矿的通风管，但他们很快又安上了。我趁机向汉夫提出去作调查。

汉夫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我们就出发到阜新煤矿作调查。

阜新煤矿的经理是个留美学生，英语说得很流利。我们到达后，请我们吃了饭还专门给汉夫和马上校找来两个日本护士。汉夫爱玩，住了一个多星期，也没好好调查。趁这机会，我到煤矿区仔细看了看。有一天，我到发电厂外边，碰上一个电工，我和他谈起来，了解到这个工人比较进步，我就问他：“煤矿炸了几次？为什么都破坏不了？”他说：“游击队是外行，炸了通风管很容易修，即使炸了一条坑道，也照样出煤。如果破坏发电厂，把高压真空管炸掉，这种东西国内还没有，从美国运来起码也得两个月以上。要是我们手头有炸弹，一个就行了”。

这个电工的谈话使我受益不浅，回去我就报告了司令部，叫他们想法炸电厂。果然，游击队用了三枚手榴弹就把高压真空管炸掉了，整个煤矿停了工。这下马上校跳了起来，汉夫也对我很怀疑，但又抓不住证据，只好说：“你同你们司令部的情报联络得很好啊。”

汉夫这家伙虽然很顽固，但有时也比较轻信。有一个星期天，他找我去，问我冀热辽地区有多少部队，说是要向北平执行部汇报。

究竟有多少部队，规定双方都要报告的，而且规定这些部队不能调动，也不能增加。他问我军有多少纵队，我告诉他有二十个。他一听就怀疑，说没那么多。我说，你不信就算了。结果他还是相信了，用电报告诉了马歇尔，马歇尔一看报告就火了，说是假的，他估计冀热辽地区至多有三至五个纵队。其实，我们的确只有三个纵队（杨、苏纵队；黄克诚、张爱萍纵队与詹才芳纵队）。马歇尔把汉夫批了一顿，说他工作不积极，上了中共代表的当，对自己搞假情报，并下决心把汉夫调走了。

汉夫走的时候，我送他上飞机，还要求和他照相留念，他拒绝了，说：“要是给马歇尔查出来就要离开海军部队了，我从小搞海军，所以我不能离开海军。我上了你的当了，什么二十个纵队……，再搞下去，我海军上校也当不成了。”

易里上校

汉夫调走后，换来一个陆军上校易里，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团长，是个基督教徒。这人思想很顽固，是典型的美国资产阶级培养的军官。他标榜不问政治，就讲军事训练，怎样打仗，平时专门讲吃喝、酒量很大，卧室里有个大酒柜，分三格，上中下分别放着三等不同的酒，我送他的雪花牌葡萄酒，他放在最下面一格，说是三等货。他说：“一等货是自己出钱从军人俱乐部买的，二级酒是朋友送的，第三格里的三等货是你们送的。”我说：“我不会喝酒，所以不知道酒的好坏。”他说：“你会喝也不敢喝，我知道你们过去的代表陈先生很会喝。”他把话题一转，又说：“我这次替代汉夫上校有个任务，那两个协定还要开个会议，准备执行。”我当场就加以拒绝，我说：“这样的会不能开，因为已经决定了今后不再谈这两个协定，你们开我也不参加了。”他看我态度很坚决，只得说：“算了，以后再说吧！”

七月，国民党不顾停战协定的规定，偷偷地把新编第二十二师从锦州调到叶柏寿来了。开始我们都不知道。有一天，我到火车站去转转，忽然看到车站上堆着许多美国罐头箱，还有许多食品，我觉得奇怪，问一个铁路上的工人，他告诉我，这是新编二十二师后勤部的供给。我心里顿时明白了，新编二十二师已从锦州调到了叶柏寿。

回到驻地，我马上就去找易里上校，要求赶快开小组会。易里故意装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问我：“有什么大事，开小组会干什么？”我说：“新编二十二师已经调到朝阳地区，这是严重违反停战协定的。”易里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开小组会。会上我提出应该去调查，易里同意了。

我们到了凌源，就看到这个师驻在那里。我说：“易里上校，你看怎么办？这个师停战前在锦州，根据协定应该撤回去。”马上校不同意，他说：“这个师是新编的守备部队，是守铁路的，因为你们游击队经常破坏铁路桥梁。”易里这时完全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说：“如果这个部队撤走，你要保证游击队不破坏铁路。”我说：“事情可能不是那么简单，部队撤回原驻地，这是停战协定，而游击队破坏铁路的问题，因为通讯设备很差，我们指挥不了，因此我们不能保证游击队的活动问题。”马上校说：“那部队调来了，也不能动。”吵了一番，双方都各自打了报告，也没有下文。

新编二十二师是全副美式装备，调动的意图也很清楚，是准备打内战的。所以要想让它撤走是不可能的。

话 中 有 话

七月下旬的一天晚饭后，我在操场散步，碰上易里上校，他忽然跟我开起玩笑，说：“有一个故事，某地方起了大火，只有三个消防队员，这三个队员没有自来水管，只有三只水桶，你说能救得了吗？”我说：“当然救不了。”他说“对了，就这么一个故事。”我觉得他的话很蹊跷，就追问他怎么回事。他再也不说别的了。

我回来后，越捉摸越觉得易里上校的话里大有文章，我对翻译张天民同志说：“看来国民党要开始进攻了，承德会是一个主要目标。”并把碰到易里的事告诉他。我对他说：“为了证实易里的话是真的，你去找易里的翻译谈一谈。”结果那个翻译把事情发生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张天民。原来，十三军已下定决心要进攻承德，上午刘多荃找易里谈了话，内容就是南京已经下了命令，要十三军在两周内准备好，夺取承德。张天民把情况谈完，我当即就打电报报告了冀热辽军区司令部。

第二天一早起来，我找到易里，要求开小组会，易里问：“干么要开小组会？”我说：“就是你谈的那个故事问题。”他说：“故事只是讲讲而已，那有什么？”我说：“你最好告诉我故事的具体内容。”他说：“那有什么内容？”我说：“不会没有内容，国民党要进攻承德了对不对？”他一听感到很吃惊，赶忙问：“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比听故事还早就听到了消息，我们司令部有电报来告诉的，怎么样，还是赶快开个会吧！”他说：“好吧！咱们先谈一谈。”于是他把刘多荃的话都说了，并说：“不能怪我，在小组会上你也不能说是我讲的，我对得起他，你也应对得起我。”我说：“好的，不过已经起火了，房子也肯定要烧毁，但我们三只水桶也得救一下呀！”他说：“好吧！今天上午暂时不开，我好好想一想，怎样解决好，下午再开会，不过全靠上帝保佑啦！”说着，还在胸口划了个十字。我说：“靠上帝保佑不对，关键是看你站在哪一边，如果你是真正为和平调解内战，今天就可以讲话，要国民党把命令撤回，否则就是一场大内战。我们兵也不少，有一二十个纵队。”易里冷笑了一下，说：“你这一套对汉夫还行，对我就不行了，你们至多

五个纵队。”我说：“先不说多少，对目前这种状况，你看怎么办呢？”他说：“没有办法，蒋委员长已经下了决心，连马歇尔也没有办法。”我说：“我们二十六小组和承德的十一小组一起到平泉石觉（国民党十三军军长）部队驻地开会，要求他停止内战。如果一定要打，我们并不怕，但我们执行小组一定要尽到责任。”他同意了。

当天下午小组会上，我就提出到平泉和十一小组联合开会的建议，马上校当时就反对，他说：“要开会就在朝阳开，不能和第十一小组联合开。”可是易里同意了，并决定三天后出发。

我向易里提出要去承德，我说：“我要对我们司令部负责，明天就走，你给我要个飞机。”易里说：“好吧！”第二天飞机来了，易里要我不要告诉马上校。待我上飞机后，马上校赶来了，他提出了抗议，因为三人小组有规定，一方代表离开要得到其他两方同意。但飞机已经起飞，马上校的抗议也无济于事了。

内 战 爆 发

到了承德，我立即向程子华、肖克两同志汇报，在场的还有赵毅敏、黄火青、段苏权等分局同志。我把情况说了说，有的同志不相信，说：“不会的，已经停止了内战，如果明目张胆地进攻，不就是内战吗？”我把翻译、易里的谈话经过讲了一遍，并且把新编二十二师已经调来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但个别同志还是不相信会发生战事。这时我们的力量很弱，只有一个杨苏纵队，情况还是很危险的。段苏权同志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先到平泉开三人小组会，拖上几天再说。”我说：“从情况看来，拖也拖不长，至多拖两个星期就

了不得了。”肖克同志说：“有两个星期，我们就可以准备好！”于是决定同意三人小组到平泉开会。

第三天，第十一小组和二十六小组联合在平泉开会。国民党看到他们的阴谋将要被揭穿，就要出两面派手法。石觉对三人小组招待非常热情，三两天就来看三人小组一次，天天举行舞会，这时我们那有心思参加舞会，明知道国民党是在搞缓兵之计，企图用这些来麻痹我们。石觉还对三人小组发了誓：“只要有我石觉在，就不会进攻承德。”

国民党的发誓能算什么呢？不到两个星期，三人小组会议还在进行，石觉就下达进攻承德的命令了。两天后，承德失守了。

石觉下进攻命令时，我们的会就停止了，我回到朝阳，段苏权同志也回承德去了。我准备回北平工作，因三人小组实际失去作用，易里和马上校也要回北平，我们三人就同机离开了朝阳。

我回到北平，首先碰到李克农同志，他问承德情况如何，我告以十三军已发动进攻，承德两三天内可能失守的情况。从此，二十六小组的历史使命结束了。

（黄国平整理）

一位卓越的红军指挥员

——忆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

黄松坚 姜茂生 磨力 李治平

作者简历

黄松坚：一九二四年至二九年参加韦拔群同志领导的广西右江地区农运及武装斗争，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参加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二十一师副师长。一九三〇年十月红七军北上后，任红七军独立师副师长，和韦拔群同志一起坚持右江革命斗争。一九三二年任右江下游党委书记，一九三八年任中共广西工委书记，一九四五年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解放战争中任粤赣湘边区党委副书记、纵队副司令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磨力：一九二七年至二九年参加农运及武装斗争，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参加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解放战争中任团长。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局副局长。

李治平：一九二七年至二九年参加农运及武装斗争，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参加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参加二万五千

里长征。解放战争中任牡丹江省军区供给部长。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外贸局顾问兼南宁海关关长。

晏茂生：一九二七年至二九年参加农运及武装斗争，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参加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解放后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现因病离职休养。

李明瑞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不幸在一九三一年秋冬之间，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迫害致死。党的“七大”为他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李明瑞烈士也要鞭尸扬灰，他们竟置党的“七大”已给予李明瑞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定论而不顾，捏造事实，诬蔑李明瑞同志是什么“一九三一年秋，在江西苏区肃反时，政治上动摇，逃跑、叛变”，诋毁李明瑞烈士的英名。今天而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追忆李明瑞同志。

北伐战争 英勇善战

李明瑞同志，号裕生，广西北流县人。生于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九日，一九三一年秋冬之交，遭迫害致死时，年仅三十五岁。

李明瑞同志在青少年时代，对侠义小说和历史传记极感兴趣，赞美宋朝岳飞等民族英雄，把岳飞“还我山河”的名言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他看到当时国家的内乱外患和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看到听到爆发为全国空前未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始有了救国救民的思想。中学毕业后，当时许多先进的人们响往日本留学，走维新救国的道路。同学们和亲友都极力劝他赴日本留学深造，希望他有所建树。他说：“经济困

难，无办法去日本，在国内学好军事亦可为国效忠，为民造福的”。寥寥数语，表达了李明瑞当时就已胸怀救国救民的凌云壮志。后来他通过亲友的介绍，进入了广东韶关滇军讲武堂炮科学习。一九二一年毕业后，在护国军当排长、连长。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他在孙中山领导的广西定桂讨贼军俞作柏（李的亲表兄）部下任营长、团长，以英勇善战，指挥有方著称。

一九二五年秋，广东革命政府为了消灭叛军陈炯明的残余势力，统一广东。李明瑞参加了讨伐南路军阀邓本殷的战斗。他带领部属从玉林出发，经陆川、北流进入广东化县。在几个月的行军作战中，能征善战，身先士卒，打了不少胜仗。尤其是在高州（今广东茂名）战役中，他机智沉着，以少数兵力，迫使敌军主力大部缴械投降，其余溃散。使南路终于完成了讨伐任务。

一九二六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参加和领导的北伐战争中，李明瑞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二旅旅长。他率部转战于湘、鄂、赣、皖等省，英勇作战，屡建战功。尤其是配合叶挺独立团攻占汀泗桥、贺胜桥之战役，把敌人吴佩孚军杀得尸横遍野，歼灭一万多人。是年十月，李明瑞又奉命支援江西方面的北伐军与大军阀孙传芳部队在箬溪激战，仅一昼夜，即将孙传芳嫡系精锐谢鸿勋部全部歼灭，谢鸿勋重伤，旋在医院死亡。

随后，李明瑞又率部击溃孙传芳主力部队于宝岭、德安、王家铺等地。在各战役中，都是以少胜多，以劣装备战胜优装备，勇敢、迅速地击破训练有素的强敌，最后迫使南昌守敌开城投降。

一九二七年八月，孙传芳死不甘心，又纠集其他五省尚存残部约十万人，以英国军舰为掩护，渡过长江，袭击南京。南京附近的乌龙山、栖霞山等各险要阵地已被敌人占领，孙传芳并亲临

龙潭车站督战，南京外围战事告急。这时李明瑞又奉命率部由徐州回师南京，并担任前线主攻部队的指挥。他率部猛攻南京外围敌军。激战七昼夜，愈战愈烈，敌人以密集的炮火向李明瑞阵地进行轰击，子弹象雨点般打过来。然而，他无所畏惧，亲临前线指挥，亲自打迫击炮，命中栖霞山等敌人阵地要害。敌人先后死伤万余，卒将栖霞山等重要阵地逐一克复，顽敌全军覆灭，解除了南京之围，保证了江南的安全。是役，史称龙潭战役。从此，李明瑞成了当时闻名的北伐名将，他所率领的部队被誉为“钢军”。国民党蒋介石、李宗仁也不得不佩服他，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李明瑞原是第七军中的一员虎将，战功彪炳”。第七军的官兵一致公认：“北伐战争中，在打垮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战役中，战功要算李明瑞大。”

北伐战争结束，李明瑞率领部队回师革命中心武汉，驻守两年多。

筹划起义 革命志坚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五月十七日反动军阀夏斗寅也公开叛变，他乘北伐军主力北上之际，企图乘虚袭占武昌。当时武汉举行了有三十万人参加的“讨蒋”大会，共产党员、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队长蒋先云同志是这次大会主席团成员，会上他慷慨激昂地历数蒋介石的滔天罪行。李明瑞深表同情。紧接着，汪精卫也在武汉叛变了革命，形势急剧恶化，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拘捕和惨遭屠杀，祖国遍地血雨腥风。李明瑞的亲表弟俞作豫，原为李部下的一名团长，也因有左倾嫌疑被白崇禧辱骂，以致不得不辞去团长职务离开部队到

香港，不久加入共产党，参加广州起义。接二连三的事件使李明瑞的鉴别能力有了提高，他看清了国民党新军阀政客们祸国殃民的反动面目，他对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十分敬佩，他对国民党借“清党”来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极为愤恨。当时他仗义执言，亲自找国民党黄绍竑不满地说：“自从‘清党’，把政治部解散后，部队士气和军风纪都涣散了。是很大的损失。”

一九二九年三、四月，蒋桂新军阀战争。李明瑞利用桂系委任他为第三路军代理司令的职权，在前线对部下宣布他不参加派系内战，遂影响桂系军阀二十多万军队，顷刻瓦解，迫得李宗仁、白崇禧逃窜国外，使人民免受一场反革命战争的灾难。

这一年五月，蒋介石以李明瑞反桂系有功，委任他为广西编遣区主任、军事特派员，兼广西督办公署主任，统管广西全省军权。李明瑞原来的部属、共产党员俞作豫同志也重新回到他的部队，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蒋介石还任命俞作柏（国民党左派，俞作豫的胞兄）为广西省主席。李、俞在执政前，经常与俞作豫同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俞作豫的不断影响下，他们进一步倾向革命，从思想上靠拢共产党，并通过社会关系，主动地要求我党派干部到其军政机关工作。我党利用这个好时机，积极发展广西革命力量，首先派邓小平同志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香港与俞作柏接洽合作。

一九二九年夏天，邓小平同志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巨大鼓舞下，接受党中央的重托，和张云逸、叶季壮、李谦、袁任远、袁也烈等一批党员干部先后到达了广西南宁，分别

到了李、俞的政权机关和部队中工作。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同志负责领导广西党的工作。

李明瑞、俞作柏大力支持我党开展工作，为我党举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红七军和红八军，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我党的推动下，李、俞首先释放了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如罗少彦、陈漫远、莫文骅、吴西、谢鹤筹等同志，使我党组织得以很快恢复；他们并且立即解散了被广西军阀李、白、黄的爪牙所把持的国民党各级党部；还镇压了那些民愤很大、罪恶昭彰的国民党反动分子，给广西的封建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在我党的推动和建议下，李、俞不但亲自下令恢复工农群众运动，重新设立由我党直接领导和影响的各种群众组织办事机构；而且他们还派出不少特派员分别到各主要农运区去表示热情支持和亲切慰问，使工农群众运动取得合法地位。我党抓住这个时机，派出一批党员干部分别到各地加强领导，恢复和发展农会组织，促进南宁、百色、龙州等地工农运动，特别是左江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他们还调拨出三百多支步枪、两万多发子弹装备右江地区农运领袖韦拔群同志领导的农民武装；拨出一批枪支弹药支援左江地区和南宁市郊区的农民武装，大大地加强了这些地区的农民武装力量。农民武装的声威大震，反动派大嚷大叫：“俞作柏、李明瑞来捣乱，致左右两江的赤焰滔天，原住东兰之共匪，也就死灰复燃”。从而，广西党组织的力量得到发展壮大，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封建反动势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李宗仁对此曾经哀叹地说：“俞作柏、李明瑞

南归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几成为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

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我党为了培养革命武装力量，积极进行兵运，向李明瑞建议创办一个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由张云逸同志负责。该总队名义上隶属李明瑞指挥，实际上是接受我党的领导。随后李明瑞同志还主动地邀请张云逸同志兼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他并同意张云逸同志提名推荐李谦同志（中共党员）任第四大队副大队长。同时，他又同意我党分配安排罗少彦、李朴、何世昌、袁任远等同志（均系中共党员）分别到教导总队任教官或到第四、第五大队任营、连、排军官，使我党得以在这些部队里建立了秘密组织，发展党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李明瑞同志为我党掌握这些部队的各级领导权起了重要作用。

随后，李明瑞、俞作柏又根据我党组织的推荐，委任了黄大权、黄书祥、陈伯民等一批共产党员和积极参加革命的党外人士，担任左、右江地区各县的县长，进一步推动着这些地区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一年九月底，俞作柏、李明瑞突然决定发动反蒋战争。我党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双方形势，认为：俞、李来广西掌握政权仅三四个月，内部又不一致，立足未稳，兵力不足，政治经济基础都很薄弱，这样草率行动，必遭失败。于是，邓小平同志立即和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同他们分析形势，陈明利害，劝说他们暂缓一段时间，不要急于行动。但，俞、李考虑不周，没有接受我党的劝告。

十月一日，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召开了反蒋誓师大会。宣

布由俞任南路讨蒋军总司令，李任副总司令兼第一路指挥。他们发出“反对独裁，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贯彻三大政策”的通电。据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报道：“朱、毛有电响应俞作柏、李明瑞。”当时广西各界人民团体如工会、农协会、妇女会等均去电致贺。

蒋介石得知俞、李动向后，先后两次拍电报给李明瑞，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欲分化俞、李，拉拢李明瑞，李坚决反蒋，置之不理。

但，当俞、李率领讨蒋军沿西江正欲向东挺进，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时，由于俞、李部下师长吕焕炎被蒋介石以省主席的高官和金钱所收买而首举叛旗。连在武汉同俞、李一道倒戈反李、白的师长杨腾辉也通电投蒋，逼俞、李下台。吕焕炎反叛俞、李后，又收买黄权。黄权原是李明瑞部下的心腹将领旅长，李劝他回心转意，贯彻讨蒋方针，他诸多推托，最后李还对他说：“我尽多年袍泽之情，衷心对你讲，革命军人的职责，是保国卫民，现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排除异己，把国家搞到这样田地，我们怎能置之不理。我们倒桂成功后，继续倒蒋，原是早经决定的计划。目前虽然由于时间短促，准备不够。但迫于环境，我们一定要适应形势的要求，个人利害得失，应在所不计。希望如往日一样团结，继续努力，完成我们的职责”。但是，黄权早已被吕焕炎以三十万元收买，利令智昏、还是叛变投蒋。因此，俞、李的反蒋就这样不战而败了。

十月初，当俞、李即将带兵出发反蒋时，我党为了保存革命武装力量，征得李明瑞的同意：把掌握在我党手中的广西警备第四、第五两个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的兵力留在南宁担任维护后方

工作。同时，通过党的活动，李、俞又同意张云逸同志兼任南宁警备司令。利用这个职权，我党接管了省军械库和金库等要害机关。军械库里存有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堆积如山的弹药。当李、俞率部队出发反蒋时，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党就立即分别派了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各一个营到右江地区和左江地区去作武装起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准备工作。

从上述这些事实可知，在当时那样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李明瑞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对革命事业却能热情地给予大力支持和赞助，这是多么大的气魄啊！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十月中旬，李明瑞毅然把自己率领的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两个大队交给党指挥，他并随俞作豫同志率领警备第五大队到左江地区去。和率领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到右江地区的邓小平同志、张云逸同志，一起互相配合，积极进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李随革命兵变部队到了左江地区不久，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等都很担心他一旦与工农武装相结合，就变成猛虎添翼，成为后患。同时他们认为李明瑞同志此次讨蒋失败，受到了严重挫折，或可乘机收罗为已用，以达到其政治、军事图谋的目的。因此，他们各施诱饵欺骗的手段，以高官及金钱为条件，派遣代表向李明瑞及其亲属进行多方游说、策反。蒋介石派心腹唐海安带着广西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五军长的委任状和一笔巨款到了龙州、香港等地游说，要李通电就职。汪精卫则派代表劝李放弃革命念头，即可以委以护党救国军第一路总指挥。桂系军阀李、白、黄则派代表游说：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只要李不搞共产主义即

可。但都遭到李明瑞同志严辞斥责，义无反顾地顶回去。事后，李明瑞同志对部下说：“蒋介石、李宗仁、汪精卫这一手，我看透了。我们现在干的是革命事业，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我们现在的力量虽然还小，也许会遭到失败，但至少可以扩大影响。我们一定要坚决干下去”。国民党师长杨腾辉、团长岑建英等也以老同事、老同学身份，写信给李明瑞，阻挠他参加革命。函电纷驰，游说者接踵，李明瑞同志都断然拒绝。岑建英的信劝李投靠李、白、黄，说什么“如果你有什么‘苦衷’，可以帮转达”。李接到岑的信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他莫大的侮辱。“共产党前途是光明的。国民党的味道已尝够了。它要利用你时，双手捧你。它不需要你时，一脚踢开。”李在信中还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劝岑建英等人改变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投向共产党这方面来。

我党珍视李明瑞同志的每一进步。还在南宁时，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同志曾经在“俞公馆”内，多次与李明瑞同志亲切交谈。在他反蒋失败正探索前进道路的时候，党通过各种关系，又给他送来关心和支持，鼓励他顽强地继续战斗，也帮助他明白怎样战斗。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中，李明瑞同志从左江前往右江，与邓小平同志、张云逸同志商谈，打算趁刚复辟的李宗仁、黄绍竑部队驻桂东南与蒋介石系统的粤军相持，无力后顾，南宁空虚之际，回占南宁，以图东山再起。邓小平、张云逸同志不同意李的这个意见，对李说：“这是桂系李、白、黄发展的道路”，“我们党是反对军阀战争的，主张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的。”另一方面，邓小平、张云逸同志诚恳地对他说：“只有革命，才是出

路。”他们以无限信任的心情向李表示：“日后成立红七军、红八军时，我党准备请你担任两军总指挥。”

不久，邓小平同志在百色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途经左江龙州，他同李明瑞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同时把党关于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行动计划告诉了李，并征求他的意见。李明瑞同志听了非常高兴，表示决心和邓小平同志、张云逸同志团结战斗，打起红旗举行起义。邓小平同志对李明瑞能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毅然跟着共产党，参加起义的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表示赞赏。从此以后，李明瑞同志进一步熟识邓小平同志，深深地敬佩邓小平同志。

不久，张云逸同志介绍李明瑞同志读《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革命书刊，他以极大的热忱学习马列著作，使自己从内心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为人民造福，使国家强盛。

为了顺利筹划龙州起义的工作，李明瑞同志废寝忘食，日夜操劳。他和俞作豫同志一起，遵照党的教导，对旧军队进行收编、改编的整顿工作。为提高广大官兵的政治思想觉悟，他经常身穿粗布衣装，脚穿草鞋，和俞作豫、何世昌等同志一起，到龙州中山公园给官兵讲课、作报告。他说：“革命，这是我们唯一能走的路了。我们要准备起义，象红七军那样跟共产党走。”他的话深深地激荡着官兵们的心，大家决心象他一样，跟党走，闹革命。

就这样，尽管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李明瑞同志，已经毅然决然地和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同志一起，领导了有名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表现了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一九三〇年二月初，隆安战役之后，李明瑞同志坚定地选择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向党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要求。党中央认为，李明瑞同志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具备党员条件，便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决心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贡献给党的革命事业，表现得更加勇敢、坚决、无畏。

紧接着李明瑞同志欣然接受党中央的重托，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总指挥，邓小平同志任这两个军总政委。他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与张云逸同志一起，努力把红七、八军建设成为一支攻必克、战必胜的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

红七军北上征途中，在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同志组织和指挥下转战桂、粤、湘、赣等省边境，突破和杀退了敌军数倍数十倍于我的兵力的前堵后追，跋山涉水，攻下了许多险关要隘，并向沿途广大人民宣传了革命真理，播下了革命种子，最后胜利地完成了七千余里的小长征，到达中央苏区。征途中有许多艰苦激烈的战斗，许多优秀的同志壮烈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也有极少数人经不起考验，临阵脱逃，甚至有个别人叛变投敌。后来，部队的人员越来越小，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而李明瑞同志却总是毫不退缩，顽强战斗。特别是他协助邓小平同志、张云逸同志指挥部队强渡乐昌河的情景，至今我们还记忆犹新。

一九三一年二月五日，红七军来到乐昌河边。乐昌河的河水深而流急，激浪滔滔，不能徒涉过河。河上又只有两只小船，一次只能渡过去几十个人。当时，我军后面被大批敌军追击，河对岸又有三个师敌军堵击，形势非常紧迫。如果我军不能迅速过河，就有被敌人围歼的危险。为了抢渡过河，摆脱敌人的前堵后追。邓小平同志和张云逸、李明瑞等军首长一起，不顾连续作战

和长途行军的极度疲劳，立即共同商讨渡河大计。前委决定由邓小平同志和李明瑞同志率领第五十五团先行渡河，张云逸同志率领第五十八团及军直属队作殿后，一旦发生敌情，前后掩护。当第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的一部分指战员抢渡过了河的时候，大批敌人从乐昌增援赶来。已渡过河的部队与敌激战，掩护后续部队渡河，但敌军不断增兵，蜂拥而至。李明瑞同志面对危局，毫无畏惧，他和邓小平同志一道，冒着枪林弹雨，亲临火线指挥。他们一方面派遣突击队阻击敌人，一方面把被敌军冲散的部队收拢回来，李明瑞同志号召指战员们说：“当前我们在革命的严重关头，要继续顽强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争取胜利。革命是有出路的。这次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到达江西苏区与朱毛红军会合”。

随后，部队在邓小平、李明瑞同志组织指挥下，狠打猛拚，终于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拦截，经过三天艰苦的急速行军，胜利到达江西崇义。张云逸同志率领的五十八团，在砵石以北渡过小北江，进入湘赣根据地。四月间，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先后到达江西中央苏区永新县境并胜利会合了。七月中旬，在张云逸同志和李明瑞同志的率领下，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兴国县的桥头镇，与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中央工农红军胜利会师了。

兴国会师后，红七军领导张云逸、李明瑞等同志到中央苏区瑞金北面的壬田寨，参加毛主席亲自邀约几个军的首长商议战略行动的大体方向的军事会议，他们受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鼓励红七军指战员继续努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英勇奋斗。

李明瑞同志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不争个人的兵权。红七军

北上出征时七千多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行军和无数次大小战斗，严重减员。一九三一年一月中旬，到了桂岭时只剩下三千五百多人。前委根据这种情况，决定在桂岭休整几天，并决定将部队缩编为三个团，干部也降级使用。李明瑞同志原是红七、八军总指挥，这时给他降为五十八团团长。他毫不犹豫地愉快接受了。

屡建战功 才能卓越

李明瑞同志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特别是他在党的领导教育下和参加红军之后，很快地掌握了游击战争的艺术，迅速地成长为红军的一个优秀指挥员。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下旬，在龙州起义即将举行之际，隐藏在革命部队内部的旧军官蒙志仁（原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副大队长）乘李明瑞同志去右江和张云逸同志联系工作的时候，突然叛变，纠集队伍盘踞龙州城，自称“团长”。他大杀大捕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白色恐怖，使起义的准备工作遭到了严重破坏。在这危急关头，李明瑞同志凑巧从右江带了一个步兵连来到距龙州城二十多华里的水隆村，与俞作豫同志相遇。他听了俞作豫同志的汇报后，立即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会上他沉着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提出了攻城的办法。他强调指出：“蒙志仁叛变革命，很不得人心。从表面上看，现在他的兵力比我们多些，但实际上除他原来的第二营外，其余都是被胁迫的。军心涣散，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城内一片混乱。只要趁他立足未稳，我们一方面发动群众封锁龙州，断绝其粮草来源；一方面今晚就夜袭龙州，胜利是很有把握的。”谈到这里，李明瑞同志提高嗓音问：“大家有没有胆量争取胜利？”。由于李明瑞同志分析判断战局准

确，提出攻城的办法，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在座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响亮回答：“有！”于是，部队就在当天——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十时开始向龙州城发起攻击。经过几昼夜的激战，叛军孤立无援，弹尽粮绝。最后，叛军营长潘益被击毙，蒙志华受重伤，桂系新上任的第十五师师长黄权派到龙州煽动叛乱的特务曾旦明也被活捉。除蒙志仁带少数叛军于第四日拂晓得以逃脱外，其余大部分叛军都当了俘虏。十二月四日，第五大队在李明瑞、俞作豫率领下，光复了龙州城，为后来龙州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〇年三月初，中共红七军前委在盘阳举行会议，决定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以对付优势敌人。红军主力需要转到外线去作战，以转移敌之合击目标，打乱敌人的部署，调动和歼灭敌人，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张云逸、李明瑞同志的率领下，红七军第一、第二两个纵队三千多人，在右江地区开展了游击战。并向桂黔边境发展。四月三十日，红七军奇袭贵州榕江城。榕江，是贵州军阀王家烈后方主要基地之一，许多军需品都囤积在这里，当时只有王家烈的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毛光祥率一个团（约一千人）守备。我军在张云逸、李明瑞同志亲自指挥下，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出敌意料，突然以密集的火力，向敌袭击，大量杀伤了敌人。这一仗，敌人死亡五百多人，缴获敌军几门大炮，六百多支步枪，十多万发子弹，一座无线电台和一大批军用品。这是红七军建立后的首次大捷，从而使军心大振。

榕江战斗胜利后，前委决定回师收复右江沿岸革命根据地。部队沿榕江乘五十只大小帆船顺流而下。五天后，到达了黔桂边境的富禄镇。由于榕江战役，王家烈部队遭到惨败，王家烈妄图报复，急忙调兵遣将，亲自率领五个主力团从我军背后向富禄镇

追击逼进，妄想把我军围而歼之。王家烈首先派代表送信给李明瑞总指挥，威胁要我军将缴获的大炮和电台留给他们。李总指挥洞察敌人奸计，他考虑到敌强我弱，不能打硬仗，就和张云逸同志研究，决定将计就计，故意答应次日归还大炮、电台，以迷惑敌人。当王家烈的代表回去以后，李总指挥和张军长立即率领部队撤出富禄镇，连夜乘船渡过河去，并将带不走的大炮等笨重物资沉入河中。次日拂晓，我军已全部渡过南岸，前面再无敌人重兵拦阻了。当王家烈部队赶到河边时，我军已经走得很远了。敌人想渡河尾追，又无船只，只好望河兴叹，鸣枪“欢送”红军。

在光复百色城的战役中，李明瑞同志同样表现了能征善战的军事指挥才华。百色山城，原是红七军军部驻地和右江地区革命的中心。自红七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主力转移外线作战以后，敌人乘机占领了百色城。当时驻百色城内的守敌有桂系警卫团岑建英部四百多人，还有地方民团三百多人。一九三〇年六月初，在张云逸、李明瑞同志率领下，红七军两个纵队齐头并进，把百色城包围起来，并把敌人压缩到碉堡里去。我军战士英勇地向敌人碉堡发起猛攻，一气攻占了许多小碉堡，只有长蛇岭的大碉堡，敌人仍踞险防守，不断向我部队疯狂射击。张云逸、李明瑞等首长都到前线观察地形，并在现场开会。一致认为：攻破大碉堡非用山炮不可。但当时山炮只剩下三发炮弹了，必须保证发发命中才行。久经战场能准确掌握迫击炮、山炮的李明瑞同志，在这紧急关头，毅然决然地接受任务，并决心非在当晚攻下大碉堡，夺回百色城不可。他随即命令攻击部队一个排运动到距离大碉堡下二百米的死角处理伏。一切布置就绪后，李明瑞同志亲自指挥架起山炮，检查了各个部位，校正了距离。第一发炮弹呼啸向前飞

去，“轰隆”一响，只见敌碉堡火光一闪，烟尘飞起，碉堡被炸开一道裂口；第二炮又把碉堡轰了一个大窟窿，敌不支，纷纷溃逃；当第三炮又命中时，碉堡里的敌人大部伤亡。炮声停止了。我军战士猛虎似地扑上去，挥刀猛砍，杀得敌人哭爹叫娘。余下的残敌狼狈逃窜，丢下了十多具破头断肢的死尸。我军分几路迅猛突进城内，敌军纷纷投降，有的过河逃跑。敌团长岑建英乔装老百姓，只身溜出城外，狼狈逃命。这一战斗，我军以极少的代价，歼灭敌人三百多人，缴获三百多支枪。至今，百色城墙上还留下了孔孔弹痕。

随后，张云逸、李明瑞同志率师东下，先后光复了右江沿岸的各县县城。

一九三一年二月上旬，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李明瑞同志率领红七军第五十五团抢渡乐昌河到达了江西省崇义县杰坝与当地崇南游击大队会师，随即配合占领县城，同时又与中共崇义县委取得了联系。为了帮助崇义县委加强领导，政委邓小平、总指挥李明瑞等军首长研究决定，从红七军中选派德才兼备的政治干部参加地方工作；并协助县委把崇南游击大队改编为红色独立营，由红七军选派有经验、有能力的军事干部担任营、连、排长。还拨出一批枪支弹药装备地方人民武装，使这个县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和壮大。邓政委、李总指挥还协助崇义县委举办了干部训练班，抽调地方部队和地方基层干部以及党、团员参加学习。邓政委、李总指挥等军首长都亲自为训练班讲课。

红七军抵达崇义县休整十来天，前委决定就地开辟根据地工作。部队在崇义的工作安排就绪之后，经前委研究决定，由邓小平同志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部队由李明瑞、许卓等

同志负责指挥。

崇义位于湘赣粤边区，是我军和敌人互相争夺的一个重要据点。三月初的一天，敌蒋光鼎、何健等部，企图乘我军十分疲劳之际，突然分几路进击，在崇义摆开合围阵势。当时只剩下由崇义到上犹、遂川方面去的一条小路，我军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为了保存革命武装力量，李明瑞、许卓等前委同志冷静分析敌情，决定采取避实就虚的作战法，利用当天细雨濛濛，到处淹没在雾海里的有利时机，巧妙地指挥部队从城北小路撤出，以两个连作掩护。当大部队撤出崇义，李总指挥立即命令掩护部队趁着大雾，神奇迅速地撤走。当敌人以两路从不同的方向向崇义攻击时，大雾濛濛，几丈远的对面都看不清楚。枪声一响，敌双方都以为对面是红军，就互相打起来。我军已撤出四、五十里，敌军还在一个劲地自相厮杀。雾气散后，敌人才觉察到是中计了，然而当天下午我部队已到达营前一带。这一仗，我军仅伤亡几个人，敌人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来从崇义出来的群众纷纷说：“敌人的伤兵死尸满街都是。”

一九三一年四月，李明瑞、许卓同志率领的红七军五十五团和张云逸同志率领的五十八团，在江西苏区永新县会合。不久，中央工农红军党的总前委指示成立河西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在赣江以西的红七军、红二十军和红独立一师（即湘赣独立师）。总前委决定李明瑞同志担任河西部队总指挥，并交给部队任务：牵制敌人的部分兵力，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一年五月十五日，蒋介石在纠集二十万兵力向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的同时，对湘赣边区根据地也发动

了进攻。河西总指挥部为紧密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在党的前委领导下，李明瑞、张云逸同志集中优势兵力向安福进攻。当时防守安福的敌军，是韩德勤师的一个旅。攻击开始时，敌人严密防守城廓，闭门不出。李明瑞同志布置了巧妙的阵势：先派出一支部队，佯攻一阵，装作包围敌军的态势。到了当天黄昏，我军便后退到三十里外的厅塘桥。这时，我军有些战士向李总指挥询问：“为什么不猛攻，反而后退呢？”李总指挥回答说：“待一会你们就明白了！”敌人不知是计，出城猛攻。此时，为了进一步诱惑敌人，调动敌人。我军继续后退，诱敌深入。同时李明瑞同志亲自指挥第五十五团和红独立一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迂回到敌后，立即发起猛烈攻击。在敌人正面的我军第五十八团和红二十军也回过头来，对敌左右夹攻。南边枪一响，敌人立即仓惶地向北撤；北边枪一响，敌人又慌忙向南逃。使敌人处于腹背受击的困境。在战斗的紧要关头，李总指挥高喊：“特务连跟我来！”亲率特务连冲杀到敌群中去，给我军指战员们鼓舞很大。他们愈战愈勇，杀得敌军丢枪弃弹，纷纷缴械投降。战斗仅一天，我军歼敌一个团，俘敌一百多人，缴获一千多支枪，迫击炮数门。李总指挥在布置这次战斗时曾指出：“只要能将敌军调动出城来，就是胜利。”果然，敌军乖乖地按照李明瑞同志的指挥行动了。

六月初，在党的领导下，李明瑞、张云逸同志率领红七军从永新出发，又连克茶陵、安仁、攸县、酃县、遂川五个县城，并配合中央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当月，党中央决定将红二十军编入红七军，以充实七军的力量，统一军事指挥。并任李明瑞同志为红七军军长，红七军党的

前委常委。

反动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还要伺机反扑。时隔仅一个月，蒋介石又调遣三十余万大军，采取集中主力“长驱直入”的方针，对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毛主席毅然决定红军向赣南后部集中，于是红军主力于七月十天左右从所在地出发，先向瑞金地区集中，在赣江两岸活动的红七军也东渡到瑞金附近与红军主力会合。到了指定地点，李明瑞、张云逸同志风尘未洗，立即参加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高级领导干部会议，商议战略行动的大体方向。从此，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直接领导下，红七军和中央工农红军部队并肩战斗，展开了粉碎第三次“围剿”的英勇斗争。八月上旬至九月中旬，红七军在李明瑞、张云逸同志的率领下，配合兄弟部队，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避敌主力，打其虚弱，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灵活机动战术，打退了敌人的猖狂“围剿”。在战胜敌毛炳文第八师的黄陂战役和高兴圩——老营盘之战；在兴国方面钳制敌韩德勤师及在全歼敌韩德勤六个团的方石岭战斗中，红七军立下了战功。九月，敌韩德勤部五十二师企图由方石岭继续向我军进攻，九月十五日，李明瑞、张云逸同志率领红七军急速行军八、九十里，直插到敌人后方，在方石岭先截断了敌逃跑的退路。尔后由东、南、北展开三面攻击。在兄弟部队的紧密配合下，李明瑞同志率领部队在黎明时分，分几路以猛烈的火力封锁敌军的前后逃路。敌人凭借石岭进行顽抗，战斗十分激烈，经过几个钟头的战斗，将敌韩德勤部五十二师全部歼灭，击毙和生俘旅长各一人。团长以下除被打死外，全部被我军活捉。敌师长韩德勤被俘后，化装成伙夫仓惶逃走。

实事求是 艰苦奋斗

李明瑞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注意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善于从实际出发。

一九三〇年八月，由李立三错误路线控制的党中央派来了代表，决定红七军的任务是：离开右江根据地，攻打柳州、桂林，在广东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然后由红七军夺取广州，完成南中国的革命。当时邓小平同志和张云逸、李明瑞等同志虽有所怀疑，但由于对党的忠诚，还是执行了党中央的命令。

九月中旬，红七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分别从平马和东兰离开右江根据地。十月初，先后到达河池集中整编。红七军三个纵队改编为三个师。张云逸同志任军长，邓小平同志任政委，李明瑞同志任总指挥，率领部队北上。留下第二十一师，由师长韦拔群同志，政委、右江特委书记陈洪涛同志带领，坚持右江地区的对敌斗争。

十一月十日，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同志率领红七军第十九师、第二十师从河池进发，开始执行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十一日占领怀远镇、向庆远镇挺进。原筹划经庆远去攻打柳州市，后因庆远守敌戒备，不得不改道经天河向罗城进逼。十四日部队到了罗城县城附近的四把，遭到敌军两个团的突然袭击，激战两天。据情报：敌军增兵陆续就到。军首长研究：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放弃反击，连夜撤出战斗。四把的遭遇战，我军先损失了三百多人。之后，军首长研究决定，先攻打长安镇，再去攻打柳州。长安城内有敌军一个师设防。广西军阀头子白崇禧也在城内

亲自督战，他并调遣韩采凤师由庆远赶来增援。我军发起猛攻，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终因敌强我弱，未能攻下。虽已歼敌五、六百人，我军也伤亡二百多人。在敌固守我硬攻的不利情况下，军首长立即命令部队主动撤出战斗。

四把、长安两仗失利，我军受了挫折。这对于入党不久的李明瑞同志来说，心里难免是沉重的。但他不气馁、也不冒失，而是冷静地思考主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他和邓小平、张云逸同志一起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特点，一致认为四把、长安两仗，虽然战士们打得很英勇顽强，但因敌我力量悬殊，不但没有突破敌封锁线，而且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人员受到了严重损失。当前敌大我小，敌强我弱。而且这时敌人已调重兵堵截、追击，准备聚歼我军。如果我们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放弃原来计划，势必要与数倍数十倍于我之敌作战，对我军极为不利，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们果断地决定放弃原定去攻打柳州的计划，随即率领部队向湘桂边境挺进，取道湘粤边境进入江西，同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领导的中央工农红军会合。

李明瑞同志对学习非常刻苦，常常是在作战行军之后，认真读马列主义的书。一九三〇年夏，盘阳战斗结束后的一天黄昏，李总指挥和张军长等首长一道，要黄松坚同志（当时是中共凤山县委书记）找个安全地点休息。黄松坚同志便带他们爬过西山到他家里。吃过晚饭不久已是更深夜静，万籁俱寂，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黄松坚同志起来巡逻，看见李总指挥身穿粗布衣，在一盏桐油灯的微弱光线下，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列主义的书。黄松坚同志上前对李明瑞同志说：“李总指挥呀！夜深了，您不疲倦吗？怎么这样勤奋学习呀？”

“不疲倦，不学习不成呀！我是个旧军官，刚参加革命，不但要向马列的书学习，还要向你们多多学习。”李明瑞同志回答。

李明瑞同志虽然从旧军队的高官厚禄中冲出来，但是他却没有旧军队的坏习气。他生活艰苦朴素，他对部下亲如兄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北上的征途中，他为了使部队在长途跋涉中不丢掉一个阶级兄弟，就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伤病员骑，并经常到军医处去探望安慰伤病员。部队指战员的流血牺牲，李总指挥都非常惋惜和沉痛。曾经当过他的警卫员和炊事员的陈景秋说：

“在红七军北上攻打全州城时，我中弹受伤，不能行走，李总指挥立即把我这个体重一百五、六十斤的人背下战场，他要赶回阵地指挥作战，又交待别的同志搀扶我找个靠得住的老百姓家安身治疗。”他还对我说：“老陈同志，不要紧张，作战总会有伤有死的。人总是要死一次的，为革命虽死也很值得的！”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李总指挥和战士们一样吃米糠、喝野菜汤。部队从道州到江华的九十里行军途中，北风呼号，大雪纷飞，寒气透骨，李总指挥和战士们一样，身穿单衣，脚穿草鞋，从没有利用职权搞特殊享受，甚至连卷烟他也不抽，只是抽旱烟。当时我们有些战士对他半开玩笑地说：“李总指挥，蒋介石准备给你当军长，当省主席，你却跑到红军来吃苦，划不来呀！”他微笑地说：

“蒋介石给我官当，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安的不是好心。他给我的苦头我尝够了。我好不容易才走上今天革命的道路，我宁愿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也不愿当国民党的高官，享受厚禄”。

许多生动的事例说明，李明瑞同志虽然身居很高职务，但他接受的物质待遇却与战士们没有两样。这充分显示出李明瑞同志坚定的革命立场，也是他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共产主义者的高贵品质的生动体现。

在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期间，中央代表团团长韦国清同志、副团长卓琳同志会见李明瑞、韦拔群、陈洪涛等烈士亲属时，对李明瑞同志作了高度的评价。韦国清同志说：“李明瑞同志担任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指挥，是一位好同志。他是为革命而光荣牺牲的。”卓琳同志说：“小平同志很惦念广西的同志和老战友的亲属，也曾谈起李明瑞同志。小平同志非常感慨地说过：‘红七军、红八军的四个领导（按：即指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和俞作豫），现在就只剩下我一人了’。小平同志要我代向你们问好！”

* * *

当我们写这篇缅怀烈士文章的时候，回忆着李明瑞同志，往事历历在目，我们不禁流下了眼泪。无产阶级坚强战士李明瑞同志的光辉形象，将永远留在广西各族人民的心中！

（兰启宣记录整理）

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

——记中央苏区保护山阵地战

邓克明

(全国政协委员 福州军区顾问)

作者的话：第五次反“围剿”所以失败，是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违背了毛主席的作战原则。为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我写这篇革命斗争回忆录献给我们年轻一代，希望他们懂得：不论打仗和工作，都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要生搬硬套，搞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中国工农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分东、西、南、北四路向中央苏区进攻。当时王明教条主义者认为，我们已经建立了中央苏维埃政权（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已经正规化了，我们同蒋介石的作战不是“围剿”和反“围剿”的作战，而是国家和国家的作战，大军和大军的作战了，他们命令红一、三、五、九共四个军团去江西广昌地区构筑工事，组织防御，死守中央苏区北大门，阻击敌人向中央苏区进攻，第一道防线设在江西南丰以南的甘竹一带；第二道防线设在广昌地区一带。一九三四年四

月敌人突破第一、二道防线以后，教条主义者又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在广昌以南的高虎脑、保护山、万年亭一带修建第三道防线。具体任务是：红五师在高虎脑一带构筑阵地碉堡，红四师在蜡烛形、宝峰山、保护山一带构筑阵地碉堡，组织防御。四师的第十团部署在蜡烛形一带，第十二团部署在保护山一带，第十一团为师的预备队。当时红四师师长是洪超同志，十二团团团长是谢嵩同志，政委是钟赤兵同志，我是十二团二营营长。

保护山原为无名高地，后来洪超师长将它取名为保护山，即保护高虎脑阵地安全的意思。保护山也是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防御阵地构筑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四师防御的成败。谢嵩团长把构筑保护山阵地工事的任务交给了我们二营。

我接受任务回来以后，当晚一直没有睡好觉。因为在未修工事之前，我听过教条主义者的报告，他们大肆宣扬阵地战的优越性，说什么红军有了自己的阵地碉堡，打仗就不要走路了，可以减少红军的疲劳，敌人来了就打，不来就练兵，提高杀敌本领。还说红军修了阵地碉堡，就不愁吃，不愁喝了。因为碉堡里储备了粮食、油盐、蔬菜，还有一缸一缸的腊肉，一坛一坛的烧酒，打仗疲劳了，喝上一碗烧酒，劲头就来了。还说红军修了阵地碉堡，就可以减少伤亡。过去红军攻打敌人阵地碉堡，吃了不少亏，死了不少人，现在也要让敌人尝尝红军碉堡的滋味等等。我当时认为教条主义者讲的这些优越性有一定道理，也符合红军战士的愿望，兴奋得一晚睡不着觉，反复考虑如何把保护山阵地碉堡修得坚固些，打一次漂亮的阵地战。

第二天早饭后，我把全营排以上干部带上阵地观察地形。不久谢团长、钟政委和一、三营营长、教导员也来到了我营阵地，

同我们一起观察地形。看完地形以后，谢团长对如何选择阵地、构筑工事和火力配备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根据团长指示，我又召集全营排以上干部在阵地上开会，认真研究和布置了修筑工事的有关问题。

我首先分配了各连修筑工事的任务。把红五连分配在保护山主要阵地上构筑防御工事，四连分配在五连左翼的高地上构筑工事，六连派两个排帮助五连，另一个排帮助四连修筑工事。

根据广昌战役的经验，我认为敌人害怕攻坚（在广昌战役中，敌人避而不攻我营防守的广昌正面的坚固阵地，而从我阵地左翼迂回进攻广昌），因此我们这次修建工事要力求坚固。要在我们阵地前沿设置竹尖区、地雷区、外壕区、鹿砦区四道障碍，这四道障碍都要配备交叉火力。各阵地之间和阵地后面都要挖交通壕，阵地和阵地之间要有火力互相支援，轻重机枪要有交叉火力的配备，要互相消灭友邻阵地的死角。修建碉堡要就地取材，搞土木结构。碉堡顶上要用一层木头、一层泥土盖起来，把它盖得厚厚的。

我还特别强调了这次修筑阵地工事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我们缺乏修建工事的材料，但又必须把工事修坚固，做到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构筑阵地碉堡，时间紧，任务重，工作艰巨，既需要大量人员挖战壕，修碉堡，削竹尖，埋地雷，埋鹿砦，又需要大量人员出去找毛竹，砍树木，向群众借刀、斧、锯、锄等工具。因此必须严密分工。谢团长规定我营二十天完成构筑阵地工事的任务，我们要争取十五天完成。

各连回去以后，立即召开党支部会和革命军人大会，传达谢团长的指示和营部给各连的任务。大家听了传达以后，情绪很

高，信心很大，劲头很足。许多同志议论纷纷，有的说：“过去我们吃了敌人乌龟壳（碉堡）不少的亏，厚厚的家伙，机枪打不进，手榴弹炸不开，只好和敌人死打硬拼，不知打死了我们多少人。”还有的说：“今天老子修起了碉堡，也要让敌人尝尝红军碉堡的滋味！”许多红军战士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有的当天晚上就去向群众借工具，有的天还没亮就一班一班的出去借工具，找毛竹。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工作之后，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第二天拂晓，各连提前吃了早饭，就把部队带到指定的阵地上，开始构筑工事。有的赤着脚，有的光着背，开展了一场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司务长为了使部队吃饱吃好，争取提前完成修筑工事的任务，都在想办法改善连队伙食。各连都杀了大肥猪。有的炊事员还在田里抓泥鳅，有的在河沟里摸鱼。他们把一盘盘美味可口的回锅肉和红烧鱼送上阵地，大家吃得很欢。红三军团政治部、红四师政治部和各兄弟部队都组织了慰问团，先后来到我营阵地进行慰问，演节目，送慰问品，锣鼓喧天，欢声动地。嘹亮的口号声，噗噗的挖土声，丁丁的伐木声，沙沙的锯木声，在阵地上汇成一支欢乐的交响乐章。我们在这一片热烈欢腾的气氛中进行着忘我的紧张作业。经过十五天的奋战，终于提前完成了团部给我们的任务。当时我想，有了这样坚固的防御工事，不仅能挡住敌人的进攻，而且有把握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然后把预备队用上去，实行短促反突击，把敌人消灭在我阵地前沿。我营全体指战员和我一样，战斗情绪都很高，胜利信心都很足，都决心打一个漂亮的阵地战。

工事修好以后，敌人还没有行动，我营战士便一面休息，一

面学习。在休息待战期间，大家非常活跃。有的拉胡琴，有的唱山歌，有的唱地方戏，有的摆龙门阵，有的去河沟里抓鱼……。整个部队洋溢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有一天，我正高兴地同几个战士在河沟里摸鱼。忽然，一个传令兵气喘吁吁地向我跑来。“报告营长”，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请你赶快到团部去开会！”我听了吃了一惊，手一松，抓到的鱼也跑掉了，我急忙上岸穿上麻草鞋，跑到团部去开会。一进门，我就问谢团长：“是不是敌人要进攻了？”谢团长回答说：“刚接到洪师长的电话，说敌人有行动。”接着谢团长在会上传达了洪师长的指示，说罗卓英、周浑元、樊崧甫三个纵队有向我进攻的企图，敌人在山上的帐篷都收起来了，向我派来的侦察兵也增多了，估计敌人快要行动了。说完，谢团长就分配各营的战斗任务：要一营坚守保护山阵地，二营和三营为团的预备队。我听到把坚守阵地的任务交给了一营，顿觉扫兴，眼看在阵地前狠狠打击敌人的打算要落空了。没等团长把话说完，我就请求团长把坚守阵地的任务交给我们二营。谢团长说：“你们二营修工事很疲劳了，需要休息，恢复体力。”接着钟政委也说：“这次分配各营的战斗任务是经过团党委研究的。大家认为二营修工事提前完成了任务，是有功的，你们很疲劳，需要休息，所以分配一营坚守阵地，二营和三营为团的预备队，这样做是比较恰当的。”我说：“保护山的阵地工事是我们修的，地形我们摸得很熟，我们还在阵地前沿掏了几条隐蔽的交通壕和一些暗的手榴弹投弹所，还配备了一些暗火力点。这些情况一营不熟悉，只有我们二营熟悉，所以把坚守阵地的任务交给我们二营是比较适合的。”后来团长、政委都说：“二营疲劳了，需要休息。”我

说：“从修阵地开始，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听到一个人说有什么疲劳。不但不疲劳，而且个个精力充沛，战斗情绪很高，消灭敌人的信心很足。”经过我再三请求，团长、政委才同意把坚守阵地的任务交给我们二营。

我从团部开会回来，立即召开全营排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谢团长讲话精神，首先说明这次坚守保护山阵地的战斗任务是经过我再三请求，团首长才同意交给我们二营的。所以这一仗必须打好。要发扬太阳嶂阻击战以少胜众、顽强防御的战斗精神，打一次漂亮的阵地战，把敌人消灭在我阵地前沿，决不能辜负团首长对我营的期望，并告诉各连提前吃晚饭，吃过晚饭，各连把部队带到指定的阵地上，把各班排的位置和任务分配好。六连是营的预备队，都带到指定的位置待命。

八月下旬，我们进入阵地的第三天，天还没有破晓，突然在我阵地前方传来了一阵犬吠声。我估计敌人开始向我阵地进攻了，就派通信员通知五连加强阵地前沿的潜伏哨和警戒部队，严密监视敌人的活动；并通知各连提前吃早饭，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正当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忽然听到隆隆的飞机声由远而近。一眨眼间，三架敌机就飞临我阵地上空进行低空盘旋侦察，反复数次，但没有投弹就飞回去了。

天刚亮，又来了六架敌机。它们轮番在我阵地前沿进行猛烈的轰炸和低空扫射。敌人的许多大炮也一齐向我阵地进行猛烈的轰击，重炮弹、硫磺弹、燃烧弹、烟幕弹象雨点似地向我阵地打来，炸得我阵地上空尘土飞扬，浓烟滚滚。敌人飞机、大炮的这次轰击，目的是摧毁我阵地前沿的障碍，为步兵开辟进攻道路，掩护步兵向我进攻。正当敌人炮火向我阵地纵深延伸时，我从营

指挥所里的射击孔向外观察，只见山腰上、山脚下、田野里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敌人，大约有三、四个团的兵力。他们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采取营方队的密集队形正向我阵地猛扑上来。当敌人第一梯队通过我地雷区时，我命令地雷手一齐拉雷，但没有拉响一个，全被敌人破坏了。眼看敌人快要接近外壕了，这时我在营指挥所打出一发红色信号弹。我营坚守阵地的指战员一见信号弹，便一齐向敌人开火。雨点般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轻重机枪喷吐着长长的火舌，愤怒地吞噬着敌人。特别是三挺重机枪的交叉火力，打到哪里，哪里的敌人就一片一片地倒下去。红五连轻机枪班长李应根同志的轻机枪也打得很漂亮，一群一群的敌人在他的枪声下纷纷倒地，打得敌人尸横遍野，血染山岗。没有打死的敌人，则丢盔弃甲，抱头鼠窜地跑回去了。

在打退敌人第一次进攻以后，接着敌人的第二梯队又上来了。这时敌人的飞机又向我阵地和阵地后方进行狂轰滥炸和低空扫射。敌人的炮弹也一排一排地打来，在我阵地四面八方爆炸。震耳欲聋的重炮弹，催人呕吐的硫磺弹，火焰熊熊的燃烧弹，浓烟滚滚的烟幕弹，象暴雨般地倾泻在我阵地上。其猛烈的程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进攻。我们阵地上的轻重机枪工事和手榴弹投弹所全被摧毁了，排与排、连与连之间的交通壕也被破坏了，营指挥所与团部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由于这次敌人打了很多硫磺弹，所以我们很多同志都中了毒，有的昏倒在地，有的躺倒在地，下翻肠倒肚地呕吐苦胆水。还有许多同志的耳朵也被震聋了。阵地上硝烟弥漫，烟雾滚滚。这时阵地外面的枪声听不见了，敌人的活动也看不清楚了，外面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我心里有些着急，就派一个通信员去四连阵地看看情况。刚出去通信员就跑回

来了，神色慌张地对我说：“营长，不好了，敌人已经到了我们的头顶上（指我阵地的碉堡顶上），五连通往四连的交通壕也被敌人切断了。”我听了大吃一惊，立即又派几个通信员分头去找五连的连排干部，要他们赶快到我这里来。不久，派出的几个通信员都回来了，他们对我说：“阵地的交通壕里都是一片黑烟，伸手不见五指，连里的干部一个也没找着，只听见许多同志在战壕里哇哇地呕吐。”我感到情况十分危急，便当机立断：马上突围！

这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我带着身边几个通信员一同去五连阵地。告诉他们准备突围。只见五连许多战士都躺在地上呕吐苦胆水，讲不出话来。有的能讲几句话，但也走不动。我对他们说：“敌人已到我们头顶上，我们要立即突围，能走的就跟我走。”我立即把人员集合起来，包括通信员在内，能突围的还不到二十人。

我把突围的同志分成两组：第一组三人，每人选带几个济南造的手榴弹；其余的同志编为第二组，步枪都装好子弹，上好刺刀。第一组在前，第二组在后，我在第一组和第二组之间。我们刚走出阵地口，就发现交通壕两边有敌人看守阵地口，切断了交通壕的出路。第一组的同志眼尖手快，立即向交通壕两边投去几个手榴弹。这几个手榴弹很起作用，把敌人炸的炸死了，吓的吓跑了。我们乘此机会冲出了交通壕。敌人的轻机枪没来得及向我们射击，只是向我们打了一些步枪。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我们十多个同志无一伤亡，全部顺利地突围出来了。

当我们突围出来刚走下五连阵地时，又发现我重机枪排在阵地上还没有撤下来。我叫他们立即撤下来跟我走，他们说：“敌

人正在抢我们的重机枪，我们撤不下来。”当时敌人在鹿砦外面拉着重机枪的两条前腿，我重机枪排的战士在战壕里拉着重机枪的后腿，双方正在拼命争夺。这时，我们重机枪战士都发呆了，身上有手榴弹也忘记了使用。我就派两个战士冲上去，向敌人投了几个手榴弹，敌人死的死，逃的逃，这样我们才把重机枪夺回来了。

我们突围出来以后，加上重机枪排的战士在内，还不到四十人，我们一面走路，一面闲谈。

我问重机枪排的同志：“我们团部走了多久？”

他们回答说：“已经走了一两个小时了。”

我又问：“你们为什么不走呢？”

他们回答说：“因为你还在阵地上没有出来，又没有接到命令，所以我们就没走。”

由于大家都很疲劳，我们就在行进道路上的一个小山坡上休息。坐下一看，只见保护山阵地上和其它大小山头上都站满了敌人，估计有两三个师的兵力。我们休息了一会继续前进。这时我一面走，一面想：为什么过去我们红军都是打胜仗，既消灭了敌人，又补充了自己，扩大了苏区；现在为什么老打败仗，特别是保护山这一仗，损失这么大，把我们三军团的模范红五连搞光了，我自己也差一点当了俘虏，实在痛心。为什么会打败仗？是红军战士作战不勇敢吗？是指挥员指挥不当吗？都不是。我开始感到打这种阵地战有问题，但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这是教条主义者造成的恶果。我一面想这些问题，一面寻找部队。找了六、七天才找到了部队。

我找到部队以后，首先来到十二团团部。我刚进团部大门，团部的通信员就看见了我，他高兴得跳起来，大声叫喊：“邓营

长回来了！邓营长回来了！”谢团长和钟政委听到后，立即从房中出来，高兴地同我握手，这时，整个团部都沸腾、欢乐起来了。我还没有坐下，谢团长就打电话给洪师长：“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我团二营营长邓克明同志回来了。”谢团长打完电话，笑嘻嘻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我相信你一定能回来。有的同志估计你不是被打死了，就是当了俘虏。看，现在你不是真的回来了吗？”我也笑着说：“只差一点就被俘了。”我又说：“为什么我们过去都是打胜仗，现在都是打败仗？这次保护山阵地战，把我们模范红五连搞光了，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人……”讲到这里，我再也说不下去了。钟政委对我说：“你不要难过，你们在保护山打仗时，因为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敌人集中了三、四个师的兵力，从高虎脑的左翼和保护山的右翼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对我军进行了分割，使我军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洪师长奉三军团命令，决定放弃阵地，全军撤退。当时同你们的电话联系已经中断，又无法徒步向你们送信，所以我们只把你们二营的四连、六连和五连的炊事班带回来了。红五连包括伤病员在内，还有三十多人，把你带回的十多人加上，还有五十人左右。我们准备从一营、二营抽调一些党团员补充红五连，决心帮助你们保持全军模范红五连的光荣称号。”接着钟政委又对我说：“告诉你一个消息，党中央决定红军撤出中央苏区，还要进行补充，要把你们二营的兵员补齐。”我听了钟政委的讲话以后，非常高兴，把压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搬掉了，象这样倒霉的阵地战不能再打了。

保护山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打过此仗以后，红军就撤出了中央苏区，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我，就是最后撤出第五次反“围剿”阵地战的一名红军战士。

向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工作的回忆

王 亚 文

我是湖南醴陵人，今年七十一岁，在读高小时听说同乡李立三在安源矿搞工人运动，便去找过李，李对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启发很大。一九二四年罗学瓚（中共第一任醴陵县委书记）介绍我加入共青团，二五年入党。读中学时，开始搞学生运动。后来到了广东，曾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

大革命失败后，我回到家乡搞农民运动，参加秋收起义。当时，县委书记是林蔚，后来省委书记王一飞派了滕代远当党的湘东特派员，我是共青团特派员，协助滕领导农民暴动。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镇压，许多人被捕杀害，有的党员全家惨遭杀尽，我父亲也被捕坐牢，我被悬赏通缉。后来，滕代远去平江彭德怀部队当政委，我便转移到长沙。到长沙后没有找到省委，又到了湖北宜昌，去张发奎部当了一个时期的兵。情况稍缓后，我又到了武昌，根据党的指示拉了几个月黄包车，做码头工运工作，后又去读高中。

一九三三年到了北京，先在朝阳大学，后到北京大学读书，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回到长沙参加恢复省委和长沙市委的工作。三七年北大、清华、南开几个大学转到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我又入“临大”读书（后来“临大”转移到昆明改为西南联大）。当时湖南临时省委书记是高文

华，聂洪钧是临时省委副书记兼临时省军委书记，我在军委任总干事。三八年，长沙被国民党放火烧后，总理、叶帅到了长沙，决定撤退。党组织决定我与一批党员去西南联大读书，并搞学生工作。一年后，我在西南联大毕业，组织上决定我去重庆“周公馆”报到。我先见廖似光同志，以后，由总理、董老、叶副主席决定我留在重庆，做国民党上层的工作。我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做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芑生、国民党副总长程潜、军令部次长刘斐的工作。后来，总理又通过张治中，叫我打进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跟中将总队长张权当上校秘书。总理并交代我在重庆办了个刊物，叫《生力》。在此期间，总理、董老、叶帅也经常亲自找王芑生、张权、王芸生等做工作，并通过《大公报》发表社论，宣传坚持抗战的道理。

日本投降后，董老去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大会，由王若飞领导我。后来，王叫我去长沙工作。

一九四七年三月，董老通过当时在上海主编《时与文》杂志的汤德明通知我，叫我到上海。我到上海后，总理、董老等已在三天前先后回延安去了。汤告我：“董老临行匆促，来不及和你会面，我不知道要你来干什么工作。”我要汤请上海地下党代为请示董老。后来，汤告我：组织决定暂由汤联系我，要我暂做些有利于党的工作，听候党的指示。不久，我便在张登（沙文汉）领导下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

一、对李明灏进行的工作

来上海之前，原国民党军界老前辈李明灏已来上海。我想在没有接受正式任务前，抓住这个旧有的关系，做好这个

人的工作，尽最大可能动员他到解放区去。我把这想法向汤德明汇报后，汤说：“李明灏^①接触面广，认识人多，是否会‘眼高手低’或者‘眼高手也不低’呢？他若不采纳你的话，不仅对争取他的工作做不好，反而出大危险，影响我们展开其他工作。”我说：“李明灏从大革命失败后，曾一度旅居北京，潦倒无事多年，与我党一直是‘藕断丝连’。后来他在北京有了种种困难，呆不下去了，又出任中央军校成都分校的教育长，几乎和我党没有关系了。但我们党始终没有放弃这个人。虽然在严重白色恐怖下，不时还是若明若暗地对他做些工作，提高他的思想认识。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充任重庆所谓国民党首都警卫军军长时，与董老直接有联系。董老经常对他阐述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我和李明灏那时就已认识。董老叫我和他搞好朋友关系，但不要暴露身份。由于董老的耳提面命，我与李的关系也搞得很好。除党内外界线有分外，几乎无话不谈。”汤听后说，看来李的工作是可以作的。经过研究决定后，我就去作这个人的工作。我去看他两次，谈话融洽。第三次去时，送了几篇太平洋学会军事评论家在杂志上发表的军事论文给他看。这几篇论文深刻地指出了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道理。以后，我又去找他几次。与此同时，他已与我党别的同志也有了接触。董老在那次飞返延安之前，也找他谈过话（解放后，董老告诉我的）。因此，他对共产党救国为民与共产党必胜的认识一步一步地提高了。虽然如此，

^① 李明灏，字仲坚，系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十三期毕业生，曾任孙中山在广州主办的军官讲武堂（后改为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时为程潜下面的十九师师长，后任国民党部队的军长、警备司令等职。三十年代初，李就与我党有联系，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毅然奔赴华北解放区。解放后历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湖北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武汉去世。

但是他去解放区的念头还是犹豫不决的。我反复向他说明党中央的政策，晓以利害得失，再三劝他去解放区，他才接受。不久他就由上海到解放区去了。到了党中央见到了朱总司令，后介绍他去东北，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在东北解放军总部广播电台向国民党军队一日数次广播，号召国民党军队起义。由于他系国民党军界前辈，学生多，部属多，他的行动对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还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我人民解放军进入湘鄂两省作战时，李明灏与黄雍（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都对策动程潜在湖南起义作过贡献，李明灏并是我人民解放军派出对程潜谈判的代表者之一。

二、接受党交代的策反任务

我到上海后，了解到当时上海敌人的情况是：国民党派来了一个青年军，分驻在上海郊区各县，军长为罗泽恺。由他分派一个师到市区驻扎在西体育会路至复旦大学一带，师长为方懋楷；一个由蒋经国亲自指挥的摩托化团，驻扎在市中心区，团长为钟勉；以及驻扎在徐家汇一带属于毛人凤特务系统的周伟龙的交通警察大队。方、钟、周三人中，方懋楷是我早熟识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曾介绍董老和王若飞与方先后谈过话，方都表示获益很大。钟勉我不认识，但我知张照谷（南京警备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与钟勉关系好，我便通过张与钟勉联系。张照谷在重庆时，我是通过同情我党的国民党九十三军副军长符昭璠介绍给我的，符 解放战争中 西北起义。周伟龙虽然我党有同志与他面熟，但相识太浅，一时找不到比较适当的人做他的工作，有待寻找线索。不久国民党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中将总队长张权来到

上海。我知道张十分同情我党，我们一向把他作为党外干部。他来上海，对我在国民党部队中开展策反工作非常有利。张权和我一碰面就说：“蒋介石自恃日本已垮，把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番号取消，将我所主管下的分布在各战区的机械化炮兵团（团长均少将级，一个团相当于一个师的编制）分配给各战区，夺我兵权，命我去黄河西任河西警备副总司令。”并说：“我在南京与蒋见面时，对蒋发动内战，提出了谏。蒋对我的谏言十分恼火。进言时，侍从室第六处主任唐纵（属毛人凤特务系统）也在旁，他对我也提出了异议，语言刻薄。看来今后我很难干下去了。蒋介石和袁世凯一样毒辣，必置我于死地。”我给他分析了形势，使他加深认识了蒋介石的反动真面目。张权说：“蒋介石不见棺材不落泪，和谈是幌子，内战他是要打到底的，垮也是要垮到底的。”

根据上述国民党军队在上海的情况，为了做钟勉的工作，我就先请张照谷由南京迁来上海，寓居上海北四川路，要他经常去与钟勉联系。至于青年军师长方懋楷，我知道他是张权的学生，也是张权的旧属，他在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时，我早就认识他，那时他就比较进步，我想先试探一下他的态度。于是促成张权和他见见面。取得张权同意后，约好在我家叙谈。我有意识地告诉方懋楷说：“原重庆的警卫军军长李明灏已往解放区去了”，并向方说：“你和我与他都熟识，他此去你有什么感想？”方说：“此事早已听说，国民党不行嘛！腐败嘛！蒋介石还苛刻排挤他，那能不走！”张权听了后，隐隐约约地对他说了一些国民党必然垮台的话。方懋楷表现不差。

有一天，党组织找我说：“明天午后二时，有一位同志来与

你接关系。他会说：‘我是渔管处来的’。那位同志就是你以后的领导人。”次日午后二时，果然有人敲门，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进来说：“我是渔管处来的，名叫张登。”停了一会，对我的回答、神气打量一下，然后才说：“我是新四军对敌作战部部长，也是城市工作部部长。是董老叫我来找你的。是代表上海局，代表刘伯承和陈毅同志来领导你作对敌斗争工作的。”我欣喜若狂，向他汇报了我来上海后的工作情况。他恳挚地说：“中央指示要积极搞好高树勋式的起义运动。你过去在周恩来同志、董老、叶剑英等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地下对敌斗争时，接触过不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现在正是利用这些关系的时候了。”我听了以后，全身都是力量。我说：“瓦解敌人是有许多工作要作的。”他说：“今后上海是决定消灭国民党主力军的重点地区之一，我们对敌工作的计划和对策应注意如下事项：（一）利用现有的工作关系打开局面；（二）国民党的军政首脑，只要他们是诚心诚意起义的，从宽处理，立功赎罪，而且允许保留他们的职务；（三）地下党的某些负责人、电台，以及其他方面的关系，可能你是熟识的，他们是这次和谈破裂时，董老把他们留下来做策反工作的。这些你都不必去管，假如在路上遇到，也不必打招呼。在工作上如果碰到一起时，有的可能他们去争取，我们也去争取，那就要衡量哪一方面与争取对象关系比较深。要依据关系深浅，衡量谁去联系。我派陈约珥同志（王锡珍）来与各方面联系，遇到这一类的事情，都由他出面解决；（四）郑振华、林震峰等同志都有军队中的朋友，有策反对象，你装作不知道，由陈约珥同志每周召集他们和你一同过一次组织生活。早些能在一块相互熟识，以利以后工作上的方便；（五）工作上需要钱，组织上都有准

备，随时可到陈馥老太太那里去取；（六）黄浦江上军舰云集，一旦沪战爆发，外舰可能干涉，中央的政策是坚决抗击，彻底打垮；（七）敌人越到灭亡的时候，越是疯狂。今天要准备明天被捉、牺牲，更要准备明天的接替人。”最后，他任命我为上海策反工作组组长。

张登同志还特别向我交代了海军策反工作。他说：“海军策反工作是周恩来同志和董老亲自做了多年的工作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参谋长兼上海办事处主任周应聪（现交通部参事）有八条主力舰；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有大小舰只七十余艘，只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细致地工作，都可在我们掌握之中，这是埋在蒋介石内脏的一颗重磅炸弹。现在海军的策反工作，就交给你去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你斟酌去办。”交代过后，张安排日期要我与周应聪等碰头。接着他又把已掌握的策反对象介绍给我。他约我和何燧见面之前说，你去见何燧时要叫他老伯，因为他的儿女都是党内同志（我没有问过，迄今还不清楚谁是他的儿女。解放后，何燧为华东司法部部长）。他介绍我先后和吴石、蒋子英等见面之前，说他们都是陆大毕业的，吴石是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处长，蒋子英是陆大教官，他们都是与海军实力派有关系的，早就是我们做海军工作的中介人。空军策反虽有些基础，但发展不大。要留在空军内部做种子飞机的林卓（名可能有误，但姓是对的）负责。他反复向我说明“以虞待不虞者胜”的道理，我向他表示“兵无常胜，水无常形”，我一定依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他的指示办，“合乎利而动，不合乎利而止”，要他放心，并请他转告周恩来同志和董老。

三、对国民党海军和空军的策反工作

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在宁、沪、杭作垂死挣扎。我人民解放军经一度休整，枕戈待旦，飞渡长江。这时蒋介石窜到上海复兴岛，在永兴舰上指挥作战。张登同志与陈约珥同志照原约在虹桥公墓同我碰头，决定海军起义，北开解放区。经我与国民党海军参谋长周应聪研究后，作了全盘部署。我们决定先把永兴舰上我们的同志请上来，然后把永兴舰连人带舰一并炸沉，其它军舰由我偕周应聪率领静悄悄地北驶解放区。不料，蒋介石突然上岸到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办公。我们在永兴舰上做过工作，同时还有党的其他同志，也在这条军舰上做过工作，由于事先互不通气，以致另一方面的同志先发动这条军舰北开。军舰上舰长是我们党的同志的父亲。儿子要北开，父亲认为两岸有国民党的陆军，天空有飞机，北开是绝路。儿子一定要开，父亲跪在儿子跟前不允。事情暴露了，群众哗然。儿子迫不得已采取了毅然决然的手段，先把军舰上的特务锁进仓库，想很快北驶。但因技术欠熟练，而又事迫时急，行驶维艰。遂打开仓库，命这些被关的人出来协同驾驶，他们不从，反夺去手枪，持枪顽抗。我们的舰长父子二人不得已投水自尽，酿成悲剧。事发后，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一举杀了副舰长、大副、二副、轮机长及其他工作人员共三十余人，他们都是平日说过一些不满现实话的无辜群众，其中并没有我们的同志。此时，我和周应聪还正部署军舰北开，准备即偕周应聪上军舰。就在那天的晚上，刚开电灯不久，我进周应聪住宅，他家里的人刚把门关上，就有人敲门，说桂总司令请周参谋长去开会，语气汹汹，家人知非善

意，便慢吞吞地回说，周参谋长不在。等我跨出厅堂，从另外一个边门走出后，才开了大门。我满以为边门一定有人把守着，准备被捉。还好，他们没有想得这样周到。我马上找到陈约珥，要他千方百计找到周应聪，通知他不能再回家，我在愚园路岐山新村的一位同志家等周应聪一同上军舰。

我们三人先后碰头后，都感到海上军舰一片混乱，向解放区北开已不可能。因此，只有设法分别找到那些比较可靠的人，命他们上军舰潜伏不动，等待时机再说。另外，我还找到何燧、吴石，要他们尽最大可能替我们做些安抚工作。我们原定八条主力舰北开解放区的计划，一时没有完成。

遇到了这样大的阻力，我感到策动南京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起义更为重要，不能坐失时机。这时，陈约珥和我共同商议，决定借用周应聪的专用汽车，派党组织当时供职在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的负责人何友格乘坐，带上我以“张子舒”名义写给林遵的信（林在重庆时，总理曾要我以张子舒的化名看望过他），驰赴南京，代表党中央向林遵下达立刻率舰队起义的口头命令。同时用张登的名义，想方设法找到人民解放军进攻南京先头部队的首长。要林遵在迅速做好起义各项准备工作的同时，派人偕同何友格迎接解放军上军舰，协助人民解放军打个里应外合的大胜仗。何友格机智勇敢地、顺利地完成了策动林遵率舰起义的工作。林遵亲率三十几条军舰在南京起义了。义举所及，影响很广，相继起义的一共有七十余艘军舰。

就在此同时，林卓同志正策动空军起义，来找党组织接头。当时估计约有七十余架飞机可以起义，但起义人员的安家费必须支付。根据张登同志的决定，用必须要支付的费用时，可去找陈

馥老太太，但因起义事急，没有等待我们去拿安家费，五十余架飞机已经起义了。

在这里我又回想，对国民党空军部队的策反工作，在张登同志交代任务时，仅有林卓同志发展和掌握的三架到五架飞机。在工作渐渐有了进展时，我与空军才有些接触，做了一些宣传和策动起义的工作。

在空军起义之前，我已到陈老太太家去取过起义经费。一次是南京警卫师师长王晏清江宁起义，牵连其舅父邓昊明在内，国民党以叛国罪登报通缉。邓昊明和夫人李君素及与我党有关同志李益之由南京逃来上海，上海局要李益之、邓昊明都往香港暂避，当时给予银洋一百元。第二次是，王晏清起义后，其夫人被监视，致使生活无着，再去陈老太太处取银洋一百元，由陈约珥同志着人送往南京，设法交给王晏清被监视的夫人。其后又往陈老太太处取用了银洋四十元，送给张权夫人胡雪影。解放后，我才知道陈老太太是张登同志的岳母。最近才知道，她在多年前已逝世。回想她热心、机智、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形象，感动无已，私情公谊，永志不忘。

四、对国民党陆军的策反工作

有一天，张登同志对我说：“张权是一个顶好的参谋长，叫他不要去任河西警备副司令。”并说：“国民党的主力不在河西，我们在东北、河北、中原、华东、华南、西北与它们的主力作战。河西是薄弱地带，如同豆腐那样软弱，不打自溃。要把他留在京、沪、杭，利用日本士官学校出身和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之间互相倾轧的矛盾，去找何应钦。建议在京、沪、杭三角

地带土匪出没无常的太湖区域，以绥靖太湖、保卫京、沪、杭为名建立一个太湖警备区，要何派张权为太湖警备司令。要张权放弃河西之行，作长远一些打算，管辖地区不要大。初时兵力也不必那么多，只要取得公开合法地位，等待时机。”

晚上，在老白鸣钟附近葛仲平家里，张登和我同张权见面。张权同意放弃往河西工作。后由上海师管区司令（征兵机构）傅正模（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和其部属蔡参谋长（忘了名字，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拟就了一个建立太湖警备区的计划，送往国民党国防部。经何应钦批准后，张权尚未去就任，适淮海战役前夕，张登要他利用其在国民党的中将地位，往前线作一次视察以后再说，以利全面掌握敌人的动态和军事部署。张承诺后，即利用与国民党后勤总司令郭忏的私情和诉以公谊，请准以后勤总司令部的中将视察员名义，往前线担任战时各兵种的军用调拨和军需补给的任务。所以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时，他都到过前线，了解军情。特别在渡江战役之前，他在沿江各线，见缝插针，几乎敌人一连一营的所在据点，他都了如指掌。返沪后，他用了三天三晚的时间在我家由我和我的爱人陪同绘制了沿江一线敌人的兵力、工事布防图，提供给了解放军。张权绘制的敌人布防图与吴石同时拿给我的国民党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我一并交予陈约珥，迅速设法送往我前敌指挥部。

国民党在全国各战场，节节溃败，蒋介石妄图作垂死挣扎，将许多部队调至上海，全国各地的炮兵几乎全部调来了。吴淞的炮兵司令是邵百昌，张权曾去观察过邵所部署的阵地；原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所属的机械化炮兵团，也是新近开进驻守吴淞的。

张权认为从起义观点来说，以驻扎西体育会路刘仲泉团是比较有战斗力的一个机械化炮兵团，临战时可占据四川北路底施高塔楼的那所大楼，沿西体育会路向蕴藻浜、张华浜打出去，迎接解放军入城；新近来沪驻扎在杨舍营的一个师，师长王挽危，从小就随张权在部队工作多年，早已不满内战；驻扎在交大的刘钺（名可能有误）军长系东北军旧部，与张权私交甚厚。我化名张华忠代表党与其洽谈数次，允予响应起义，亦属起义可靠之军；那个青年军师长方懋楷驻扎在浦东；上海市区有钟勉这个摩托化团在。经过分析，认为发动起义有较好基础。但还须细察这些国民党部队的首脑掌握下属的程度，还要了解其所属有多少复杂问题。并积极物色和组织各单位的领导核心，以争取和团结广大官兵一同起义。对于特务，有的派他们临时公差，有的派到后方留守，有的怂恿其回乡省亲。总之不使这些家伙接触起义部队。当时我们的计划重要事项是，由郑振华（解放后任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已去世）担任破坏机场工作；由张权单线联系的青岛派的陈舰长（名已忘）在吴淞口的要隘处，炸沉他那条军舰，使飞机不能起飞、军舰驶不出去。只要指挥灵活，不失机宜，蒋介石必为我活捉。

在国民党一片溃败声中，来上海的国民党部队日多，张权熟识的旧军官也来得多了。张登同志指示，不再多开辟关系了，只需要注意现有关系是否可靠。战争风云愈紧，复杂问题愈多。就在此时刻，蒋介石亲自来上海，指示机宜，妄图挽回战争残局。一日召集驻沪团级以上军官并偕于斌、胡适、陶希圣等在震旦大学礼堂开会，胡、于、陶三人先后讲话，互相吹捧一番。集中一点是说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美国随时会给国民党援助，不会让我们失败，并即由台湾增援三个美式装备的军到上海，只要死守三

个月至半年，必然打垮共产党等等。最后，蒋介石又向大家吹嘘一番。敌师长王挽危在这次会后起了变化，由他的胖夫人送来了密封的给张权的一首诗：“羨公勇攀列宁山，古柏参天耐霜寒。惆怅不堪附骥尾，各行其志勿相残。”张权给我看了之后，立即手拟回敬一首诗：“新词一曲乐悠悠，歧路原应早回头。子路闻过辄自喜，反戈一击是上游”。张权自揣那天王挽危不会立刻回杨舍营，他便赶到杨舍营，看王挽危的儿子。据张说，那位胖夫人倒是随即回杨舍营了。张平日对他们甚好，在一块如一家人一样，什么话都谈。鼓励他的家人去做王的工作。适逢蒋介石又玩弄一套花招，命令在沪团级以上军官的眷属一律乘专轮往台湾。王挽危的家人都不愿去。张正好借此向王进言，结果他们一家共同决定听张权的话，并决定用家属尚未来沪托词，搪塞家属运往台湾的花招。听到这一消息，张权再去看王挽危，我也化名张华忠代表党组织去见王，见其表现尚不错。他打消了幻想，从而接受张权的意见，作了响应起义的部署。不过，另外听到方懋楷的家属准备上往台湾的专轮了。我赶去和他谈话，他表现十分矛盾。最后还是得不到克服。他说：“我的儿女多，我的老婆系中央大学毕业的，与共产党陆定一的夫人同学，很多人都知道。不去，令人怀疑。届时想不出一个理由向人家说清楚，十分危险。反正，国民党垮台总还有点时间，我是叫化子出身的，系蒋经国一手提拔的。真正举起枪杆子打国民党还要等一个时期。假如共产党部队向浦东我所驻守的阵地进攻，我一定举起白旗开个缺口，让共产党可以长驱直入。我自己解甲归田，做一个好农民。”经过分析，他所说的话，颇如其人的性格。随即把这个消息送往我人民解放军前敌指挥部。

在谈方懋楷关系时，还得谈一下张登同志交来而我们又早接上的另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方懋楷下属的一个团长乐在中，他也是张权的学生、老下属，与张权的关系很好。这个关系交给陈约珥后，由张权与他单线联系。张权给予乐在中我党的整风文件看后，他向张权说：“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从前没有看过这样的东西，只听谣言，今始知今是昨非。”等他有了一定的认识后，陈约珥和他碰过头，我也化名张华忠和他谈过话。原可通过我们掌握的乐在中的这一个团，起到挟持和保证方懋楷这个师起义的作用。不料，乐在中忽然被其军长罗泽恺撤职了，岔子不知从何而来。乐既被撤职，即由陈约珥去把他留下来暂时安顿在一位同志家，听候党组织安排。

至于方懋楷的情况，当我人民解放军向浦东方面进攻时，他立刻派其参谋长刘昌泰（湖南攸县人，黄埔四期毕业）前往我人民解放军驻地接洽，放下武器，打开了我军进攻上海的缺口，减少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我还与张权到漂阳路（当时叫狄思威路）的国民党吴淞炮兵司令部百昌家，进一步摸清楚他对国民党的态度。另外我们曾授意一个新近开来吴淞的原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所属的炮兵团长陈芳廷，请他做邵的工作，一旦起义号角响了，邵若不应，让他腹背受敌。由于吴淞是我们计划中极为重要之点，所以特别注意做邵的工作。我们还从张权的旧友、当时京沪杭总司令部的张参谋长（名已忘）处取得了六个战时通行证（拟定起义日分发），以有利于我们联系工作。

后来，张登偕同陈约珥来找我，也约张权来了，他当即传达了组织命令，任命张权为起义军司令，任命我为政委，郑振华为

政治部主任。另外，还确定了起义的大致日期，并决定吉祥路一百二十一号为起义临时司令部。

五月十五日我与张权在约定地点外滩公园见面，定明日（十六日）十时起义。张说，还需到吴淞炮台邵百昌那里去一次，把情况摸得更透一些，看他究竟是否愿意放下屠刀，响应起义，我劝他对邵不要存希望。他说：“我和邵百昌认识年岁长，朋友久了，能拉他一把就拉他一把，对他有好处，对国家也有好处。”我说：“昔日泓水之战，宋襄公以礼治军，坚持讲仁义，要等敌军渡河设阵而战，招致惨败，伤重而亡。”他说：“我不完全是从仁慈观点出发，主要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接着又对我说：“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北伐时我任第六军十七师师长，他在我下面任营长，当过我的部下；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攻陷独山时，他任前敌总指挥，我兼装甲兵团团长，驰赴独山反击，受他指挥，我又做过他的部下。那时，国民党高级将领，望风而逃，重庆危殆，陪都准备西迁。我向汤恩伯建议，对日寇抗击到底，不成功便成仁。但他居心叵测，道貌岸然，置若罔闻。这个大革命失败后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的顽固反共家伙，做了一辈子的常败将军。那次独山反击战，我要他同舟共济，克敌制胜，替他挽回一点他在中原对日战争中一败涂地、丧失国土的罪孽和名誉。乃蒋介石暗中勾结日寇，日寇先把方先觉（国民党军长）、吴开先（国民党组织部长）放了回来，自动退却。作为我个人来说是‘壮志未酬’，而汤恩伯则是‘失败之志已酬’。日本人投降以后，我和他碰面时，回谈往事，他表示说我是有正气的。对我还是讲一点面子。当然我不会以此掉以轻心。对他也不会存什么幻想。我们万一出事，他也不会留什么余地的。我们开

展工作已不是短时间了，从未出过什么岔子。起义明天就要付诸实施了，出不了什么事了”。说完，他还是到邵百昌那里去了。下午四时，他回到原住所麦加里三十八号。出乎他意料之外，便衣特务把住弄堂口，等他走进弄堂，一群特务猛扑过来，把张权抓上了吉普车，押进了警察局。

十六日上午八时，我和陈约珥等都到了吉祥路一百二十一号约定地点，久等张权不来。我向大家说，平时我们约张权碰面，他总是先到，从不迟到，看来一定出事了！陈等都说，不能有这样巧的事。再等不来，我试图了解一下张权原住所麦加里三十八号有无什么情况。我走进弄堂，一片阴森森的气氛，上下左右都是静悄悄的，发现有似进非进、似退非退穿便衣的人，断定是特务。抬头一看，张权住宅的晒台上，挂了一块红衣或红布。张权原来和我有约，万一出事，就以此为暗号。我知事不妙，佯装进另一人家的门，在院墙的门内稍稍站一站，立刻回头，出门沿着右面一排同样院墙边走出弄堂。回到吉祥路一百二十一号，经大家研究，一定是出事了。我走出吉祥路一百二十一号，在山阴路借用平日相识的产科医生梁闰放家的电话，打到张权夫人的亲戚家里。恰好张的夫人胡雪影自己接的。我还未开始问，她知是我的声音，就说，张先生出事了。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被捉了，不知为什么。这就说明张权被逮捕了。我想张权夫人正设法援救张权出来，深恐她临事身上掏不出钱坐车，我赶快到陈老太太那里拿了四十块银洋。怎么送去？估计胡雪影身后一定会有特务监视，即使有这样危险，也要千方百计送去。我的堂弟王泰舒（同济大学学生、党员，但我们无组织关系）来了，我就请他送。我问他，张权的夫人胡雪影，你在我这里遇见过吗？他说面

熟。我说，可能她现在住在一位姓谢的亲戚家里，距我这里不远。她的这位亲戚可能全家都到台湾去了，你去时先敲门，问张权先生的夫人在否。如果她本人在，你把钱向她一交，就说张先生的朋友送来的，交了便走。如果不在，交给这个家里任何一个人都行，只说请转交张夫人就可以了。泰舒心中有数，马上起身送去。目的是要张夫人找张权的朋友，设法立刻把张权救出来。我们夫妇两人就站在谢宅两头马路的出口处，估计二十分钟左右泰舒就可以出来，如果二十分钟左右不能出来，就出事了。十多分钟，看到泰舒出来了，我们三人各自回到住处。泰舒说，我去谢家敲门，问张夫人在否，开门的就是她，我把四十元银元一交，仅说我是张先生的朋友叫我送来的。说完就走，不见有别的人。随即由我的爱人张端元化名打电话给她，要她出外营救。她说熟朋友都到台湾去了。这样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总算冒着危险办好了。张权被捕后，组织和张权的夫人四出营救。但由于国民党垂死前的疯狂屠杀，营救未成，惨遭不幸。不少张权直接联系的准备起义的部队，中断联系，无法接上关系。而且张权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张参谋长处取得的六个战时通行证也被抄去了。牵涉面广，敌人的防范更为严密。我的行动也极困难。张权被捕后坚贞不屈，没有供出任何东西，有关的人都未被捕。但这次起义的盛举，却遭受了挫折和破坏。

谁是破坏起义计划的敌人，谁是出卖张权烈士的凶手？是国民党李延年兵团暂编第一纵队中校参谋科长、反革命分子张贤。张贤是该纵队司令李锡佑的同学、同乡，又是老部下。李锡佑协助张权在上海进行策反工作，张权认为李锡佑较有冲劲，可以让他运用驻扎在江湾一带他那支起义力量。李锡佑策动张贤参加起

义，张答应了。可是张贤这个匪徒却在五月十四日把李锡佑策动起义的前后经过，全部向反动当局汇报了。十五日一早又亲自带领特务到李家逮捕了李锡佑。那天下午四时张权从吴淞炮兵阵地回来后，又遭逮捕。张贤扑灭了国民党军队起义的火种，汤恩伯亲下手令，把他从中校参谋科长晋升为上校参谋处长，支少将薪，领到了五千元银洋的巨额奖赏。人民不能宽恕这个罪恶的杀人刽子手。解放后，尽管他狡猾地一次又一次的钻了我们的空子，但经过多年的追查，终于逃不出人民的巨掌，被判处了死刑。张权被关押后，经反动当局几天几晚的疲劳审讯，他坚贞不屈。在百般刑难面前，只说：“不可给我侮辱，好汉有事好汉当，给我一死好了……”国民党反动派终于在二十一日下午六时全城戒严，把张权、李锡佑以银元贩子的罪名杀害于南京路、西藏路口的大马路上。张权烈士临刑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事业成功万岁！”，从容就义。

蒋介石在张权被捕的那天下午，即带了蒋经国、蒋纬国、毛森、汤恩伯一伙乘飞机逃往台湾去了。上海群丑无首，一片混乱。留下的陈泰庆虽代汤恩伯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但也不甘做汤的替死鬼，一溜烟逃之夭夭。接着刘昌义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刘颇知“多行不义必自毙”和兵败如山倒的历史规律，更知道国民党军队内部分崩离析，难以逃脱人民的巨掌，只有归向人民的一条路。这时，陆大教官蒋子英先生最后策动在上海指挥青年军作战的许照副师长放下了武器，归向人民。这使刘昌义更加看清了上海的严重局势，率部起义为人民立功做了好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上海解放了。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供稿）

浴血奮進

——从郭村保卫战到黄桥决战

张震东

(全国政协委员)

一九四〇年，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多次被我粉碎后，韩德勤不甘心失败，又将反共矛头由皖东北转向苏中地区。泰州地区的苏鲁皖边区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在韩德勤的挑拨、拉拢和种种压力之下，由中立倒向反共。四〇年五月中旬，当叶飞同志率西援半塔集之挺进纵队返回江都以东之大桥、吴家桥原防区时，即遭到扬州、泰州日伪三千余人的扫荡。韩德勤竟乘机密令李明扬派两个团袭击我后方，叶飞同志所部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奋战一昼夜，打退了日伪的进攻，然后带部队到郭村休整。韩德勤一计未成，又生一计，借口我军侵占李明扬防地，煽动李明扬、李长江纠集十三个团的兵力配合顽军张星炳保三旅，企图以十倍于我的兵力，围歼我新四军江北挺进纵队。韩德勤作战办公室的军事地图上几个粗黑的箭头同时指向郭村，刹时间剑拔弩张，杀气腾腾，郭村形势十分危急。能否粉碎韩李顽的进攻，关系到我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任务能否迅速实现，关系到华东大片国土未来的命运。陈毅同志一面呼吁团结抗战，要求李明

扬、李长江停止进攻郭村，一面电令叶飞部队坚守郭村，等待援军。与此同时又急调我苏皖支队及江南十六旅三个团分别驰援郭村。陈毅同志渡江北上亲临前线指挥战斗。

我苏皖支队接到火速驰援郭村的电令后，我和陶勇同志立即研究敌我状况。当时我支队第二营外出活动，尚未回来；新来的部队尚未编好。况且从月塘集赶去郭村有二百华里的路程，其中要越过天（长）扬（州）公路，渡过邵伯湖，通过仙（女庙）高（邮）一带日寇重点封锁区和李顽防区，真是障碍重重，只要一处受到阻拦就难以预期赶到郭村。为了坚决执行陈毅总指挥的命令，我支队领导人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当即一致决定不等外出的二营归来，支队立即出发。把行军路线送给二营，命令二营完成外出活动任务后立即追上部队赶赴郭村；对没有完全编好的部队，行动中边走边调整。同时，为了争分夺秒，部队来不及动员，只得在行军途中，由钟期光同志定出宣传动员计划，边走边动员。我和陶勇同志带着机关精干人员和侦察部队提前出发，侦察情况并提前动员船只，以备后用。为了出敌不意，迷惑敌人，部队于第二天中午出发，向东而去，傍晚时转过头来越过天扬公路，深夜在渔民群众的支援下，胜利地渡过了邵伯湖，乘敌不备一举闯过了仙女庙、高邮一带日伪重点封锁区。于六月二十四日胜利到达郭村以西的麻村、杨家桥一带集结。

苏鲁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仗着人多枪足，骄横不可一世，扬言“此举一定收复失地”，“坚决拿下郭村”。指挥几路顽军不断向郭村推进，并派出便衣特务潜入我防区，张贴反动标语，散布谣言，动摇我军心民心，并绑架和杀害抗日人员。叶飞同志根据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主动派挺纵政治部副主任为代

表，携带陈毅同志呼吁团结抗战的通电，到顽总部泰州和李长江谈判，严正劝告其“不要作反共的急先锋”，可是李长江态度蛮横，并无回头之意，继续纠集十三个团的兵力向郭村构成合围之势，以其王牌部队第四纵队（陈中柱指挥）和第六纵队（陈才福指挥）由南向北担任主攻，以第二纵队（颜秀五指挥）和第一纵队（丁聚堂指挥）控制郭村以西的丁沟、宜陵、塘头一带，企图切断我军各部之间的联系，从侧翼威胁我郭村阵地。韩德勤派来的顽保安三旅（张星炳指挥）则进至我郭村以北小纪庄一带，由北向南配合李长江向我进逼。

李长江以为部署已妥，扬言“四天之内打下郭村”，六月二十八日，他一面公然扣押我谈判代表于泰州，一面指挥所部向郭村和杨家桥阵地发起猖狂进攻。我苏皖支队和叶飞同志的挺纵部队，奋起自卫，坚守杨家桥的我支队第二营首先接火，与来犯顽军颜秀五部三个支队（团）战斗十分激烈，虽然敌数倍于我，但在我健儿的英勇抗击下，终将来犯之敌击退。为了利用顽军互不配合的弱点，集中兵力给李长江以致命的打击，我苏皖支队奉陈毅同志命令当晚主动撤出杨家桥，进入郭村防守地带北面，使叶飞部队集中力量防守南面。这样郭村阵地左右扎实，固若金汤了。

郭村是一座十分秀丽的水乡小镇，仅有数千居民，集镇虽然不大，但由于地处苏北咽喉，能否坚守郭村，关系到能否立足江北，打开通往苏北的通道，完成东进抗日的大问题。敌我双方均深知郭村之战的重大意义。由于我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做得深入人心，群众的心向着我们，思想觉悟较高，他们目睹国民党顽固派不抗日专搞反共磨擦，早已义愤填膺，所以当李顽围攻郭村

时，都积极主动组织起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锄头钉耙，大担小挑，协助我军连夜加固防御阵地，军民团结斗志高昂。

李长江限令其嫡系陈中柱部第二纵队于当天拿下郭村，并以“打下郭村，放假三天”来刺激顽军士气。同时命顽保安第三旅配合陈中柱从北面进攻郭村。

战斗是惨烈的。我和陶勇同志都在日夜坚守前沿，参加战斗。一次，我举起望远镜观察敌人动向，发现敌人企图利用我阵地前面不远处的一片庄稼作为掩护，以密集的队形猛攻我阵地。我立即下令我部暂停射击，等顽军行动起来，接近我阵地时再给予严惩。战士们身边除轻重火器外，还准备了大量手榴弹，睁大眼睛，监视敌人。不出预料，敌人开始进攻了，密集的队形扑来。三百米、一百米，一步步逼近我阵地。五十米、三十米，我大喝一声“打”，一排排的敌人倒下，阵地前面硝烟滚滚，呛得人出不来气，敌人在硝烟之中爹妈乱叫，狼狈回窜。我见敌人阵角混乱，抓住时机发出冲锋号令，战士们杀声震天，跃出工事，追歼敌人，进行短促出击，俘虏大批敌人。顽军依仗人多，接着又一批敌人拥了上来，我军沉着应战，战士们越打越勇，就这样打退了敌人一次次冲锋，消灭了一批批的敌人。战斗从拂晓打到黄昏，从黄昏打到深夜，我阵地却稳如磐石，屹立未动。

郭村保卫战进入第三天，顽军仍然从南北两面猛攻郭村。我部和叶飞同志的挺纵背靠着背密切协同，激战竟日，越打越猛。为了更多的杀伤敌人，我和陶勇同志在前沿研究，决定再给敌人狠狠一拳。由我苏皖支队三个营各抽出一个连待命。这时敌人又冲了上来，轻重火力把敌人又一次击退。正当敌人撤腿后撤时，我三个连又一次跃出工事，把张星炳的保三旅全部冲垮，生擒活捉

顽军一百多名。保三旅连夜败逃。三天的战果，仅我苏皖支队就歼敌三个团的兵力。

当晚，挺纵叶飞司令员根据战局的发展，决定将防守郭村南面的挺纵第一团抽出两个营，乘顽军后方空虚，向扬（州）泰（州）公路出击。于是我苏皖支队拨过去两个营接替郭村南面的防务。留一个营仍在北面继续监视张星炳的动向。

战斗的第四天是党的生日，我们在前沿进一步作鼓动工作，全体指战员斗志昂扬，纷纷表示要以新的胜利来庆祝党的生日。

这时，为我地下党控制的李长江部第二纵队第五支队的第四大队，遵照陈毅同志指示，在大队长王澄同志率领下，在泰州北面的港口暴动成功，逮捕了顽军五支队长陈东生，并逼使颜秀五部的一个重机枪连一起暴动。为我地下党领导的李长江部第三纵队第八支队在陈玉生同志率领下在泰州南面也起义成功，到达长江边的大桥地区，控制了江南江北的交通要道。由郭村抽出的我挺纵一团两个营，一举歼灭顽军三个支队部，占领了顽军后方要点宜陵镇。战局急转直下。这时李长江恼羞成怒，还妄想攻下郭村挽回败局，亲自由泰州赶到郭村督战，大骂张星炳、颜秀五是酒囊饭袋，迟缓不前，限令陈中柱、陈才福再攻郭村。于是从七月二日拂晓起，顽军集中所有的轻重机枪和炮火掩护整团整营的顽军轮番向我郭村阵地冲击，几度逼进我阵地前沿，战斗十分残酷。打了五天了，阵地上伤亡很大。眼看阵地有被冲破的危险，我火冒三丈，心想“两军对峙勇者胜”，大喊了一声：“同志们跟我冲！”，手提大砍刀跃出工事，冲向敌人。战士们看见我这个参谋长带头上去了，一片杀声跃出工事，在工事前和顽军展开了拚刺刀的白刃战。我手中的大砍刀越砍越有劲，敌人万没想到我们会

有这一手，吓得抱头鼠窜。我们硬是仗着拚刺刀杀退了顽军。中午，王澄同志率暴动部队赶来郭村，参加战斗。挺纵一团的两个营占领宜陵后也从顽军背后打回郭村。我军士气大振，乘势猛烈出击，抬着重机枪冲锋，打得顽军溃不成军，纷纷缴械投降。顽第四军纵队司令陈中柱被我活捉，顽军全线溃逃，一直逃到塘头镇。顽军对我郭村之围遭至彻底粉碎。

这时陈毅司令员和粟裕同志、钟期光同志都兴致勃勃地赶来郭村，没休息就又亲自指挥战斗，我军接着分路出击，穷追猛打，直逼泰州城下，把李长江打得一败涂地，生俘其七百多人。

陈毅司令员和粟裕同志对敌人情况了如指掌，为了利用顽固派韩德勤和李明扬的矛盾，争取李明扬在某种程度上的中立，便利我继续东进打开整个苏北抗日局面，决定停止对敌人追击，并主动释放全部俘虏，归还其部分枪械，李明扬在兵败城危之中，加之在陈、粟宽宏大量顾全大局的感召下，不得不出面谢罪，赔礼道歉，重新和我军订立和平协定。并一再表示，如果韩德勤进攻新四军，我李明扬愿守中立。

郭村保卫反击战胜利以后，陈毅、粟裕同志鉴于韩德勤决心反共，李明扬愿守中立，而日寇却待机出动的情况，为进一步打开苏北抗战局面，确定了联李、击敌、反韩的策略，为了有计划地发展抗日革命力量，决定东进黄桥，开辟泰（县）清（江）南（通）如（皋）地区，以便和山东南下的八路军一起解决苏北问题。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渡江北上的江南指挥部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和粟裕同志担任正副指挥，并将苏北新四军部队整编成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九个团两万多人。我苏皖支队在

陈太运的税警团，不是韩德勤嫡系，平时和韩德勤的矛盾很大。为了更有力的孤立韩德勤，争取陈太运，我们适可而止，在击溃他一部分力量之后，就不再进行追击，接着又把俘虏和枪支如数归还，并警告他以后不准再跟韩德勤制造反共磨擦，不要打内战，要团结抗日，陈太运唯唯允诺。就这样我们稳定了北面之敌。转头向南击迎从黄桥北犯的来敌何克谦部。

黄桥位于苏北如皋泰兴公路的中间，是靠近长江边上的一个大镇。盘踞在黄桥一带的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是在抗日的幌子下，收编一些地痞流氓和由宁沪线上溃退下来的败兵而组建起来的部队。这帮家伙勾结敌伪，积极反共，鱼肉人民，无恶不作，人民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我军战士都是人民的子弟兵，了解到何克谦部队的所作所为，无不义愤填膺，发誓要全歼顽敌为黄桥群众出气。所以当我军一和这批反动家伙接上火，打的又猛又狠，一番激战，全歼保安四旅两个团，乘胜解放了黄桥、蒋垛、古溪、加力等地，军心大快，民心大快。接着，积极打击日伪，连克靖江东北三孤山、西来镇等日伪据点，并粉碎了日伪军两次报复性“扫荡”。

正当我军对日伪作战连战连捷之际，韩德勤又调动重兵，企图聚歼我军。指挥部命令我第三纵队进驻黄桥，以迎击韩德勤南犯。

这时，苏北指挥部决定将陈玉生同志率领起义的原李明扬部三纵第八支队编入我三纵队，建制为第七团，团长严长荣同志，政治委员惠浴宇同志，至此我三纵队由原下辖两个团增至下辖三个团。

黄桥地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是我工农红军第十

塘头扩编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陶勇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我任参谋长，卢胜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三（苏皖支队）、第八（江都独立团）两个团，第三团团长黄才胜同志，政委吴载文同志，第八团团长姜木生同志，政委邱相田同志。整编以后，部队根据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发布的政治动员令，经过深入学习动员，提高了部队的思想觉悟和胜利信心，明确了团结、抗日、反顽的行动方针，部队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决心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领导下继续东进，坚决让抗日的旗帜高高飘扬在辽阔的苏北平原上。

我们这支越战越强的抗日队伍继续东进，对和日寇勾勾搭搭的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他时时刻刻想一口吞掉我们。郭村之役被打垮以后，他气急败坏，接着又向他所属部队下达密令“……坚决将该‘匪军’在江都和两泰各县境及运河东西、洪泽湖南北地区分别包围而歼灭之……”，在我东进路上设下层层伏兵、道道障碍。正象陈毅司令员所说：“我们要东进就要学关云长过关斩将”。

一九四〇年七月下旬，我军告别郭村父老，挥戈东进。当我部队刚过泰州，就遭到了韩德勤的进攻，韩德勤命令在曲塘一带的税警总团陈太运部队从北面向南杀来，住黄桥一带的保安四旅何克谦部队从南面向北杀来，企图南北夹击，消灭我军于运动之中。

其实敌人的意图早在我掌握之中，指挥部决定我军先对弱的干，命令我第三纵队挥戈向北。陶勇同志领着部队在北街桥一带将北面来的陈太运税警团击溃，我军毫无伤亡就消灭了他一个多营。

四军革命根据地，当时曾遭到蒋介石的血腥镇压，长期以来当地群众一直深深怀念着共产党，特别是在何克谦部队的欺压蹂躏下，更是盼星星盼月亮似地盼望我军早日解放黄桥，抗战以来党的地方组织已经恢复，我第三纵队进驻黄桥以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群众说：“当年红军又回来了。”我们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并派出大批干部和民运工作队协同地方党开展群众工作，建立群众抗日团体，公布减租减息等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各项法令。同时在苏北指挥部直接领导下，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召开各界人士代表会，宣传我党我军团结抗战的主张，刹时间黄桥地区一片热烈景象，群众欢欣鼓舞，建立起抗日政权、地方武装。黄桥成为欢乐的黄桥，革命的黄桥，战斗的黄桥。

可是韩德勤虽然屡遭失败，却贼心不死。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依仗自己的优势兵力，欲置我军于死地而后快。陈毅、粟裕同志，遵循党中央同顽固派斗争的原则，确定我军行动方针是：严守自卫立场，以退为进后发制人，彻底揭露韩德勤的反动本质，表明我党我军团结抗战，顾全大局的真诚愿望。

九月三日，韩德勤又分兵东西两路向我黄桥进犯，以泰州的李明扬、李长江和税警总团的陈太运部为西路，以他的嫡系一一七师和独立旅、保一旅为东路，东西并进妄图拿下黄桥。我苏北指挥部鉴于其西路是二李一陈，曾在我军面前连吃败仗，表示过保守中立的态度。估计他们这次作为西路向我而来，完全是在韩德勤威胁利诱之下的行动，不敢贸然向我进攻。所以陈毅同志决定放开西路，集中力量反击东路韩德勤的嫡系部队。

果然，西路军二李一陈，正如我指挥部估计的一样，行动十分缓慢，采取观望态度。于是我军决定采取诱东路顽军深入然后

给予全歼的策略。我第三纵队奉命除留第七团守备黄桥外，主力向营溪以南顽军发起反击。全歼敌先头部队保安第一旅两个团，由于出击过早，顽军闻风回窜。韩德勤一贯采取押着杂牌军替他打头阵的办法，所以保安一旅一倒，其嫡系看着要暴露在我军面前，也急忙缩了回去。为扩大我军影响，动摇瓦解顽军，我遂将战俘一千五百人，给予教育优待后，全部释放。其余顽军往姜堰、海安一带逃去。

姜堰位于海安泰州公路之间，运盐河畔，扼水陆交通枢纽，是粮盐集散之处，为苏北重镇之一。当时由顽军张少华的保安九旅所盘踞。韩德勤在对我军南北夹击、东西并进的阴谋被我军连续挫败之后，心生毒计，责令张少华部在姜堰大筑碉堡，层层设防，隔断水路交通，禁止粮盐运往黄桥，妄想用经济封锁来困杀我军，进而把我军压缩在濒江的狭小地带，然后再勾结日寇进行合击。

我苏北指挥部及时识破了韩德勤的毒辣手段，为了打乱敌顽勾结日寇的部署，疏通粮源，解救民困，必须打下姜堰。

陈毅同志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第三纵队和第二纵队，接到命令后，陶勇同志先和我研究攻打姜堰的部署，接着一方面派出侦察人员去姜堰进行侦察，一方面深入地对部队进行动员。然后集合部队，于九月二十五日偕同二纵队同时逼进姜堰。

姜堰四周环水，地势十分险要，顽保安九旅长期盘踞，构筑了以三十六个大碉堡为核心的坚固工事，上有电网，外有壕沟。地雷区有大量障碍物，张少华自诩为“固若金汤”，扬言“新四军一无翅膀，二无火炮，休想进我姜堰。”

说实在的，姜堰的防守工事也是够坚固的，几十个碉堡构成

交叉火力，后边一道道铁丝网上挂着一个一个用洋铁皮做的铃铛，一碰就响个不停。一有动静碉堡的交叉火力既可集中射来又可铺开射击，铁丝网后边又挖了一道几米宽的深沟，再加上这一带是水网地区，南边还有一道宽阔的运盐河，使我们部队运动很不方便，给敌人防守造成天然的有利地形。

九月二十五日，我军部队接近姜堰。当晚，先将姜堰东北角外围顽军肃清。第二天，我带着几个侦察人员视察了一下地形。回来以后和陶勇同志研究，决定采取重点突破后直插顽军旅指挥部的打法。当即布置第三团主攻，第八团助攻。三团接任务后举行了阵前誓师大会，提出了“打开乌龟壳，活捉张少华”的战斗口号。主攻连队采取自动报名，群众讨论，领导批准的办法，组织起勇敢队，每人配大刀一把，短枪一支，手榴弹六枚，作为突击力量。九月二十七日晚九点整，我三纵队和二纵队同时发起攻击，“勇敢队”员迅速越过战壕向铁丝网冲去，举起砍刀就砍，谁知铁丝网通了极强的电流，几个勇敢队员触电牺牲。打了这么多年仗，第一次遇见这玩艺儿。黑夜里，我们上去了解，铁丝网成排的立在地上，表面上看不出名堂，用衣服靠上去试试，差一点给吸住。没法子，只好下来想办法，群众出点子。人多主意多，有人到铁匠铺借来长脚大铁钳，拆下自行车上的胶皮轮胎包住大铁钳剪铁丝网，忙了一夜，总算制伏了电网。紧接着勇敢队冲了过去，敌人见我们冲过了电网，用三十多个碉堡的火力封锁着前进的道路，我们仍然迅速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时天快亮了，我下令停止进攻，等待有利时机。

晚上，我命令把迫击炮拉到前沿，用迫击炮平射敌人碉堡，为步兵开辟道路。可是迫击炮的劲头到底不如平射炮，没有穿甲

的力量，一发炮弹打上去无济于事，我们只好连着几发炮弹集中打一个点。这样，碉堡一个个被打穿轰倒。勇敢队勇猛穿插，搞掉了敌人的发电厂，镇内断电，我军一声令下，大部队手举马刀，大砍铁丝网，杀声连天，冲了进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敌旅指挥部。

旅指挥部的顽军特别顽固，直到第二天天亮前还依仗着核心碉堡，顽抗待援。我们的战士把手榴弹塞进碉堡，敌人又扔了出来。我们采用火攻之计，把棉絮缠在木棍上蘸上火油点燃后塞进顽军碉堡，一时阵地上火把飞舞，浓烟翻滚，眼看着敌碉堡顶上的木料着了起火。这时我们的宣传队，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向敌人喊话，交待政策，劝其缴械投降，碉堡里的敌人象笼蒸火烤，实在熬不住了，一个个连滚带爬地跑出来举手缴枪。这时二纵队也从西南角突入姜堰。姜堰的两千多敌人全部被歼，敌首张少华见大势已去，化装向溱潼方向逃之夭夭。

战后李增援同志作词，章枚同志谱曲，写了一首颂扬勇敢队英雄们的歌曲：

苏北平原广，
姜堰风光美，
河川交流，船帆来回，
自由的乡镇成了反共磨擦的大营垒！

.....

我军愤怒恨败类，
争先参加勇敢队，

.....

勇敢队！勇敢队！
姜堰战斗显神威，
勇敢队！勇敢队！
你的威名震苏北！

姜堰战斗以后，我苏北指挥部为了苏北的团结抗日，陈毅同志曾经数十次电函韩德勤，要求“救国有份，抗战有地”。又邀请各地士绅开会，宣传我党的团结抗战主张，一再表明和解愿望，促成中间人士出面调停，一时间代表八个县的几十位士绅，包括泰州李明扬、李长江等地方实力派，也都出来讲话。这些人出于不同的动机，有的确实出于团结抗战的诚意；有的则由于在韩德勤方面有切身利益，象当过江苏省长、苏中有名的士绅韩国钧，就有很多钱投资在韩德勤手里，他们看到如果再打下去，不会有韩德勤好果子吃，因此也希望早日停战；泰州二李等地方实力派，则希望韩我双方不做决战，保持力量均衡，他们可以中立其间两边讨好。所以都愿意出来向韩德勤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这时蒋介石却再三严令韩德勤、李明扬、陈太运密切合作，反共到底，并督促安徽的李品仙，江南的顾祝同，积极策应韩德勤向我进攻，以保持苏北反共阵地；同时日寇在苏北、皖东增设据点，并开始向我“围剿”；再加上韩德勤自恃兵多粮足，尚存有十万兵马，特别是其两万嫡系主力还没跟我军交过手，而在苏北的我军尚不到两万人，所以韩德勤反共气焰还相当高，公然叫嚣“抗日必先剿共”，颁布剿共条例，忙着调动兵力，补充粮饷，焚毁涟水、淮阴间老黄河各渡口的船只，以阻止我八路军南

援，妄图倾巢南犯，消灭苏北我军。对于我军劝告和各方人士的呼吁，根本听不进，并要挟我军，扬言“共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为了蛊惑人心，还派了四名士绅来见陈毅同志，同陈毅同志进行谈判，提出要我们让出姜堰退驻黄桥，然后才谈得上“共同抗日”，这时陈毅同志说：“韩主席的意见我们照办。我这还有一封信请你们带给韩德勤，如果韩主席口是心非是瞒不过苏北父老的。”

姜堰是个好地方，鱼米之乡，当地人称“金姜堰，银曲塘”，有了姜堰对解决财粮供应是有很大大好处的，韩德勤估计我们不会让出姜堰，为了再一步寻找向我进攻的借口，才提出这个要求。

我苏北指挥部完全洞悉韩德勤的阴谋。陈毅同志在姜堰召开各方代表座谈会，陈毅同志在会上说：“为了达到苏北抗战合作的目的，我愿意退出姜堰，只要有利于抗战，有利于人民，我军虽血涂四野，万死不辞……，但是韩德勤如口是心非，欲置我军于死地，我军忍耐是有限度的，就是说我军退驻黄桥，决不再退……。”九月三十日，我军挥泪撤出姜堰，拜别姜堰父老。姜堰由泰州李明扬、李长江和陈太运接防。我军的这一行动有力地揭露了韩德勤的骗局，争取了中间势力，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表明了我军争取团结抗战的诚意。

正当苏北各阶层人士喜笑颜开，称赞我军以大局为重，一再忍让的严正态度时，韩德勤却认为我们软弱可欺，不但反共气焰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利地准备向我进攻，他在此时向其部下发出密电说“……现匪胆已寒，必不敢与我决战……欲求全胜，除攻击而外，无他法门……”，立即命令几万大军开始行动。

在此危急关头，陈毅和粟裕同志召开纵队负责干部会议。记得在一间大房子里，陈毅同志表情严肃，他环视一下与会干部后，慢慢打开军事地图，手里拿着一根小藤棍开始给我们讲解未来这一场战役的严重意义和黄桥的地理形势，以及敌我兵力布署。陈毅同志声调铿锵有力地说：“一切条件都已成熟，这一仗打得好可以决定苏北大局，反共浪潮会低下去；打不好，只有象韩德勤讲的‘到长江喝水’了。这是背水一战，就看你们指战员的决心如何。”是呀！韩德勤真够心狠手辣！我们背后是百里长堤，船只全被顽军没收、赶走和焚毁，使我们没有退路，敌人企图把我军一举歼灭或赶下长江喝水。各纵队指战员义愤填膺，纷纷向陈毅和粟裕同志表决心，坚决守住黄桥，和黄桥共存亡。于是按苏北指挥部拟定的作战方案进行了战斗分工，部署我三纵队坚守黄桥，第一、二纵队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顾高庄、横港桥一带，并先以一部分兵力运动防御，诱敌深入我黄桥阵地前沿，然后全线出击，以分割包围手段，逐个将其歼灭。

韩德勤这次向黄桥进军有十万大军，分三路而来，以其嫡系八十九军、独立六旅为中央纵队，由海安出发，从东北方向杀向黄桥；以李明扬的苏鲁皖总指挥部各部队和陈太运的税警总团为右路纵队从西北方向压向黄桥；以五个保安旅为左路纵队由郭兴东指挥，从东南方向围向黄桥。韩德勤踌躇满志，以为稳操胜券，骄横之态，不可一世。

决战迫在眉睫，我三纵队迅速进入黄桥，由我主持召开连以上干部会，传达了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同志的意图和决心，钟期光同志细致深入的作思想动员工作，同志们一致表示“上级把黄桥交给我们了，有我们就有黄桥，子弹打光了就拚刺刀，刺刀

折断了就拚枪托，死活不能让敌人进黄桥一步。”干部会结束后，回去连夜层层传达动员，一时大会小会热气腾腾，决心书象雪花一样送到纵队。紧接着又召集黄桥的乡、镇、保甲长和地方士绅开会，说明情况，要求大家一致行动，然后又分别召开群众大会，当地父老乡亲纷纷表示，坚决支持我军的正义行动。不到几个小时，全镇人民行动起来了，送来了粮食、猪肉、蔬菜，保证部队吃饱好打仗，群众担架队赶制担架准备抢救伤员。妇女们组织了看护队，青壮年组织起来，拿着大刀梭标日夜巡逻。当时我们提出要三千民工，结果报名的却有七千多人，军民协力斗志昂扬，等着敌军的到来。

纵队指挥员的分工是：我在北面正面迎敌，陶勇同志在西南，叶飞同志在北面。我们背靠长江，互相之间不断联系。

侦察员不断回来报告情况，韩德勤的主力李守维指挥的八十九军及一一七师为后队，三十三师为前锋已经直逼黄桥。韩的独立六旅在中将旅长翁达指挥下，沿北线活动，有四个保安旅在黄桥东南一带集结。长江水面船只绝迹。

我三纵连夜构筑工事，黄桥只有一个土围墙，高不过三公尺，厚不过两公尺，在土墙上挖掩体，土太薄了，只好用土堆，真是众志成城，一夜之间，工事就修筑得很象样了。我和陶勇同志商量后命令八团坚守黄桥以东，七团分布在黄桥镇内，为总预备队，一面担任西北西南的防务。东边是敌人的主攻方向，我带着八团在土墙外边，正面抗击敌人，主力三团靠在我右侧一面防御东南方向来犯之敌，一面留作机动，待机出击或者及时堵住突破的缺口。当时我三纵队除第三团外，第七、第八团建制均不齐全，全纵队只有一千五百多支枪，配备有两门迫击炮的一个炮

连，仅有三发炮弹（战斗时还有一发是瞎火），但是军心民心同仇敌忾，这是黄桥决战的胜利保证。

十月四日上午，一场残酷的战斗开始了。韩德勤的三十三师直逼黄桥，两架双翼飞机在头上盘旋助威，天上地下呼应，很是狂傲。韩顽仅用小部队监视我前沿火力支撑点，大部队则直扑我黄桥主阵地，企图一鼓作气冲进黄桥，其实我早已有了准备，严阵以待，沉着应战。由于事先早就把火力配备，距离测量搞好了，敌人一冲近我火力区，一阵集中射击，敌人一片一片地往下倒，死的死，伤的伤，其余的就撒腿后撤，押阵的军官，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提着两把盒子枪逼着顽军朝上冲。敌兵也真够“可怜”的。冲上来被消灭，退下去被枪毙。就这样上来下去，反反复复一直激战了一上午。这时粟裕同志由后边来到前沿向我说：“震东同志，能顶住吧！”我一边擦汗一边说：“放心吧，粟裕同志，保证轻饶不了韩德勤。”粟裕同志满意地笑着，举起望远镜观察着敌人的动向。我拿起电话和在南边指挥的陶勇同志联系，互相交流了情况后，粟裕同志放下望远镜说：“老张，看来敌人又要组织一次冲锋了，这一次要狠狠教训敌人一下。”我完全领会粟裕同志的意图。不能老是这样上来下去，等着敌人打上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应该主动出击。于是我向粟裕同志汇报自己的想法，粟裕同志完全支持。我立即在前沿组织起一部分兵力，准备给敌人一次突击。正好这时候顽军又一次被我们打得稀里哗啦地往下退，我部战士一声大喊“杀！”象晴天霹雳，一个个象雄狮一样跃出工事冲上前去。敌人以为我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万万没想到我们会有这一手，这样出其不意地一冲，把敌人吓得屁滚尿流，爹妈喊叫着四下逃窜，跑得快的

逃走了，跑不快的被我们活捉了五十多人，缴了几十条枪。这对我前沿战士鼓舞很大，斗志更旺了。

中午，顽军改变了战术，组织了更多的兵力，从宽大的正面压过来，采取人海战术，一层一层地往上涌，利用地形逐步推进，打了两个小时，敌人虽然伤亡很大，但是还在不断地往我阵地接近，密集的火力压得我们抬不起头，迫使我们从前沿向主阵地收缩，一直收缩到黄桥土围墙外边。顽军的手榴弹已能够扔到土围墙上，我们战士把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又给他们回敬了过去。

黄桥东西南北一片枪炮声，战场上硝烟翻滚，呛得人直咳嗽。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到陶勇司令员的声音：“震东同志，怎么样？”我回答：“能顶住。”陶勇同志又问：“有什么困难吗？”我说：“敌人闹到土墙边了，正在顶着！”陶勇同志说：“千万要顶住，顶住了就有办法。”我干脆地说了一声：“你放心吧，有我就有阵地。”放下电话以后，我伸出头来观察一下守在阵地上的一个个勇敢的战士，有的受了伤，脸上鲜血直流，还瞪着两只仇恨的眼睛握着枪监视着敌人，有的受了重伤，怎么动员也不下火线，有的则为了人民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多好的同志啊！多么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战士啊！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要顶住，要顶着压向我阵地几十倍于我的顽军，顶住就是胜利，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有力的拳头正握得紧紧的，准备砸向敌人。

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战斗也越来越残酷。黑压压的敌军狂叫着又冲上来了，阵地里只有一句互相激励着的话：“打垮他！”“打垮他！”“打垮他！”一双双充满血丝的眼睛怒视着敌人，

一颗颗仇恨的子弹射进了敌人的胸膛，一个个敌人倒在我巍然屹立的阵地前。

突然从东面传来一阵杀声，陶勇同志命令我三团主力反击了！这就是我说的那狠狠的一拳。三团从敌人侧面五百公尺的地方冲了上去。我看准时机，立即命令我阵地战士同时跃出工事杀向敌人，我提着一把大刀冲在前面，这一下敌人可慌了手脚，前后挨打一片混乱，顿时溃不成军。仅二十分钟就活捉敌人营长一名，连长两名，俘虏敌人七百余人，其余敌人逃去远远的，我们胜利地返回阵地。

乘这个间隙，战士们立即修补工事，储运弹药，准备粉碎敌人再次进攻。我们立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分析战场形势，总结经验，调整部署。大家一致认为，敌人虽然接连吃苦头，但是绝不会善罢干休，肯定还要进犯，但是象以前那样让敌人过多地接近我主阵地，总是不太好。应当派一支部队前出一些。这样无论逐步收缩，还是相机出击，都会有较大的机动范围，可以更好地保障主阵地的安全。另外从一天半的战斗来看，敌人进攻也是不断变换花样，我们也要变换各种办法，更多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敌人有生力量消耗越大，其进攻劲头就越小。

如（皋）黄（桥）公路一带村落密集，估计敌人可能会从这里攻上来。我立即决定派八团三营教导员带领九连运动到如黄公路边，依仗一片坟包为掩体拦击顽军。当我八团九连前进到公路边不久，敌人果不出所料又来进攻，老远就让九连给拦击住了，敌人受阻后用山炮、迫击炮轰击九连阵地。九连配有大量的手榴弹，大胆地放敌人靠近，再突然用排子手榴弹打过去，这样敌人跑也来不及，伤亡很大。

三营教导员是由特派员改行的，实战经验不多，让敌人靠近总是有点沉不住气。第一次把敌人打下去，就连忙跑到主阵地来找我报告说：“参谋长，让敌人靠那么近，阵地要守不住了。”我说：“你一定要守住阵地，没有我的命令你一步也不准退，”我指着他的鼻子说：“你给我马上回去。”他走了以后不久又跑来了，带着一脸黑灰，到我面前说：“参谋长，这回真的不行了，伤亡太大，阵地要丢。”我一听气得火冒三丈，大声喝道：“你给我回去，就是剩你一个人阵地也要守住，你要是再离开阵地往这跑，阵地丢了，我枪毙你。”我举起望远镜眼看他跑回阵地，敌人的进攻，九连的防守，我看得清清楚楚，公路上，阵地前，敌人遗尸累累。我这时对他说：“你们不是打得很好吗？这个节骨眼上全连都在看着你，当指挥员的能沉住气，部队就会象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这一次敌人又进攻了，他把敌人放的比哪一次都近，一声喊：“打！”突然猛烈的火力大量杀伤了敌人。

接着，敌人又增加了兵力，半圆形的围攻上来，不过敌人吃了苦头以后懂得了，刚一靠近就争先恐后地扒下去找地形，慢慢往上爬。我立即组织了三挺重机枪放在九连的左侧，把九连的四挺机枪也排好了火力，等着敌人。敌人上来了，他们以为我们是不等靠近不打，所以黑乌乌的密集队形往上涌，我们出奇不意提前开火，火力象风一样扫过去。哈哈！敌人一排一排地往下倒。就这样从下午一直又打到黄昏，敌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九连阵地象一枚钢钉，牢牢地钉在那里。

这天晚上，月色朦胧，枪声依稀，硝烟散去，露出了一颗颗闪亮的明星，阵地上的谈笑声却是此起彼伏。许多挑着饭菜提着

水壶的老百姓在阵地上穿梭不停，有老大爷，有小姑娘。在阵地里，几个战士正围着一位老大爷谈笑着，有一个战士连说带比划地讲着今天突击出去抓俘虏的情况，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时一个调皮战士看见我走过来说：“参谋长，烟抽完了，给支烟抽。”我递给他一盒烟，他拿过去分给大家，嘴里还念叨着：“这是参谋长给咱的慰问烟。”最后把盒子还给我说：“参谋长，里边还给你留了一支哩！”大家笑了，我们的队伍就是这样，打仗勇敢，操练严肃，平常都象亲兄弟一样。那边又是一阵欢笑声把我吸引过去。一个战士大声说：“韩德勤这些家伙攻了一整天，一会上来一会下去还挺灵活的哩！哪晓得我们一冲出去，吓得跑都不会跑了，扒在地下嗷嗷叫。”另一个战士笑着说：“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胡吹什么‘不占黄桥不回兴化’，凭他那架子我看他既进不了黄桥也回不去兴化。”逗得大伙笑得前仰后合。我巡视了一下阵地，战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我，教育着我。在四周的笑声中我坐在阵地上的土堆边，回想着这两天的战斗，计划着明天的迎敌，想着陈毅同志讲的保卫黄桥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想着我们的陶勇纵队司令员，这真是一员有勇有谋的虎将啊！三团这一拳头打出去，打得是多么有力，多么及时啊！我想着……

通讯员打断了我的思路，他向我报告说：“参谋长，粟裕同志让你去开会，是纵队团以上干部会。”我带着几个团长下了阵地，走进黄桥街头，黄桥虽然被敌人攻了一天了，可是街上电灯通明，商店照常营业，行人照样在街上来往，只是街头巷尾有几个群众组织的岗哨。在街头空地上，几个天真的小孩子举着小红旗，学着白天黄桥学生组织游行示威和街头宣传的样子，喊着口

号在玩。一个小孩子跑到我面前说：“叔叔，给你个红旗。”我接过来看了一下，上边写着“反对内战，保卫黄桥”，这是孩子们的心愿，是黄桥人民的心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心愿啊！

街上老乡们推着小车，小车上装着满满的黄桥烧饼。黄桥烧饼在苏北是很有名的，一个个烧饼烤得焦黄松脆，又甜又香。黄桥人民为了支援部队，所有的饮食商店、住户人家，不管大炉小灶，都在烤制烧饼，准备送上阵地，这几天我们的战士在阵地上都是以烧饼充饥。后来在我们部队就出现了“黄桥烧饼之歌”：

黄桥烧饼黄又黄，
黄桥烧饼慰劳忙！
烧饼要用热火烤，
军队要靠老百姓帮，
同志们呀吃个饱，
多打胜仗多缴枪！

……

黄桥烧饼圆又圆，
圆圆烧饼多好看！
烧饼掣开不好卖，
国共分裂更危险，
同胞们呀团结牢，
反共就是准汉奸！

……

这个歌充分反映了军民团结坚守黄桥胜利的欢欣情绪，也表达了我广大指战员对黄桥人民热情支援的感激心情。

粟裕同志在镇北一间房子里等着我们，我带着团长们一进房子，粟裕同志放下手里的一支红蓝铅笔，离开了放着军事地图的桌边，热情地迎了上来，握着我的手说：“张震东同志，你辛苦了。”我回了一声：“不辛苦！”粟裕同志笑着和几个团长一一握手说：“你们打得好，黄桥人民永远忘不了你们。”然后让我们坐下。粟裕同志从容地点燃了一支香烟，然后精神振奋地说：“同志们，先告诉你们一些好消息，就在你们坚守黄桥的时刻，我们一纵队已经在黄桥外边高桥地区全歼顽独立六旅，其中将旅长翁达怕韩德勤问罪已经自杀喽！”一时房内活跃了起来。粟裕同志接着说：“我第二纵队已插到如黄公路分界一带，切断了顽军归路，今晚就要消灭韩的嫡系八十九军军部和一一七师。”接着粟裕走到我面前说：“震东同志，你们纵队马上准备一下，趁敌人后路混乱时来个全线出击，狠狠地打，这样韩德勤就要输的连裤子也要当喽！”说得大家笑了起来。

兄弟部队的胜利鼓舞着我们，更大的胜利就要到来。这时舒雨旺同志又带着老四团三营来到黄桥助战。我们新四军老四团当时共分三个营，一营杀到皖南去了，二营就是我原苏皖支队的前身，三营一直在江南敌后坚持斗争，这个营战斗经验丰富，战斗作风勇猛、顽强，他们为了增援黄桥，连夜渡江，跑步赶来。好久不见的老战友在黄桥阵地相逢，使阵地顿时一片欢腾，再加上马上要出击，增加了这一支生力军，更使人兴奋。纵队决定让三营抓紧时间休息，养精蓄锐，等大出击时，把三营放在八团进攻方向，作为一把尖刀，插入敌人中，搅乱敌人阵势。

午夜，东边方向传来阵阵枪声，陈毅司令已经带一纵二纵打击着敌人，我在阵地上检查了一遍，战士们一个个扎紧装具，系

好鞋带，带了很多手榴弹，都准备得停停当当，只等出击命令，看起来还挺心急的，我心里也急，不时地看看表。掌握出击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出击过早，东面还没行动，敌人机动范围太大，可以乘机突围逃跑；如果出击迟了，配合得就不够有力，敌人也可以提前逃窜。我密切地注意着东面方向的枪声，从枪声中判断情况。又过了一会儿，枪声紧了，时机已到，机不可失，一声令下，全军出击，主力二团象猛虎下山一样，从东南方向冲入敌人中间，东杀西刺，杀伤敌人，我们这边八团和老三营象旋风一般地卷向敌人，舒雨旺同志带着老三营，首先突进去，把敌人打得乱成一团，分不清东西南北。里边敌我两军纠缠在一起分割拚杀，外面四边包围向内压缩收拢，一场混战打了两个多小时，顽军溃散逃命，我们到处追抓俘虏，象老鹰抓小鸡一样，活捉了敌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仁，缴获机枪一百多挺，还缴获了敌人的山炮。

敌人一部分向北溃逃，我带领三纵队跟踪追杀，一直追到海安以北的东台。五天后我们才回到海安，笑谈黄桥之战的胜利。

这一仗敌八十九军和独立六旅全军覆没，军长李守维骑马仓惶出逃，过淤泥河大桥时连人带马掉到桥北边的河里淹死。企图逼我喝长江水，自己却饮了泥浆，其尸体是在八尺沟被老百姓用渔网捞起来的，正应了我战士在黄桥阵地上预言的“既没进了黄桥，也没回了兴化”。我三纵队在这次战斗中共毙俘顽军六千余人。

我纵队在这次战役中，由于坚守黄桥，对取得决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受到陈毅指挥的嘉奖。

我军在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以后，苏北指挥部仍然本着有理、有力、有节的原则和团结抗日的精神，团结了苏北的进步力

量，并逼着韩德勤不得不坐下来在曲塘谈判，达成了抗日的协议，苏北出现了新局面，胜利地完成了我军发展苏北敌后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战后，我三纵队在海安整训，十月中旬在海安进行整编。指挥部调刘先胜同志任我三纵队政委。整编以后，我纵队奉指挥部命令，继续东进，到通如海启去，到黄海之滨去。

部队踏上了新的征途，嘹亮的“黄桥烧饼之歌”震动着苏北大地……

黄桥烧饼千千万，
千万烧饼送前线！
保卫黄桥总动员！
苏北换了新局面，
同志们呀团结牢，
一直打到黄海边，
嘿！呀呀伊，嘿！
一直打到黄海边，
伊呀嘿……

陈毅司令员在黄桥决战胜利以后，也豪情满怀地写下了诗篇：

十年征战几人回，
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
红旗十月满天飞。

它真实地写出了当年苏北大平原上出现的抗日大好形势和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刘伟鹏 周再生整理）

馬本齋同志在魯西北

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回民支队，是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于冀中地区发展成长起来的，是冀中军区野战化最早的一支部队。它在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和政治委员郭陆顺等同志领导下，转战于冀中广大战场，在沧（州）石（家庄）路南，大清河北，子牙河东，打了许多胜仗。回民支队和马本斋同志的名字，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中广泛传颂。

张
同
钰
（地质部
副部长）

一九四一年秋季，青（县）大（城）战役期间，回民支队奉命在马本斋同志家乡建国（河间、献县的一部分）、交河一带活动。从七月初到九月的两个多月时间内，作战二十七次，歼敌五百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俘日少尉军医三人，大大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战热情，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敌人遭到严重的打击之后，对马本斋同志

采取了诱降、劝降、逼降等一系列卑鄙伎俩。这一年的八月五日，盘踞在河间的日本侵略军山本联队长，把马本斋同志的母亲白老太太抓捕到河间，妄图以马母作人质，逼迫马本斋同志投降。马母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临危不惧，进行了顽强的绝食斗争。这

位中国人民的英雄母亲，于九月七日壮烈牺牲，时年六十八岁。

后来，马本斋同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一生。朱德总司令高度赞扬马母和马本斋同志，称他们为“母子两代英雄”。

(一)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郭陆顺同志于冀中“五一”日寇大扫荡前夕，在交河县陈庄战斗中英勇牺牲。“五一”大扫荡后，回民支队由马本斋同志率领，从冀中经冀鲁边转战到冀鲁豫军区，于八月底九月初抵达范县、观城、濮城地区。部队到达冀鲁豫后，组织上派我接任回民支队政治委员，从此以后，一直到一九四四年二月初，回民支队同三团、十一团、十九团、十六团、三十二团一起，在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率领下，我也和马本斋同志始终生活战斗在一起。马本斋同志对党忠诚，为人正直刚毅，作战机智勇敢，办事果断认真，勤奋好学等优秀品德和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当时，马本斋同志四十一岁，我二十三岁。他是一个饱经风霜、在旧军队里当过团长的人，我是一个学生出身的青年干部。在我尚未到职之前和初见本斋同志之后，思想上产生过一些想法：一方面觉得同这样一位“七七”事变后亲自组织民族武装的英雄人物一起工作战斗，感到很荣幸；另一方面又觉得他是旧军人出身，对其可能存在的军阀残余作风和旧军人意识，有些疑虑。更确切地说，自认为和本斋同志一同出现在一个“舞台”上，颇有点“怯场”之感。但是，我的这些疑虑很快就打消了。

我俩在一起，始终是互相尊重，互相谅解，互相支持，团结友爱，真诚相待，不论是在部队训练中，还是在战斗中，一直配合得很好。

本斋同志身材高大魁伟，举止严肃庄重。在战场上，即便是军事情况严重，对敌人的意向尚难作出判断的关键时刻，或者在已经进入战斗但战局发展尚难控制的时候，他总是昼夜不停地亲自听取侦察员的汇报和来自最前线的战斗报告，直到认为可以作出接近实际的判断时为止。

一九四二年“九·二七”大扫荡之前，回民支队转战到范、观、濮中心区不久，对周围敌情和友军活动情况尚不熟悉。当时有情报说，濮阳柳下屯之敌要向濮县进犯，目的只是到红庙村安设据点。马本斋同志为了彻底弄清敌人的企图，亲自坐在司令部作战室，同值班参谋一起听取侦察员的汇报，研究分析敌人的行动意图。他根据敌人在柳下屯驻扎了大量的汽车、骑兵等情况，准确地判定了敌人是要进行大扫荡，而并不单纯是要安设据点。后来，果然敌人对冀鲁豫军区进行了“九·二七”空前的大扫荡。马本斋同志这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使我极为钦佩。

“九·二七”大扫荡之后不久，回民支队进入冀鲁豫三分区，即鲁西北地区活动。鲁西北是回民比较聚居的地区，莘县的张鲁集就是我抗日根据地的一个回民中心区。马本斋同志对于组织上决定派回民支队到鲁西北地区活动很高兴，他认为这是党和军区首长对这支民族抗日武装的极大关怀。当时，我们在交谈中，他曾流露出希望能有一个比较固定活动地区的心情。他说，回民支队是冀中野战化最早的一支部队，从建立以来，总是到处调动，始终没有个固定的活动地区，兵源和后勤供应经常遇到很

大困难，使部队的发展和成长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我把这些情况向当时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作了汇报。区党委和军区决定，马本斋同志兼任三分区司令员，原三分区司令员赵健民同志改任副司令员，回民支队的建制不变，仍由马本斋同志任司令员。为了加强对敌斗争的统一领导，三地委（鲁西北地委）决定组织两个地区委员会，一是冠堂（冠县、堂邑）地区委员会，由赵健民同志兼任书记；一是莘朝（莘县、朝城）地区委员会，由我兼任书记。这两个委员会在对敌斗争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此后，回民支队在鲁西北期间，主要是在莘县、朝城活动。有时反扫荡或配合友军作战，也转战到聊城、冠县、堂邑等地。

回民支队在鲁西北地区的主要打击对象，是国民党顽固派石友三残部公开投降日寇的齐子修和文大可。这两股叛军号称两个旅，齐子修盘踞在聊城莘县，文大可盘踞在朝城。他们在这一带奸淫抢掠，无恶不作，是全区军民不共戴天的死敌。

鲁西北一带的人民群众，对回民支队有深厚的感情。特别是莘县张鲁集的老百姓，他们热情地欢迎回民支队，全力支援回民支队，把消灭齐子修、文大可的希望，寄托在回民支队的身上。

回民支队没有辜负鲁西北人民的希望，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当时鲁西北地区敌人设防的特点是，碉堡、岗楼都建在距离村庄很远的旷野，形成一个个的孤岛。碉堡中伪军吃饭喝水，都依靠附近村庄的群众运送。如果一天不送，敌人就没有饭吃没有水喝。马本斋同志抓住敌人的这个弱点，组织部队采取分散围困，重点攻击的战术，断绝水路粮源，迫使敌人缴械投降。

一九四三年七月初，在朝城战役中，回民支队的各个中队，分几路向敌人进攻，在当地军民的配合下，用上述办法在几天之

内就攻克朝城、莘县周围据点三十多处，烧毁岗楼碉堡四十多个，取得了朝城战役的重大胜利。

在对敌斗争中，马本斋同志非常富有创造精神。当时我们部队的武器装备较差，特别是打攻坚战有很大困难，马本斋同志从作战实际需要出发，发明创造了一种“土坦克”。后来在攻克冠县田寨伪军据点的战斗中发挥了威力。马本斋同志挑选特等战斗英雄贾福海同志，背驮用层层湿棉被覆盖的方桌，手提地雷，从村东口进了大街，直奔围寨南门，敌人以密集火力扫射，“土坦克”照常前进，敌人不知是何奇物。贾福海同志在南门埋设地雷后即向敌人喊话，晓以大义，指出缴枪不杀，随即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大摇大摆地由原路走回村东口，敌人未敢再发一枪。这时我同马本斋同志隐蔽在寨门对过路南短墙下，准备雷一爆炸，即指挥突击队冲锋。可是地雷还未爆炸，敌人就宣布缴械了。这场战斗，我们没伤亡一兵一卒，就攻克了一个有坚固围墙的据点村庄，在全体指战员中传为佳话美谈。

(二)

我们在鲁西北活动时期，是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年代。残酷频繁的对敌斗争，严重的自然灾害，给鲁西北人民带来了重大的牺牲。一九四二年大秋作物和一九四三年夏粮连续遭到大旱，大平原上是无边无际的黄土沙地，一片茫茫，灾情十分严重。

群众吃饭困难，军队吃饭也成了问题。人们用谷草充饥，儿童个个肚大如鼓，四肢干瘦如柴，我们机炮连战士每天只有口粮十二两（合现在的七两半），还要行军作战。司务长和炊事员为改善

连队伙食费尽了心思。灾荒之年，耕牛异常便宜，一斤粮食可以换几斤牛肉，他们把有限的粮食调换成牛肉给战士吃。通过他们的努力，战士们基本能吃饱肚子，保住体力。司务长为了照顾马本斋同志和我，在给养较为充分的时候，给我俩改善伙食，用谷糠掺红薯团成圆子，用牛油炸着吃，或者用牛肉煮小米稀粥，偶尔也煮几块红薯吃。这在当时，就是对部队主要领导同志的特殊照顾了。

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抗灾度荒，我们遵照三地委的指示，派出了以民运科长金民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和剧社同志组成的宣传队开展群众工作。他们的任务是：进行社会调查（调查回民经济生活和阶级状况），宣传和发动回、汉群众进行生产自救。我们的部队曾多次去收成较好的范、观、濮运粮到莘、朝边，救济老百姓。还与群众一起采取说服等办法，让有存粮的地主拿出粮食来。经过鲁西北党政军民的奋力抗灾，广大人民度过了难关。人民群众从内心里感激共产党、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子弟兵。

相反，敌人占领区许多老百姓因饥饿而死。马庆功（当时回民支队第一中队长，现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小部队深入到聊城附近活动时，目睹齐子修伪政权统治下的人民，房倒屋塌，杂草丛生，卧床不起，奄奄一息，老鼠在他们身上窜来窜去，凄惨之状，实难忍睹。

老百姓没饭吃，敌人吃饭更成问题。抢粮已成了敌人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当时的对敌斗争，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抢粮与反抢粮的斗争。我们抓住敌人看到灶筒冒烟就出动抢饭吃的特点，打了很多胜仗。一次在冠县王奉村一带，我们半夜进驻到三个成“品”字形据点中间的村庄里，在村外呈三角形埋伏，清晨即在村里生火伪装做饭，三个据点的伪军都出来抢饭吃，被我包围，

一阵激战后都缴枪投降了。这次战斗俘虏伪军六百余人，缴获步枪五百余支，轻机枪三挺。

(三)

一九四三年秋，上级决定鲁西北三分区划归冀南军区。回民支队奉命调到范县、观城、濮县、昆吾、尚和，另组新三分区（原活动在范、观、濮地区的南进支队，到清丰、南乐及以西地区组织成四分区）。昆吾、尚和是当时从濮阳县东部地区划出来建立的两个县。回民支队在新三分区粉碎了由开封日寇一个骑兵旅团组织的秋季扫荡以后，于十一月十六日参加了军区为粉碎敌人蚕食政策而发起的八公桥战斗。

当时，伪二方面军孙良诚部以濮阳县的八公桥为中心，四面向外扩张，步步蚕食我抗日根据地。他们到处拆毁民房，构筑碉堡，挖封锁沟，抓丁抢粮，逼得老百姓生存无路。清除这个祸害，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取得反蚕食斗争胜利的关键。

怎样攻克八公桥，取得这次反蚕食斗争的胜利，军区曾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反复进行了讨论。马本斋同志提出，采用“牛刀子钻心”战术。即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把敌人的总指挥部八公桥挖掉，然后再回过头来清扫外围据点。马本斋同志详细阐述了采取这种战术的理由：从敌人方面看，八公桥有层层据点保护，四面有一丈多高的围墙，墙外有一丈多深的围沟，又是孙良诚的嫡系部队特务团防守，敌人步步向我根据地蚕食，正在得意之际；从我方看，主力部队距离八公桥很远，尚未引起敌人的注意，我军利用敌人这些可能产生的麻痹心理，出其不意，攻其不

备，突然钻进他的心脏，打他个措手不及，攻下八公桥是有把握的。

马本斋同志的建议，得到杨得志司令员和全体与会同志的同意。杨得志同志决定由马本斋同志协助他组织指挥这次战斗。

为了进一步摸清八公桥敌人的防守情况，马本斋同志选派回支的作战科长李国栋同志带领测绘员王纪中同志，化装成商人混进八公桥，绘制了敌人设防的全部情况。军区决定，六团、七团、回民支队担任主攻。当时的战斗口号是“强攻八公桥，活捉孙良诚”，部队的战斗情绪十分高涨。

我们于十一月十三日出发，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于十六日深夜到达八公桥。这天夜里有五六级的大风。我们趁着呼啸的北风，从西北角顺利地越过外沟，爬过围墙，活捉了哨兵，严密地包围了总指挥部的八大处。当敌人发觉我们时，已根本无法展开火力，完全失去了抵抗力。在我猛烈的攻击下，八大处的所有人员、特务团全部官兵都被俘获了，孙良诚的参谋长、特务团长都当了俘虏。遗憾的是，孙良诚在前一天的下午到开封日本人那里去开会了，因而没能活捉这个匪酋。

攻克八公桥之后，我部队随即乘胜前进，外围的碉堡据点，犹如秋风落叶，被我迅速地清扫净尽，从而取得了反蚕食斗争的彻底胜利。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我军攻克八公桥的胜利消息：“十六日晚。我军主力攻入孙逆总部驻地八公桥（濮阳南），激战十二小时，将孙逆总直属队全部歼灭，毙伤伪数百名，俘虏伪二方面军甄参谋长、慕团长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余名，缴获轻机枪十七挺，步枪一千六百余支，子

弹四万余发，电台两架，战马百余匹，粮食数百万斤及兵工厂一所（机器全部）。”

八公桥战斗之后，马本斋同志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冀鲁豫军区的指战员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高度评价马本斋同志“是后起的天才军事家”。

（四）

在我和马本斋同志共同生活战斗的年代，他时常对我讲述自己的身世。他生于一九〇一年，小时读过几年私塾，以后在家务农。一九一六年，他十五岁时，随父到张家口谋生不得，流浪到山海关外在东北军里当了兵。由于他忠厚、朴实、办事认真，在旧军队里居然由一个普通士兵，先后被提升为班、排、连、营、团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前还乡闲居。他感慨地说，在旧军队闯了二十多年，没有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七·七”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才从迷雾中找到了拯救中华民族的正确道路。

马本斋同志是一个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抗日积极分子。在日本帝国主义制造芦沟桥事变向我国发动全面战争之后，马本斋同志立即响应我党团结抗日的号召，在他的家乡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在他的带领下，广大回民同胞奋起参加了八路军。他对回民支队这支民族抗日武装的发展成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马本斋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造诣，不只是靠他的天赋，更重要的是靠他孜孜不倦的勤奋好学。在抗日战争极端紧张残酷的年代里，部队每到达一个宿营地，他亲自察看地形、分配警戒任务

之后，总是在暗淡的油灯下学习，有时通宵达旦。特别是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他从未间断过写日记。他每天亲自把一天的活动用纸条写下来，过几天就由司令部收发赵寅卿同志拿去用恭笔小楷誊清在二十二开硬皮笔记本上。马本斋同志非常喜爱赵寅卿同志的一笔好字。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从赵寅卿同志处要来誊清的日记详细翻阅，从中研究部队建设和对敌斗争的规律，改进自己的领导工作。他的这部日记，是回民支队发展成长的一部珍贵历史记录。非常可惜，它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年代丢失了。

马本斋同志很善于用通俗诙谐的语言，阐述部队建设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他讲到干部的带头模范作用时说：“兵熊一个，将熊一窝”。他总结对敌人打伏击的经验时，提出了“枪响就冲锋，十分钟解决战斗”的口号。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提出了“吃得饱、睡得着、走得快，完成这三大任务，就能争取反扫荡胜利”的口号。对军事指挥员必须熟悉地形地物，他说：“心里没有几本地图，就不能当指挥员”等等。他对问题所以能够这样生动、深刻地高度概括，是因为他非常注意研究观察问题，对新生事物非常敏感，很善于在极端复杂的问题中抓住主要矛盾，用通俗、精练、生动的语言表述出来。他的这种经验总结，使干部战士印象深、记得牢，所以他的讲话，长期在干部战士中广泛流传，始终发挥着指导实际行动的作用。

马本斋同志对于部严格要求，个人也总是身体力行，一丝不苟。每到一地，他总是把了解熟悉当地敌情、地形、地物、人情等放在首位，在召开干部会议时，他经常点名提问这些问题。他自己对敌人的兵力部署，以及地形、地物、村庄名称、距离远近、风俗习惯等，背得烂熟。因此，他能够掌握敌人活动规律，

适时地捕捉战机，恰当地组织兵力。

马本斋同志的发展成长，经过了一个艰苦的历程。特别是一九四一年秋季在冀中青大战役期间，马本斋同志经受了敌人的诱降、劝降、逼降等一系列的严峻考验，敌人对马母的残害，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一九四三年的整风学习，是马本斋同志前进中的一大转折。他经常对我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马本斋同志在领导回民支队抗日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但也有过严重的错误。如一九四二年冀中“五一”大扫荡前夕，由于他对敌情估计的错误，招致了回民支队的严重损失。马本斋同志在整风学习中认真检查总结了这些血的教训，特别是他为失去了回民支队早期的政治委员郭陆顺同志，心情十分沉痛。

马本斋同志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怀着无限的忠诚。有一次我们在院子里乘凉聊天，他深有感触地说：“母亲因为支持我抗日被敌人残害了，我这把骨头也就交待给鲁西北人民了。”

(五)

一九四四年一月初，马本斋同志脖子后面生了个小疮，因缺医少药，很快体温上升，疮溃波及脑髓，病情急剧恶化，不久处于昏迷状态。一月底我们得到开赴延安的命令。在出发前，杨得志司令员亲自探望马本斋同志，并传达军区调回民支队赴延安的决定。马本斋同志要随军出发，经杨司令员再三劝阻，同意暂时留下治病。在后方医院，军区卫生部部长亲自守护抢救。我们决定把司令部的管理员齐敬三同志和警卫班长张兆勋、警卫员马国

柱及马本斋同志的家属，留在后方医院照护马本斋同志。二月一日，回民支队跟随杨得志司令员踏上了保卫延安的征途。万万没有想到，在我们出发后的第七天，二月七日，正是我们在安阳、磁县之间通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我的革命战友、回民支队的领导人马本斋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在病危时对身边的同志说：“让部队等着我！……我不行了，要把我的家属送到延安去，告三弟抗战到底！”这些撕心揪肺的声音，至今萦绕在我的耳边。

我们部队进入陕甘宁边区以后，才收到冀鲁豫军区发给回民支队全体指战员关于马本斋同志不幸逝世的电报。四月三日在米脂县中学，冯文彬同志接见排以上干部时，我向大家宣读了军区电报，全体同志莫不悲痛万分。冯文彬同志讲话时，鼓励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继承马本斋同志遗志，在新的战斗中，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冀鲁豫党政军民隆重安葬马本斋同志。一九四四年四月十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报道：“八路军回民支队领导者兼三军分区司令员马本斋同志，因公积劳成疾，终于二月七日晨病逝于军区后方医院，享年四十三岁。……”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出后，引起全军及广大民众的极大悲痛，当天军区即赶送马司令员遗体到鲁西北的回民中心地——张鲁集安葬。并由军区阎参谋长、三军分区刘政委及武装部队护送，区党委、行署、军区在灵柩路过驻地时，举行了隆重的送灵追悼大会。军区苏政委、区党委张霖之同志、行署贾副主任亲率直属机关干部致祭。……八日黄昏到达张鲁集，霎时噩耗传遍张鲁集与邻近村庄，祭吊的人象潮水一样滚向清真寺，直到第二天早晨没有断过。九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代

表黄敬同志、冀南行署王副主任、冀南军区宋政委、朱主任、七个军分区的代表及团以上军政干部都赶来吊丧。早饭前后，清真寺何教长领导举行了入葬前的一切礼仪，十一时，举行了公葬，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手持着熏香，佩带着孝符，从清真寺送到葬地。随着何教长的引导，由黄、王、朱诸同志率领着各界代表亲到灵前，对马司令员的遗体作最后目别，全场空气，肃穆沉静。……十五日冀南七分区各界，在张鲁集联合举行追悼马司令员的扩大会，会上中国共产党代表黄敬同志沉痛致词：马司令员这种为国为民、忠于党、忠于国家的精神，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十六日，鲁西北各界会团，决定筹办本斋小学、本斋游击大队等，来永远纪念马司令员。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七日，延安召开了马本斋同志追悼大会，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贾拓夫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并讲了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挽词。毛泽东同志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同志的挽词是“民族英雄，吾党战士”，朱德同志的挽词是“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林伯渠、李富春同志的挽词是“率大军，抗日寇，远近播英名，冀鲁豫河山增色；奉教义，承母志，生死矢忠贞，伊斯兰健儿典型”，叶剑英同志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精神不死”。军委会联络参谋部郭仲容先生、边区回协和延安清真寺等单位，都送了挽词。吴玉章同志讲话时说：“从马氏母子的英勇事迹看来，我们中国各民族都能出现这样好的民族英雄，事实上在抗战中，他们已经创造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史诗，只要我们能很好的团结起来，必然能得到各民族的彻底解放。马本斋同志的表现，不但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也说明了

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及民族政策的胜利。他用马克思原理和群众结合起来，又以伊斯兰的教义发挥了团结御侮的优良传统，因此，他能打许多胜仗，使回民支队成为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坚强力量。”

叶剑英同志讲话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马本斋在旧军队里混得很久，深深地体验到那种官和兵、军和民分开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日寇解放中华民族的，因此他坚决率领他组织起来的部队与八路军合作，并进入党内为党奋斗，一直到死。数年来那种坚持性，那种联系群众，官兵一致的精神是极宝贵的，实不愧为一个模范军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贾拓夫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向马本斋母子及回民支队致敬，并致词说：“本斋同志是回回民族的旗帜，是代表着回回民族和中华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最后贾拓夫同志建议：“将马本斋同志的斗争史，编成教材，以教育全边区伊斯兰小学生及广大同胞。”

追悼会上代表们以万分悲痛的心情表示，决心沿着马本斋同志的道路前进，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民族英雄马本斋同志，永垂不朽！

回忆北伐军团长蒋先云

吴 仲 禧

(全国政协委员 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一九二七年春，优秀的共产党员蒋先云同志辞去武汉工人纠察总队队长的职务，到北伐军第十一军二十六师担任第七十七团团长。当时我在第二十六师任副师长并代理师长，直至先云同志在临颖战役壮烈牺牲前，我们都在一起战斗，对他的革命精神和非凡气魄，感受至深。时过半个多世纪，我已年届八十五了，益感有责任把亲身经历的史实记成文字，留诸后世，以彰先烈。

一、他到二十六师的原因 和当时的历史背景

蒋先云同志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预感国共两党有分裂的危险，而到北伐军来掌握革命武装的。

北伐军自一九二六年夏由广东出发，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在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几个战役打败了军阀吴佩孚，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到武汉后，各主力部队都大事扩充，将领也普遍升迁。原来由广东出师北伐时，只有第四军辖下两个师（军长李济深留守广州，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到二七年一月，原来的师扩充为军，团扩充为师。张发奎

任第四军军长，下辖黄琪翔的第十二师和朱晖日的第二十五师；陈铭枢任第十一军军长，下辖蔡廷锴的第十师，和戴戟的第二十四师。不久又由宜昌开来贺龙、杨其昌两个师要求参加武汉政府继续北伐，即编贺龙部队为第二十师，杨其昌部队为第二十六师，暂归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指挥。这就是一九二七年初北伐军扩充和整编的概况。

然而，这时政治局势开始复杂起来，一方面，在广州的国民革命政府开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决定迁都武汉，陈独秀、宋庆龄、鲍罗廷、陈友仁、何香凝、谭平山、邓演达、徐谦等左派重要人士都先后到达武汉，准备继续挥军北上，讨伐直、奉军阀；另一方面，蒋介石在南昌纠集反动势力准备公开反共，他们议决定都南京，分裂北伐队伍，形成宁汉对峙的局面。这种情况也严重地影响到武汉北伐军内部。张发奎和陈铭枢两人原来就各具野心、不能团结，这时张想利用和汪精卫的关系，壮大自己的势力，有朝一日班师南下，夺取广东的地盘；陈则想投靠蒋介石，准备参加南京政权。结果在宁汉即将分裂之日，陈铭枢首先逃向南京，不久，他辖下的师长戴戟、杨其昌也离开武汉，杨其昌属下的三个团长也走了两个，第十一军只剩下蔡廷锴在第十师。在这种情况下，武汉革命政府只好命张发奎兼任第十一军军长，并调叶挺同志接戴戟任第二十四师师长，调我到第二十六师任副师长代理师长。据张发奎当时告诉我，这些人事安排是经过武汉政府两党负责人协商通过的。

记得叶挺同志接任第二十四师师长时，我还在该师当参谋长，曾代原师长戴戟办理移交手续，忙了半个多月，互相增进了友谊和了解。不久，我接到调往二十六师的命令，我知道叶是著

名的共产党员，手下能干的人很多，就对他说：“我即将去接二十六师的工作，但杨其昌走后，两个团长也不知去向，师内只有沈久成一个团长，这个师又是四川来的队伍，彼此陌生，困难不少，请求推荐几个勇敢有为的革命军人，作为骨干，协助我工作。”不几天，叶挺同志对我说：“听说前几天武汉政府讨论过二十六师的人事问题，决定派蒋先云到你师，当第七十七团的团长，林祥当第七十八团团长。你放心吧。”我听后很高兴，因为我虽未见过蒋先云，但已闻其名，知道他是工人运动中十分活跃的精明强干的青年干部，只是不知他是否带过兵。叶挺同志接着向我详细介绍了蒋先云的情况，说“他是黄埔第一期的优秀毕业生，在军校时曾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同孙文主义学会相对抗，在黄埔生中很有威望，蒋介石想拉拢他，派他在北伐军总部当随从秘书，欲通过他控制黄埔同学会，但他不但不为蒋所利用，反而偷偷由南昌总部跑到武汉来了。他在武汉由刘少奇同志介绍当工人纠察总队长，但他自己一直想直接从事军事工作。最近，他对工人运动中某些做法不大满意，觉得限制太多，束手束脚，要求辞去工人纠察总队长的职务，随军北伐。后来武汉政府讨论二十六师人事安排时，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就派他来当七十七团的团长了。他积极热情，又谦虚好学，相信你们会相处得很好的。”

大约在一九二七年四月间，蒋先云同志持一封介绍信，同三位黄埔同学（我只记得余洒度、刘明夏两人），到离武汉十多公里的徐家棚二十六师师部来找我。我看他那时的年龄只有二十六、七岁左右，身材不见高大，但气宇轩昂，说话十分响亮，没有一点湘南土音。寒暄之后，他首先说：“我到武汉已经三个多月，在武昌体育场开的几次大会上，曾经见过你，料不到今天会

到二十六师来共事北伐大业。”说时大家都笑了。他又谦虚地说，他对军事没有什么经验，黄埔军校毕业前后只参加过第一次东征，把陈炯明的老巢惠州城攻破，其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组织黄埔同学会和参加广州几次工人运动的事件上，都是同蒋介石唱对台戏的。自己没有好好读书，现在感到搞武装斗争十分重要，但又缺少经验，希望我多加指教等。我听他的口气，似乎事先对我有所了解，说话没有什么顾忌。我也坦率地对他说，我基本上是行伍出身，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长期在军队工作，政治上经验不多，希望今后能互相帮助。由于他急着了解第七十七团的内部情况，我即派师参谋长陈师许带他到团部同全体官兵见面。

二、他在二十六师的表现和影响

先云同志到七十七团接事时，正是二次北伐的前夕。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第四军、第十一军两军部队在武昌南湖广场举行誓师仪式，事毕二十六师仍回徐家棚集结整顿，待命出发。北伐军定于四月下旬北上，按行军序列，二十六师排在十二师、二十五师、十师之后（叶挺的二十四师和贺龙的二十师留在后方，负保卫首都武汉的任务），所以誓师后先云同志还有一段时间来整顿部队。

由于前一段北伐战争的胜利，部队士气一般都很旺盛。但二十六师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个师的部队没有参加前一段北伐的主要战役，新近又走了师长和两个团长，军心有些动荡，特别是对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对峙的形势，官兵认识比较混乱。蒋先云到职后，首先就抓住这个问题做政治思想工作。他旗帜鲜明地揭露蒋介石的背叛行径，给官兵很大的教育。

记得有一次先云同志在全团官兵大会上讲话，指出北伐打倒军阀的任务尚未完成，我们要继续北上打倒直、奉军阀，把革命进行到底；而蒋介石已经背叛革命不再北伐了，我们在打倒旧军阀之后还要打倒新的最大的军阀蒋介石。他说，蒋介石绝不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孙中山要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蒋介石是坚决反对的。由于我在蒋介石身边当过几天秘书，更知道他的底细，他的案头经常摆着一部曾国藩传和家书集，他是以曾国藩自比，曾以扑灭太平天国为己任，蒋则以消灭共产党为天职。自“中山舰事件”以来，蒋介石就坚决地实行“清党”，黄埔军校早已开始，各地亦正在加紧进行，他破坏团结，分裂革命，民愤极大，我们早晚要和他相见于兵戎。先云同志的讲话生动、深刻，很有说服力，官兵们听了都很激动。他还能写文章，常自己编宣传材料印发到各个连队去，士兵争相阅读。我觉得他编得很好，同意也发给其他团，结果沈久成、林祥那两团的官兵也受到很大影响。

蒋先云同志对我也做了不少工作。他知道我和邓演达、叶挺、黄琪翔等都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特别是和邓演达的关系比较深。虽然北伐以来我一直是陈铭枢、戴戟的部下，但宁汉分家，陈、戴投往南京时，我不愿跟他们走，始终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那时，我对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已经有所认识，但对汪精卫的面目还看不清楚，以为他还是左派；对共产党人我是很尊敬和佩服的，但认识也很肤浅。有一天晚上，先云同志问我：你看过陈独秀和汪精卫的联合宣言吗？我说没有，他就对我说，汪精卫是个政客，不一定靠得住，陈独秀完全相信他迁就他，并且处处限制工农群众运动，我们党内很多人不赞成，我也有意见，所以就

要求到北伐军中来直接从事军事工作。他还一再说明，共产党是真诚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只有依靠工农群众，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打倒一切军阀，才能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他的话对我启发、帮助很大。记得在从驻马店出发行军的一次宿营中，我私下向他提出：象我这样旧军人出身的人，如果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可能呢？他很爽直地对我说，只要你有坚定的信念，党组织的门是经常开着的。接着又说，等这个仗打完的时候，我们再好好地讨论这个问题。不料临颖一仗，就不见斯人。但我始终记着他的话，以后几经周折，才在一九三七年七月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是后话。但这也说明，当时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二十六师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七十七团部队的整顿和训练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二十六师的士气也有了提高。这一点在行军途中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使张发奎以及他所属的嫡系将领大感意外。

原来张发奎的第四军在攻克武昌城时，曾由武汉粤侨联谊社同人赠送“铁军盾”一面，颂扬“四军伟绩，威振迩遐”，“摧锋陷阵，如铁之坚”。张发奎及各将领均颇为得意，很不愿意其他部队也来共享铁军的荣誉。二十六师的部队来自四川，这时归张发奎统一指挥，但张一直对之另眼相看，很不重视，只把它排在行军的后方，担任一些警戒任务。张部由驻马店出发后，在汝城、上蔡两次战役都打了胜仗，但二十六师各团都没有参加，因此七十七团士兵颇有意见，有的对团长说，张总指挥既然这样不信任我们，不如批准我们回四川去打军阀吧。先云同志很耐心地对他们说，大家不要心急，我们对奉系军阀主力的会战还没有到，大仗还在后头，我们不怕没有仗打，也不怕张发奎始终不让

我们打。

果然，五月中旬逍遥镇之役，张发奎原来没有打算使用二十六师的部队，可是正面第十二师的队伍对敌人进行了两昼夜的猛攻，战况仍然没有进展，形势很危急，张发奎急调二十六师增援。但这时二十六师部队还在张明寨一带，距前线还有八十里的行程，七十七团是先头部队，于晚上七时接到我转达的命令后，即以急行军的速度连夜赶进。由于这支部队年纪较轻，身体素质好，平常在先云同志带领下官兵一致，斗志旺盛，加上行李辎重少，骡马输送力强，又善夜行军、走山路，所以在次日黎明前即赶到大路李（地名），追近前线，张发奎见到十分高兴。敌人见我增援部队开到，即全线溃退。这次第二十六师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战斗，但它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和吃苦耐劳的作风却大大改变了张发奎对二十六师的看法，张在我面前也特别表扬了蒋先云的领导能力。

三、在临颖战役身先士卒英勇牺牲的经过

临颖战役，是北伐军与奉军主力决战之役，也是二次北伐中最关键的一役。

临颖地当平汉铁路之要冲，又是开封和郑州的门户。奉军如果不能守住临颖，不仅开封、郑州也不能守，而且整个黄河以南就无地盘可据。所以，奉军准备在临颖附近与北伐军作一场决战。

但是，在战役开始前，张发奎却对战局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由于二次北伐以来连战皆捷，各将领都有轻敌情绪，又认为临颖一带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比起逍遥镇有沙河一条可凭，

东、西洪桥前后有草河、洪河可守，地形似乎对奉军更不利。但上两次战役都打败了奉军，现在临颖孤城在望，不少将领认为，在黄河以南大概没有什么大仗可打了，取下开封、郑州已经是不成问题的了。

这种估计是违反事实的，第一，奉军虽然节节败退，但主力并没有被打垮，这时各路退兵都集结到临颖城附近；第二，由郑州方面又陆续开来了奉军的主力部队到临颖增援；第三，敌人的重兵器没有什么损失，野炮兵团的炮火射程比我军远得多，山炮、迫击炮也比我军数量多，前几次战役尚未投入使用；第四，临颖附近虽无险要地形，但敌先头部队已经在那里修了一个多月的工事，构筑了坚固的步兵阵地和炮兵阵地，特别是在正面和右翼，配备了强大的火力。这些极其重要的情况，北伐军方面都不清楚。

当时，我军侦察力量极其薄弱，一架侦察飞机也没有，只有一个骑兵连，不敢远出活动。所以，如果前线没有接触，几乎一点敌情都得不到。直至我军迫近敌之十里头前哨阵地，俘获了一个敌军官，才供出下列敌情：新近由郑州开来的奉军是王树常的第十军，下辖四个旅，旅长有何柱国、耿翼翹、刘辅廷等人，该军附有野炮兵、山炮兵各一团，这是奉军的主力部队；在临颖城附近还有由鄆城退来的第十七军，下辖步兵六个旅，骑兵一个旅，但不全；还有由宋庄退来的第八军残部；还有飞机一小队，坦克车一小队。总兵力约在七、八万人以上。张发奎知道了上述情况，才感到形势严重，实际上已形成敌强我弱之势，但前方部队已经与敌接触，来不及重新作什么部署了。

我军兵力共有五个师，即第十师、第十二师、第二十六师、第

二十五师和暂编独立十五师。但这时第十师还在羊石方面对鄱陵之敌实行警戒，第二十五师还远在上蔡，解决富仕英的部队，独立十五师战斗力薄弱，不能担任重要任务，张发奎手上实际上只有两师主力部队。他即命第十二师向十里头正面攻击，以第二十六师作总预备队集结在外场待命。

五月二十七日拂晓，第十二师开始向十里头强攻，敌顽强抵抗，激战竟日，双方都有相当伤亡，直至黄昏敌才放弃十里头，退守七里头。这时第十二师还不知道七里头是敌人的主阵地。到二十八日拂晓，第十二师倾三团的全力（三十四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向七里头猛攻，但敌人炮火异常猛烈，我军发起数次冲锋，都毫无进展，加上是平原地区，敌凭借构筑的工事发挥机枪火力，使我遭到重大伤亡，三十四团团团长吴奇伟亦受伤。这时，形势对我极为不利，我军的炮火打不到敌人的主要阵地，而奉军的野炮射程远，却可以打到我两师队伍集结的地方。张发奎和副军长黄琪翔都冒炮火亲临前线指挥。但当时他们可以机动指挥的部队也只有第二十六师了，因为第十二师在正面全力进攻，伤亡奇重；独立十五师已派往左翼在小商桥附近警戒；第十师的先头部队则远在瓦店，整个战局是十分危急的。

这时，第二十六师的师部和第七十七团都在外场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待命。敌人的炮弹不断落在村庄附近，似乎驻地已被敌人发现。但先云同志很沉着，他到村外观察了战况，判断敌人的炮兵阵地就在我方右翼的前方，就回来对我说：“不摧毁敌人的重炮阵地，我军正面的进攻就不能成功，应当建议张总指挥派我们从右翼出击，包抄敌人的炮兵阵地。”我很赞成他的意见，就打电话到总部请示，张发奎很快就同意了这个建议，并下令：“着

二十六师七十七团蒋先云部立即从右翼出击，直趋辛庄，抄敌之左翼。”接到命令后，全团官兵兴奋非常，连夜轻装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向辛庄跑步前进。

五月二十九日拂晓，七十七团到达距辛庄六、七百米时，与敌前哨部队接火，接着，敌辛庄的步兵，炮兵一齐向我开火，七十七团受阻于一片平坦的麦田前。先云同志开始用疏散队形自己领先向敌迫近，但由于毫无地形地物的掩护，伤亡颇大，先云同志也足部受伤。我在师部得知先云同志受伤，即派通讯员令他下火线，由第一营营长代替他指挥全团，同时命沈久成的七十六团前往支援。但蒋先云坚持不下火线，他对通讯员说，“请师长放心，临颖城已经在望，我足部轻伤不要紧，跑不动还可以骑马，我不捉住张学良不下火线。”不久，辛庄敌人又陆续得到一些增援，如果时间拖长将更对我不利。蒋先云就果断地发起冲锋，他身先士卒，带伤骑上一匹白马，手举指挥刀，冒着密集的弹雨，冲入敌方阵地，到迫近辛庄时，不幸一发炮弹打来，先云同志受重伤连人带马倒地，担架兵前往抢救时，他口中仍在高呼“冲锋！冲锋！”随即壮烈牺牲在战场上。在先云同志牺牲精神的鼓舞下，全团官兵前仆后继，继续猛烈冲锋，一举突入辛庄，迫使敌炮兵仓促撤退，全线炮火声终于沉寂下来。

这时，我第十师也赶到七里头，和第十二师一起在正面发起全线攻击，敌人失去炮火支援，不得不放弃坚固工事向后溃退。我军遂由三面直迫临颖城下。下午四时，我二十六师的七十七团、七十六团，以及七十一团由辛庄从东北面向临颖城攻击，七十七团首先攻入临颖城，正面十二师的部队也同时突破守敌，从而取得了这场激烈战役的重大胜利。

回忆北伐以来，我军战斗之烈，死伤之大，实以此役为最。除蒋先云团长壮烈牺牲外，七十六团史参谋长也同时阵亡；七十六团团团长沈久成、三十四团团团长吴奇伟均受伤。从整个战役来说，如果不是先云同志首先建议以一团之众直扑右翼敌之炮兵阵地，我军正面两师队伍始终在敌优势炮火的威胁之下，不但进退维谷，实有崩溃之虞。在进攻辛庄时，如果不是先云同志临危不惧、身先士卒，也很难激励全体官兵万众一心，前仆后继，去突破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取得攻克辛庄的胜利。毫无疑问，先云同志在临颖战役中应立头功。

先云同志牺牲后，我曾向张发奎提出，要在北伐军中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张发奎说，刚刚接到武汉政府要我们紧急班师回去参加平定夏斗寅和许克祥叛乱的命令，等回武汉之后再说吧。到了武汉我又再提开追悼会之事，张发奎竟说，现在这里反共气氛很浓，共产党员都不能在部队带兵，蒋先云的追悼会不好开。我当时很气愤，心想一个这样忠于革命的共产党人为国牺牲了，军队里连个追悼会都不开，以后看谁肯跟你去卖命？这时张发奎要我把二十六师部队交给许志锐去带，叫我在他的总部当副官长，跟他到广东去。我想起先云同志生前对我说，国共两党可能会分裂，叫我不要跟蒋介石走，也不要跟汪精卫走。我就不跟张发奎到广东而自己已经庐山回福建去了。

北伐军不开追悼会，共产党和人民却忘不了蒋先云同志的丰功伟绩。周恩来同志在武昌主持了蒋先云同志的隆重的追悼会。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刊，登载了《悼蒋先云同志》的悼词。先云烈士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董必武同志早年 活动点滴

吴家骥

(一)

一九二一年春，我考上了所谓黄安的最高学府——县立高等小学。当时学校规定“文史教员跟班上，杂科教员满天飞”，就是说从新生入学起，到三年毕业止，文史教员是不更动的。教我们这班文史课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教员——董必武同志的四叔董素怀先生。在全校教员中数他的年龄最大，声望也最高，同事都喊他“四爹”，因而学生也照样喊他“四爹”，觉得比喊老师或先生来得尊敬一些，亲热一些。

“四爹”对于我和其他四个国文和历史两门课成绩比较好的学生，特别关怀和爱护，规定我们每逢星期天的上午都要去他家里补课，不准借故不到。当时，已经是民国十年了，可是社会上对于前清的科举功名，还是普遍的尊重。在县里，董家是世代书香人家，作为一个乡下娃子，能够走进书香世家的大门，是了不起的光荣事情，谁肯借故不到啊！这样，我出入于这家书香门第达三年之久。时间长了，师生之间也往往东拉西扯地聊起闲天来，因而对于董必武同志的前期历史，有个概略的了解。

董必武同志是十七岁考幼童进学成为秀才的。按照封建科举时代的习惯，没有考取秀才的读书人，即令皓首穷经，仍称为老童生；如果不满弱冠，就称为幼童，幼童赴考，必须用红线扎辫子。所以当时社会上都钦佩董必武同志是打红线辫子的幼童进学的。跟董必武同志同科以幼童考取秀才的还有张国恩（眉宣）和肖崇勋（觉天）。黄安县同科考取三个幼童，当时传为盛事。

董必武同志考取秀才，是科举考试的倒数第二科，尔后新学代替了科举，“连中三元”的机会是没有了。当时带点维新思想的官僚政客张之洞任两湖总督，在武昌办起几所新式学堂。董必武同志和肖、张等三位小秀才联袂赴省，考进武昌进文普通学堂学习。这是考取秀才三年以后的事情了。

张之洞兴办新学的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堂以读经为主，兼学西洋的一些东西，搞他那种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董必武同志和张眉宣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归来后在武昌租了一幢房子，成立了一个律师事务所，受理诉讼业务。肖觉天这当儿在武汉经营轻纺工业，代为介绍诉讼案件。由于办案快，官司又能打赢，因而“生意兴隆，声震武汉”（报上的评语）。当时董必武同志和张眉宣都已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武汉是在袁世凯的北洋军阀统治下，律师事务所便成了中华革命党地下组织的通讯机关。

律师事务所停办后，张眉宣还跟董必武同志一起干过一段时间的革命活动。后来他参加了汪精卫的改组派。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叛国投敌，张眉宣到南京去钻营湖北的伪省主席，被他的政敌暗杀了。肖觉天解放后是上海市政协委员。

董必武同志早在辛亥革命那年就加入了同盟会。赴日留学后，

逐渐在民主革命中锻炼成长。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登上了大总统的宝座，心犹未足，还想穿黄袍、坐龙廷、做皇帝。一九一八年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孙中山于一九二〇年又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这段时间，董必武同志经常往来于武汉、四川、上海之间进行革命活动。他和志同道合的几个朋友办起了私立武汉中学。他除任教员外，后来还兼第二部主任。该校校长刘觉民先生专门对外，实际校内事务全由董必武同志负责。

有一次，我用顽皮的口气问四爹：“四爹，怎么大家都喊你的侄儿为董胡子呢？他今年还不到四十岁吧？”四爹破例地哈哈大笑起来，连说：“问得好，问得好！哈哈，你们看过诸葛亮借东风么？那时的诸葛亮还只有二十八岁哩，不是胡子很长了么？哈哈，如今是民国，不是三国，时代不同，当然不能相比。对于这个问题，我从来没考虑过。不错，你们喊的董胡子，今年还不满四十，为什么倒留了胡子呢？我想，大概是这样的：现在一般人都认为青年人最容易受骗，什么新旧革命党，都是一些青年人；官厅里抓革命党，也是注意青年人。俗话说‘嘴上无毛，做事不牢’嘛。养起胡子来，别人对他的看法就有所不同，或许是养起胡子来便于开展工作吧！还有，他白天要工作，要教书；夜里要开会，要写东西，整天整夜忙得不亦乐乎，或许是没有工夫去剃吧！你们将来到武汉看到他，就会晓得的。他每月辛辛苦苦地得来几个薪水钱，自己节衣缩食，大半拿来救济读不起书的穷学生哪！他本来是个头顶功名的大先生，如今变成衣履补丁的穷小子哪！哈哈……”四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引得我们哄堂大笑。

一九二三年冬，毕业考试结束后，我们五个人凑了一点钱，买了一些“人事”去向四爹告别。老人家显得非常高兴。我们照

例行礼已毕，他马上通知后院送出五张小板凳，要我们围着火盆坐下。他呃呃啰啰地讲了两个古人刻苦求学成名立业的故事，勉励我们继续上进，不要半途而废。再三叮嘱明年正月到武汉去考中学。我们就势要求他给他侄子写封信介绍介绍。他迟疑了一会，又开始呃呃啰啰地讲开了。他说：“呃呃，这个可以不必，你们的程度可以考上武汉最著名的中学，这个，我是有信心的。至于写介绍信哪，我拿一件东西给你们看。”说着，一面叫我们自己倒茶喝，一面走到一只书箱前，抽出一本古装书，从里面翻出一张白纸来递给我们。他又呃呃地说：“看看，不懂我再讲给你们听。”我们五个把头攒到一起，见是一张单宣信纸，正中写了四行字，字体端端正正，一笔不苟，原来是四句诗，落脚一句下面有“用威”两个字，显然是名字。名字下面有一行小字“岁在丙辰”，下面还盖有一方篆体小印，我们不认识是什么字。四句诗是这样的：“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我们看来看去，除第二句略微懂得一点以外，其余三句都不明白。经过四爹详细讲解，我们才领会董必武同志是背叛封建礼教的旧家庭，表示不要什么功名，也不要家，毅然决然地跑到外面去参加革命，并有信心一定要推翻当时的军阀统治，让每个中国人都过自由幸福的生活。从此，我们晓得董必武同志名用威，字必武，后来以字行，不再用原名了。那首诗是民国五年写的，算是写给他四爹的家信。

(二)

一九二四年春，我遵照四爹的叮嘱，到武汉去考中学。投考

三所中学都录取了。由于学费不足，决定进私立武汉中学，因那里可以欠帐，等到学期终了，如果成绩最优，还可以得到校方的救济。于是我由堂兄吴家驹领我去见董必武同志。当我俩跨进他的办公室——一间空气和光线都不太好的平房，已经有三个同学坐在那里，董必武同志正低着头在看桌案上的什么文件。家驹喊了声“报告”，董必武同志抬起头来，连声说道：“坐下吧，坐下吧！”我端详了他的身材、面貌，很象四爹，只是额上和眼角并无皱纹，虽然蓄了短胡子，并无衰老现象。于是我回想起四爹谈论的胡子的来历、书香世家、幼童进学、革命党等等。正在浮想联翩之际，忽然一声“报告”将我惊醒，原来是先来的三个同学告辞出去了。家驹介绍说：“这是我的兄弟，名叫家骐，天资笨，家里穷，又想读书，所以……”董必武同志打断他的话，用慈祥的目光注视着我，满口黄安腔说：“不见得吧？他不是考在十名以里吗？就说笨吧，那也不怕，不怕笨，不怕穷，只怕不用功。带的钱不够，暂时欠一下不要紧，你领去注册吧！你是老大哥，要好好照顾他，就这样吧！”因为他很忙，我们连忙告退。我初进办公室时，心里忐忑不安，感到十分紧张。观察他的态度，听了他的讲话以后，却又感到非常亲切。尽管师道尊严，令人敬畏，但他为人和蔼可亲，并不使人拘束。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

私立武汉中学本部设在武昌涵三宫，第二部设在武昌武胜门外。高年级在第二部，董必武同志教高年级的国文课，住在二部的时间较多。我在武中两个学期都没念完，没有听董必武同志上过课。加之董必武同志来本部不是开会就是处理什么重大事情，因此难得有机会跟他接近。记得有一次，我在数学练习本子上写

了四句打油诗：“a b c d e f g，1 2 3 4 5 6 7，公式定理一大串，头昏脑胀真吃力！”任课老师倪季端先生把它递给董必武同志看了。于是他找我去谈话。他谈家常式的亲切地说：“怎么样？作业多了，做得有点头痛，是不是？你的打油诗做得不错啊！这是个好事儿，平时可以多写写，不过现在是读中学，要打好各科知识的基础，还不可能分科因材施教。听说你平时有空就看小说，练习写诗词，这个我们不反对；不过你现在就得注意到，毕业以后即令去考大学文科，数学不及格还是考不上。你看呢，是不是？嗯？就这样吧！”经过董必武同志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尽管我平时对数学感到头疼，到学期终了，我的数学成绩还是得了及格。

董必武同志擅长于写作，不爱多讲话，尤其不喜欢在公开场合发表长篇演说。而对于学生，却不厌其烦地注重个别谈话。由于他在学校里威信高，教育方法好，他对学生的个别谈话经常收到极好的效果。

那时学校的伙食，是由包饭作坊来承包的。他们承包伙食当然是为了赚钱，因而伙食时好时坏，往往引起饭厅风潮。记得有一天是星期日，照例中午在校吃饭的人数不多，厨房将前一天剩下来的饭菜应付午餐。而那天就膳的还有六十多人。饭里有一股馊气，四样小菜都缺油少料，确实难以下咽。忽然有人喊了声：“嗨，菜里有蟑螂虫！”又一声：“饭里有苍蝇！”“喊厨房来！”“喊厨房老板来！”在一串叫喊声中，厨房的人来了，发生了激烈争吵，接着就是“呼呼”、“嘭嘭”、“啪啪”、“轰隆”，板凳、饭桶、盘碟碗筷，乱甩乱砸，大打出手，饭厅里演出全武行。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忽听一声：“胡子来了！”

全厅顿时鸦雀无声。我抬头一看，果然董必武同志站在饭厅门口，扳起面孔一声不吭，随即迈着沉重的脚步，踱到厨房去了。一下子六十多人哗啦啦地溜出了饭厅。

后来听说，董必武同志经过仔细的询问，同其他老师进行认真的讨论，当天就处理好乱子。无论同学或厨房，都心服口服，没有半点异议。夜自修时，他找了三个为首的同学到他房间去谈话。他还是老样子，叫他们坐下来以后，心平气和地同他们谈心。问他们：“怎么样？这样处理有没有意见？不同意吗？提出来再研究研究好么？嗯！同意就算了。不是口服心不服吧？”接着他又说：“你们是学生代表，伙食不好，可以提意见，但应该找学校师长提，不要直接同厨房发生冲突。打人是犯法的，砸坏东西要赔，这个普通道理，你们都懂得吧？”然后他针对闹得最凶的一个说：“你家也住在农村呀？父亲呢？哦，六十多岁了，还种田。母亲呢？哦，早去世了。嗯，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小妹。有田地出租么？嗯，没有，全靠父亲和大哥种田过日子。啊呀！家大口阔嘛！生活困难嘛！父亲哥哥都不识字，嗯，那了不起呀！能够送你到武昌来上学，很有眼光啊！他们对你期望多大呀！如果我今天将你斥退，还要你父兄来赔钱吃官司，他们心里会多么难过啊！你来说说看，我应该对你怎么处置？……”他这一席话，说得那个捣蛋鬼“哇”地一声哭了。其余两个眼圈也红了。最后他老人家还抚摸着他们的头说：“不要哭了，只要认识到错了就好，回去自修吧！”就这样，他一不开除，二不悬牌记过，三不点名批评，把这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都教育过来了。在董必武同志看来，学生调皮捣蛋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把他们这股好动好闹的热情引上正轨。后来跟着董必武同志闹革命，发动

黄麻起义的，就有很多是他在武汉中学时的学生。

董必武同志的话之所以能感动人，首先在于他的身教。他当年是孙中山革命民主派在武汉的代表人物。在学生的心目中，他是革命的化身（当时还不知道他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他一天到晚，校内校外，忙个不停。书房的灯光往往通宵达旦。他的学问、道德、文章，在当时湖北省都是第一流的。然而他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他对学生要求严格，而律己更严；他对学生关怀备至，自己一点微薄的薪水收入，大部用来补助贫苦学生。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是以革命家的献身精神来从事教育事业的。记得那时有一位国文教员、武汉著名的书法家戴以仁先生，写了一首绝句，这样来讴歌董必武同志的：“韦编三绝圣贤功，欲讷于言志不同；朝夕辛勤施化雨，满园桃李笑春风。”

（三）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宣布国共分裂，提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反动口号，开始大规模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董必武同志当时是中国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常委、掌管全面工作。此外又任湖北省政府农工厅厅长。由于工农群众的掩护，化装离开了武汉。行前，他曾暗中指示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八十多条枪，队长程协超，是武汉中学学生，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及县警备队（三十多条枪，队长吴宝善，是董必武同志保荐的）全部开赴县北七里坪集中。当时，我是县农协候补执委和高桥区农协执委，早在六月间就接到命令，停止活

动。可是天天仍有农友找上门来问这问那，无法应付，只得跑到城里去请示。县农协所有委员都下乡工作去了，只有省农协特派员徐希烈（秉忱）和王秘书（积善）两人留守。他们指定我帮忙收拾档案文件，准备结束公事。不久，省里派一个叫贺守忠的来当县长，带来一个民政股长李贺镛，是本县人。他俩循着旧例，到处拜客。县府只有几个小职员，县党部只有一个工友，没人理睬；徐特派员、王秘书也避而不见；商会关了门，还有工会，妇女会，学校等等，到处吃闭门羹。结果只好要求王秘书陪李贺镛到七里坪去请队伍回县城。李贺镛家是老财主，大少爷出身，刚从省里佐治人员讲习所毕业。到七里坪后，所有负责人都避不见面，专门派了几个和他同过学的朋友作招待员，天天肥鱼大肉的款待他，声言只要贺县长客客气气地不同地方人为难，也不到省里去搬兵，所有部队就回到县城接受县长指挥，服从股长调遣。李贺镛拍拍胸部，表示愿意挑担子，并在谈判约书上签了字。于是请一付抬子，让他坐上，敲锣打鼓地送他回到县城。这个糊涂虫得意洋洋地对贺守忠说：“恭喜县长，兄弟不辱使命，所有官绅士兵都拥护县长，过几天都会回县城，县长可以高枕无忧了！”李股长一阵傻笑。贺县长也连连夸奖说：“辛苦，辛苦！老兄真是一位干员哪！”

李股长回到黄安县城的第三天（十一月十三日）晚上，约莫半夜过后，一阵劈劈拍拍的枪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连忙喊王秘书（徐特派员早两天走了），他好象胸有成竹似的，懒懒地应道：“睡你的觉罢！大惊小怪干么？”我不敢开门，也睡不着，歪在床上聆听动静。一会儿枪声就没有了，仿佛在奏军乐，夹杂一阵阵的口号声。天刚蒙蒙亮，有人来敲大门，王秘书出去开了

门，原来是几位农民军战士，都认识的。只听见“你好！”“你们好！”招呼之后，便催促我们快到县府去。等我们走到县府大门口时，贺守忠已被处决了。

贺守忠到任不久，城里乡下就有传说：“县长是活（贺）不成，叫名寿终（守忠）正寝！”果然应验了。

李股长被五花大绑着，结果有人做好做歹地把他放走了，其余一个也没有追究。

这时县府大门上已经扎了彩，一面缀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在门顶上空迎风飘扬。头门左边挂起一丈多长、一尺多宽的红绸子，上面金光灿灿的六个大字——独立劳农政府（几天之后接到上级命令改为黄安县劳农政府）正对面的照壁上，贴了一张红纸布告，宣布劳农政府成立，即日启印办事云云。后面署名是劳农政府委员会主席曹学楷，委员十五名，我只记得吴焕先、王秀松、林正祥、张梅卿、张菊卿、汪奠川、戴克敏、刘文蔚等几个名字，其余的不认识，也记不起来。红布告的左边还有一张工农革命军的戒严令。大意是在戒严期间县城南西北三门禁止行人，只准从东门进出；任何人都要接受门卫的检查；夜晚静街，无事不准开门等等。戒严令后面署名是总指挥潘中汝。记得劳农政府的委员中，除吴焕先以外都是董必武同志的学生。

这次行动，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麻起义。

当时，我没有参加党组织，但我的职务是区县农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也是农运干部。县委管人事的林正祥同志当天下午派我帮助吴兰阶先生写一付对联，贴到县府大门口。吴先生是有名的书法家，他随作随写，一挥而就，红纸黄字的长联，应用了十个颜色形容词，对联是：“痛恨绿林兵，假称白日青天，黑暗沉沉埋

赤子。克复黄安县，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这付对联在当时是脍炙人口的。

第二天，林正祥同志派我跟城区区委书记钟方灵同志一道下乡工作。钟方灵是我堂兄家驹的表哥，长我八岁，把我当作表弟看待。他照顾我的眼睛不便，每到一村，总先把我安置在可靠的农友家里，专门保管区委的文件和帐册。当时的所谓区委办，就装在我的文件袋里。县委和革命军总部的同志们白天都要带队到区、乡去没收土豪的浮财，夜晚回到城里开会办公。我们搞农村工作的恰恰相反：白天找一个隐蔽安全的地方休息，夜晚到各村去开会宣传，并动员青壮年参加工农革命军。因此，我白天有的是时间阅读文件。所有内部的指示和公开的文告，都是由董必武同志署名发布的，并没有写上什么职务。有些县委文件中，开头都是“接到东特武（即中共鄂东特委董必武）指示”字样，一看就晓得是董必武同志的指示，但在当时，“东特”是什么意思，我搞不清楚，也不敢问，因为钟区委经常告诫我：注意保密。

一天夜里，晚饭刚吃过，钟区委带着我和一位革命军班长出发去七里区边界打鼓岭开会，忽然一位联络员赶来通知，要我们三人马上回城里去听报告，说是董必武同志来了。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摸黑到城里（足有十五里），问到大会在教育局大厅里开。我们挤进人群，由于人多，又没有电灯、汽灯，只点两支蜡烛，我这个近视眼根本看不清讲台上的人，只听一位同志在作形势报告，快要结束了。听讲话，不是董必武同志的声音，有人说上面派来的郑位三同志。他说：“蒋介石叛变了，汪精卫也叛变了，陈独秀投降了敌人，一个也靠不住，只有靠我们自己！董先生指示我们干了几个月，我们黄安东北部七里、紫云两个区，

麻城的西北部乘马、张店两个区，联成一片了，农民都组织起来了，武装起来了，东到西将近百里，南到北一百多里，北边到了新集（今河南省新县）不是一百多里吗？总部扎在七里坪，进可以攻，不是攻进县城来了吗？退可以守，住到天台山十二莲台深山大泽里去，步兵坦克冲不进，飞机大炮轰不着。我们都是种田人，开荒种地，不愁吃穿二字，哪里有这么好的条件啊！”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打断了他的讲话。最后他说：“时间太迟了，明天还有任务，同志们休息吧！”

劳农政府成立第二十三天的晚上，土匪部队三十二军任应岐部袭击县城，劳农政府及革命军总部负责同志率领部队突围，连夜转移到七里坪。后来听说转移到大别山里去了。由于时间仓促，所有区乡工作人员都没有转移，先后转入地下工作。我与表哥钟方灵分手后回到自己家里。听到反动派悬赏通缉布告上有我的名字。在乡间隐蔽了两个多月，度过了阴历年，父亲便将我送到浙江孝丰章村伯父家里去了。

（陈文秋整理）

忆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建的 兴国模范县

周 爱 民

（全国政协委员）

我的家乡江西省兴国县是老苏区。土地革命时期，“兴国老倭”是革命同志对我们兴国人的爱称，也是我们兴国同志的骄傲。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土地革命时期，兴国县是中央苏区的模范县，是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建的巩固的红色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二月，红军攻占了兴国县城，这是我党掌握的第一个县城。毛泽东同志为了把兴国县建成红色的革命根据地，同年四月就亲自来到了兴国，住在城内的文昌宫。当时我已在兴国县团委工作。我感到毛泽东同志是把兴国当作扩大红军和实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做好群众工作的试点。他要亲自创建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这次在兴国期间审阅了农民协会拟定的土地法，即后来的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土地法。他还曾在肖街上一个当铺内

召开过县党政负责人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同志对兴国的分田问题作了具体的指示，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豪绅、祠堂、庙寺的土地和富农多余的土地，还提出了抗租抗债，取消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等口号。一个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开展起来了，秘密农民协会转为公开，领导打土豪分田地，千千万万农民积极参加农会，其势如暴风骤雨，吓得地主和一些反动家伙魂不附体，有的假装进步参加分田，有的逃往外地。

农会公开以后，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也相继成立了。为了配合分田分地，必须肃清土顽扩大苏区。一九二九年四月下旬，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某部从兴国县城出发，经江背洞往古龙岗圩消灭了古龙岗、三寮，梅窑等地的靖卫团等反动武装，完成了东乡地区的解放。至此，兴国全县获得了解放。

一九三〇年春，毛泽东同志第二次来到兴国，召开了县级党政军干部会议，听取了工作汇报并作了许多具体指示。我记忆最深的是：在会上，当有的干部汇报分田中有隐瞒土地和分近田（靠家近）、分好田这些问题时，毛泽东同志指示：要查田，要组织以雇农和贫农为主的领导班子进行分田，并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这样，兴国县又进行了第二次分田。这次分田由于认真、全面地贯彻执行了党的分田政策，使兴国的土地革命斗争取得了比较大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为了巩固和扩大苏区，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扩大红军外还建立群众性武装组织，即二十三岁以上的男人成立赤卫队，十六岁到二十二岁的男女成立少先队，地方武装成立起红军东河指挥部，任命吕德贤同志为指挥。部队去消灭社富南边七坊地方靖卫团和九山地方的靖卫团等国民党地方反动武

装，取得了全胜。

当时，在兴国和零都县交界的地方桥头、马安石、上保地方有个又大又坚实的土围子，里面盘踞着零都县东乡和兴国县东乡两地的靖卫团，一些反动头子为了作垂死挣扎，把土围子进行了修整，围墙全部用桐油、石灰和石头重砌，并在里面储存了足够一、两千人吃一到二年的粮食，以期长久与人民为敌。这股反动势力不仅影响兴国县苏区的巩固，而且影响兴国通往瑞金县直到福建的通路。消灭这股反动势力，势在必行。为了攻克这个反动堡垒，毛泽东同志指示陈毅同志率领江西红军的一部分和县的地方武装去打掉这个土围子。可是，当时红军的条件是比较差的，不但没有大炮、飞机，就是步枪和子弹也是很少的，打这样坚实的土围子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怎么办呢？陈毅同志召集指战员们一起制定作战方案，开始是把土围子四面包围，一方面打枪佯攻，一方面开展政治攻势，向里面喊话，就这样包围了一个多月。后来陈毅同志和大家一起总结了经验，群策群力制订了新的作战方案，即挖坑道进行爆破。战士们先在我方阵地开始挖，一直挖到土围子的墙脚下，可是当时没有炸药包，怎样进行爆破呢？大家就自己动手制造打鸟用的硝，然后把硝装在一只棺材内，再把装满硝的棺材推进到土围墙脚下，装上长长的引火线，最后远距离进行点火引爆。一下子把土围子的围墙炸开了一个大缺口，部队一个冲锋，很快拿下了这个反动堡垒，反动头子们除当场打死的以外无一人漏网。兴国东乡的反动靖卫团总张修贤也被活捉，在兴国江背圩公审后枪毙了。陈毅同志指挥的这一战斗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最后肃清了兴国县靖卫团。

根据我的记忆，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间，毛泽东同志先

后七次到兴国，特别是第二次反“围剿”和第三次反“围剿”期间，毛泽东同志先后四次来到兴国，这不仅是因为兴国地处反“围剿”的中心，而且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对兴国县工作的重视和关心。为了抓好这个点，无论是政治上、军事上、生产上、生活上，就连文化教育方面，毛泽东同志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我记忆较深的有以下几件事：

一、记得著名的兴国山歌中有几句这样的词：“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就要当红军”，还有至今流传至广的《送郎当红军》、《十送红军》等民歌都是当时在兴国传唱的。这些歌生动地表现了兴国人民响应毛泽东同志扩大红军的号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兴国掀起的一个踊跃参军高潮的动人场面。毛泽东同志曾在长冈乡有个统计：青壮年男女每一百个人中就有八十个当红军的。当时红军中的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成员多数是兴国人，而兴国模范师则全由兴国人组成，游击队、地方武装内究竟有多少兴国人，就无法统计了。由于青壮年大部分都当兵去了，农村出现了劳动力严重缺乏的情况，生产受到影响，怎么办呢？毛泽东同志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指示我们地方党组织把留在家中的男女群众组织起来，以互助组耕田队的形式集体进行生产。毛泽东同志说：不但要扩大红军，还要搞好生产，做好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赞扬了长冈乡的互助、互济工作。由于毛泽东同志正确及时的指示，我们全县在扩大红军、组织生产和关心群众生活，特别是关心红军家属生活等方面做得较出色。

二、一九三一年春，国民党策划第二次“围剿”的前夕，毛泽东同志来到兴国，他在苏区中央局商讨主力红军如何反第二次“围剿”的作战方案时，特别对地方党组织如何做好反二次“围

剿”，并能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做了具体指示。他要求我们加强地方武装，健全县独立营、区大队和赤卫队、少先队组织。并指示我们在敌人行动时，做好侦察敌情和在夜晚打扰敌人的工作。平时要建立盘查哨，做到每一个要道、三岔口都日夜有岗，检查来往行人路条，严防敌探混入。他还要求我们在群众中广泛进行宣传动员，普遍地做好坚壁清野工作，使敌人抢不到东西，吃不上饭。敌人的这一次“围剿”从我县西边开始，我们就从老营盘、高兴圩打起，诱敌深入到莲塘、黄坡。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挥，仅两个战役就把敌人打垮了，很快粉碎了蒋匪军的二、三次“围剿”。群众称颂“朱毛红军”象神一样，兴国县成了敌人攻不进的巩固红色根据地。

三、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和培养干部，“富田事变”以后，以李富春同志任书记的中共江西省委迁往兴国，上级又派了贺昌同志担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为了培养干部，县委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图，连续举办了各种短期党训班，不断培养新生力量。现在江西省委的杨尚奎同志就是当时县党训班的学员之一。各区委也上行下效，同样举办党训班。毛泽东同志还教导干部做工作要以点带面。当时曾山同志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他曾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讲，做好一个乡的工作，省主席的工作才能做好。否则省主席是当不好的。

四、地处江西边缘的兴国山区，是个文化极其落后的地方，全县只有一所雅号“平川”的中学，小学也没有几所，农村中识字的农民很少。毛泽东同志来到兴国以后，非常重视抓青年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指示共青团要当好党的助手，除做好扩大红军和禁赌禁鸦片的工作外，一定要把少先队、儿童团组织好，要设

法建立小学，男女青壮年不能进学校的要组织进夜校和识字班，¹¹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把当时的兴国团的工作开展得朝气蓬勃。毛泽东同志非常称赞我们共青团的成绩，派了任弼时同志前来参加第一次兴国共青团代表大会，任弼时同志检查了团的全面工作，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做了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就在这次大会上，党给予我这个贫农儿子极大的荣誉，授予我模范共青团县委书记的称号。

毛泽东同志远离兴国期间，还关心、调查研究兴国的工作，他曾在罗坊地方召集兴国县参加红军的傅洛庭、李昌英、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雷汉香等八个同志，开了调查会并写了《兴国调查》一文。一九三〇年十月底毛泽东同志亲自到长冈乡调查，写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一文。

中央苏区兴国模范县，是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建的！

这就叫“白皮红心”

李长如

抗战初，由于我红二十八军长期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消息闭塞，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毫无思想准备，干部战士听说要脱下红军服装，穿上国民党的服装，由国民党发薪水，归国民政府领导，意见很大，议论纷纷。这时，郑位三同志来做了工作，他说，现在是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矛盾，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红军改编为新四军，虽然名义在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下，但我们仍有独立自主权。比如：我们的军队仍然是由党领导的，不受国民党指挥；我们只接收国民党的薪水、服装和武器，可作战怎么打，看我们自己的；建立人民政权，同样不受国民党的领导。他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西瓜，从外面看是青的，可里面却是红的。我们虽然穿着国民党军队的衣服，戴国民党军队的帽子，但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人民的子弟兵，这就叫“白皮红心”嘛！听到这，我们都会意地笑了。组建四支队的工作很快便完成了。

护送叶剑英、周恩来同志到苏区

卢伟良

一九三〇年秋的一天，我正在闽西虎岗革命根据地，突然闽西特委书记邓发同志把我叫去，交给我一个紧急任务，要我立即动身去香港，护送留居在香港的叶剑英同志去中央苏区。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正悬赏十万元通缉叶剑英同志。怎样才能安全护送叶剑英同志到达中央苏区，对我来说，的确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我到香港后，立即按上级的指示，到香港跑马地聂鹤家里去和叶剑英同志会面。聂鹤是云南人，是叶剑英同志在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聂鹤一家住在香港跑马地一座西式楼房里，叶剑英同志夫妇就住在这座楼房的二楼。当时我和香港交通站潘同志一起去的。上午九时许，我和潘同志到达叶剑英同志的住所，叶剑英同志看到我们很高兴，热情地以茶烟款待我们。潘同志介绍说：“他就是中央苏区派来接你的卢伟良同志。”并说：“到中央苏区的船票等都已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动身。”潘同志坐了一会，因为有事先走了，留下我和叶剑英同志商谈去中央苏区的事情。

我和叶剑英同志在无拘束的气氛中谈了约一小时。随后，叶剑英同志叫他的夫人带我去会见住在香港九龙城宋皇台的叶道英

同志(叶剑英同志的弟弟)和叶剑英同志的母亲赞伯母(原名陈秀荣)。当我们在香港办理离境手续时,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气氛更为严重了。这时,传来了中共广东省委军事部秘书长梁剑英同志被捕的消息。随即谣言四起,说什么“叶剑英被捕了!”我们听了这谣言,只置之一笑。但是,我们知道敌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必须提高警惕,早日离开香港。

我们离开香港的手续很快办理好了。离开香港那一天,各自带了船票上船,免得引起人们的怀疑。我们是中午一时许上船,叶道英同志送我们到岸边码头,他直等到下午三时,我们船开行后才依依不舍地回去。船开后,我们约定,为了不引人注目,作为互不相识的旅客,所以我们在船上极少交谈。

第二天早上八时许,船到了汕头。我们登岸后,在一间小食店匆忙吃了一顿早餐,即乘轻便火车去澄海,再由澄海步行到黄冈圩。我们到黄冈圩已是黄昏的时候,立即到一个地下党同志的父亲开的咸杂店,受到这位同志热情欢迎,他以丰盛的潮州菜款待我们。当晚我们就住在这间咸杂店。

从黄冈圩到闽西特委所在地,必须经过埔东,黄冈圩到埔东都是一些崎岖难走的山路,过去我只走过一次,有许多村庄、小道都记不太清楚,又不好问人,怕引起盘问,万一落到反动民团和土匪手里就不好办了。所以,我们就得格外小心在意。幸好这一天天气晴朗,又不太热,我们在空气清新的山间小路上赶路,精神感到格外畅快。为减少赶路的疲劳,叶剑英同志一路上给我们讲解《红楼梦》里的故事和人物,还背诵《红楼梦》里的诗词,记得有〔终身误〕、〔聪明累〕,当《红楼梦》里的一些有趣故事,引起大家哈哈大笑时,同志们顿然忘记长途跋涉的辛苦。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无论如何当晚就要赶到饶埔苏区（即红军十一军四十八团驻地）。但是，我们走到下半夜二点多钟，的确太疲劳了。恰好这时，经过一个小村庄，村边有一间厕所，在厕所旁边堆着许多新打下的禾草。于是，我们拆了几捆禾草作床铺，大家躺下就睡着了。我因为要放哨，保卫叶剑英同志等人的安全，一直不敢睡。差不多快天亮时，我把他们叫起来，继续赶路。我们大约又走了二十多里路，即进入埔东游击区，终于安全到达县苏维埃所在地。

县委负责同志饶龙光、贺遵道知道叶剑英同志安全到达该区，非常高兴，热情欢迎我们，记得还请叶剑英同志讲解当时国内外的革命斗争形势。我们在这里住了三天，县委派了一班红军护送叶剑英同志等人到闽西特委所在地虎岗。到虎岗时，邓发同志热情招待叶剑英同志等人。

叶剑英同志等人在虎岗住了几天，我又接受新任务要到香港。叶剑英同志写了几封家信，要我带给留在香港的家人，报告平安到达苏区的情况。当我再从香港回到虎岗后不几天，闽西特委就派了一个连红军，护送叶剑英同志以及逗留在闽西特委的其他同志约三十多人，经由长汀、上杭等地到江西中央苏区去了。

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我奉命从闽西回到香港后，又接到上级指示，要我立即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接受任务。于是我当天就买了万吨邮船的船票上了船，经过两天海上生活，来到了上海，住进英租界的一间旅馆。我按规定向联络点发了信以后，就焦急地等待着，猜想着：中央出面的将是个什么人呢？我盼呀，盼呀，一步也不敢离开旅馆，真是“望眼欲穿”了！

几天后，一个晚上的八点钟左右，我终于盼到了“来访”的

亲人，那是一对中年夫妇，男的身着白竹纱唐装，面庞清秀，目光锐利，举止潇洒，谦恭有礼；女的眉目舒展大方，态度和蔼可亲。我和他们接上了暗号，互通姓名，当对方说出“伍豪”两个字时，我不禁“啊”了一声，真是又惊又喜，原来是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

周恩来同志的大名，我早就听说，他领导的几次重大斗争的情景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回绕。然而，当久经考验的、传奇式的周恩来同志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却高兴得不知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了。现在只记得我曾向恩来同志叙述过自东征以后我党的政治主张在梅县深入人心，以及大量发展党团组织，普遍建立工会的情况。当时，梅县革命的发展，是与恩来同志关怀分不开的。

原来，这次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护送恩来同志到江西苏区去。恩来同志向我详细询问了上海—香港—汕头—潮安—大埔—青溪（我们交通站所在地）交通线情况，然后决定让我带三位同志返回青溪，准备接应。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恩来同志由肖桂昌同志陪同，沿我们的交通线顺利到达青溪，同志们都为圆满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高兴。我们煮了饭来招待恩来同志，大家边吃边听恩来同志讲述国内外形势，这时红军已胜利地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九·一八”事变也已经发生，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矛盾加剧，江西、闽西苏区（即后来的中央苏区）正处于大发展时期。恩来同志对形势了如指掌，谈笑风生，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饭后，恩来同志离开青溪，继续前进，交通站六位武装同志护送，走了一晚，途经多宝坑、伯公拗到达永定县城（当时永定县委书记是肖向荣同志），恩来同志就胜利进入苏区了。

夏曦同志牺牲的经过

袁福生
(湖南省政协常委)

夏曦同志吃过面包(去过苏联),是党的六大中央委员。后来,被派到洪湖和湘鄂西苏区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工作。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六军团与贺龙同志的红三军(二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会师后,在永顺县龙家寨打败了国民党匪军陈渠珍、皮德培、杨其昌三个师,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湘鄂川黔苏区。一九三五年冬,大庸的丁家溶和永顺的塔卧会议后,夏曦同志到地方工作一段,后被分配到红六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他对同志要求较严,对工作认真负责。

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间,我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贵州,在大定县将军山打了一个大胜仗,随后又攻占了毕节县城,使驻在贵州的蒋介石和王家烈的军队心惊胆颤,吓破了狗胆,不敢轻易向我军进攻。因

此,我部队在毕节城等地得到了十余天休整。休整期间,我们在当地进行了广泛的抗日救国宣传,执行了毛主席的统战政策,因此,有几股土匪部队和地方少量保安队向我军投降,被我们收编为抗日救国军。但是,其中有一股席大明部是伪降,企图

骗取我们发给他们武器弹药和被服，然后仍然拉走占山为匪。这股土匪驻在离毕节城几十里的野马川山坡上。有一天，夏曦同志带了两个警卫员去给这股土匪做工作，刚过了一条河往山沟里前进，这股土匪就向夏曦同志开枪射击，夏曦同志立即带领两个警卫员往回返，到了河口一看，渡船不见了，于是两个警卫员保护着夏曦同志泅水渡河，但因夏曦同志不会游泳，结果被淹死，一个警卫员为了救护首长也被淹死。另一个警卫员游泳渡过河后，回来报告。当时，我们军团保卫局得此不幸消息后，迅速派去了二十余人（我是其中之一），赶到河边，土匪已经逃走了。我们在河里找到了夏曦同志和警卫员的尸首。夏曦同志的尸首，抬着随部队走了两天后，才安葬在贵州和云南交界的七星关石桥边的山坡上。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供稿作者略作修改）

郝清玉烈士的豪言

曾任中共顺直省委农运部长的郝清玉同志一九三一年不幸被捕。一天，敌人装出一副温情的样子对他说：“郝先生立志为国，精神可佳，不过，共产主义不合中国之情，请先生改弦更张，我们做个好朋友吧。”郝清玉大声斥道：“收起你这一套吧！马克思主义是一定要胜利的，你们长不了！”敌人恼羞成怒，对郝施加毒刑后又说：“只要你宣布脱离共产党，就可以送你出去，否则，枪毙！”郝清玉轻蔑地一笑，斩钉截铁地回答：“怕死不当共产党，要杀就杀，共产党是杀不绝的，你们可以把我杀死，要我叛党——办不到！”

（李步庄）

肖劲光同志遭受王明路线 迫害的一段经历

——访伍修权同志

本刊记者 石肖岩

肖劲光同志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曾遭受到王明路线的迫害，被指控为“违抗上级命令和退却逃跑”的“军事犯”，判刑问罪。时间已过去四十多年。前些日子，我们访问伍修权同志时，他谈到这一事件中他所了解的有关情况。事实告诉我们，肖劲光同志遭受的迫害，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它反映了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和红军带来的巨大危害。

一九三一年夏，伍修权同志从苏联回国，经过上海、香港、汕头、潮州、大埔这条地下秘密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伍修权同志说：“进入苏区的第一站是闽粤赣军区，当时军区参谋长是肖劲光同志。我到达后，由省委分配去军区作战科担任参谋。军区司令部设在虎岗的一个祠堂里，肖劲光同志住在东侧一间屋，我和科长住在西侧。这时我才和肖劲光同志认识。由于时值第三次反“围剿”战斗，情况比较紧张，省委和军区领导经常找我们一同商讨作战情况。我在和肖劲光同志的接触中感觉到，他是一位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指挥员。后来，在芦丰战斗中，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

伍修权同志到职之后不久，作战科拟定一项作战计划，在芦

丰突袭国民党地方部队钟绍奎的一个团。当时，闽粤赣军区并没有什么主力部队，只有机关枪连、警卫连和彭杨军校几个学生队。和敌人相比，实力悬殊。战斗开始后，情况出乎意料，敌人十分顽固，几次发起反冲锋。肖劲光同志机智灵活，决心果断，命令伍修权同志指挥机关枪连在侧翼英勇反击，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战斗中，肖劲光同志身先士卒，几次冒着生命危险，冲在最前面。这次战斗，从拂晓起一直打到下午四五点钟，终因敌我力量相差太远，打了个平手，双方主动撤出了阵地。就在这场战斗中，伍修权同志负了伤，彭杨军校校长李林同志英勇牺牲。

伍修权同志对我们说：“事有凑巧，我到后方养好伤后，于当年十月（阴历八月）分到了瑞金新建立的红军学校，校长恰恰又是刚刚从前线调回来的肖劲光同志。我们在这所学校又一同工作了约半年时间。一九三二年夏肖劲光同志调任闽赣军区司令员，我们才再次分手。在红校的这一时期，肖劲光同志工作负责、经常下连队了解情况的好作风，给同志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一九三三年十月，共产国际派李德到中央苏区瑞金担任军事顾问，中央选派伍修权同志去当他的翻译。当时，正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的时候，也是王明路线全面贯彻给党和红军造成严重危害的时刻。

“记得肖劲光同志遭受迫害的起因是这样的，”伍修权同志告诉我们，肖劲光同志在闽赣军区任职时，对王明路线搞的那一套“全面防御”、“短促出击”，以及“以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很不满意。可是，李德和“左”倾路线领导人手握大权，他们不许任何人违抗他们的意志，更听不进一些同志的不同意见。那

时，肖劲光同志所在的闽赣军区司令部设在黎川，但部队都调到别处作战去了，他根据敌人进攻的形势，估计敌人可能进犯黎川，即建议红军主力也应及早集结于光泽、资溪一带，消灭进犯黎川之敌，而不应死守黎川。此建议遭到了否定。教条主义者既要守黎川，却又不派兵，反而在敌人进攻前数日将黎川仅有的一个闽北独立师也调走了。红军主力也仍继续在延平、沙县一带活动。肖劲光同志当时手上只掌握有一个六十余人的教导队和地方上几个游击队。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第五军周浑元部以三个师的兵力向黎川进攻。在敌我力量异常悬殊并在我后路即将被敌切断的危急关头，肖劲光同志断然决定撤出黎川，把部队转移到新的作战区域。当时毛泽东同志是反对李德他们这种打法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应该放弃黎川，诱敌深入，然后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而李德等却不顾自己力量的不足，执意要坚守黎川，并把部队调来调去，分兵把口，疲于奔命。黎川失守明明是“左”倾机会主义者消极防御、指挥失误的结果，却怪罪于肖劲光同志。黎川失守后不久，肖劲光同志又奉命率部队配合三军团主力消灭敌人一个师，战斗于八角亭一带展开。肖劲光同志先率部队与敌人打响，激战两天，将敌阻于八角亭以东森林地带。第三天，三军团主力投入战斗，发起总攻。但总攻未能奏效，损失很大，被敌击退。于是敌人在增援部队和飞机的配合下，向我阵地发起攻击，阵地被突破，敌人突围至浒湾。战斗结束后，彭德怀同志对战斗情况作了调查，认为肖劲光同志并无过错，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负责人却将肖劲光同志撤了职，调总部审查。

在审查肖劲光同志的问题中，还有一个所谓丢伤员的问题。那是在八角亭战斗中，部队伤亡较大，有二百多伤员需通过敌封

锁区送到后方，肖劲光同志决定派一营兵力负责掩护，在夜间通过。当夜绝大部分伤员安全通过，只有十余付担架因掉队，在天明前未能通过，被敌发现劫去。这也成了肖劲光同志“右倾逃跑”的一条罪状。

伍修权同志说，黎川失守等消息很快传到了红军总部，当他将情况报告李德之后，李德顿时大发雷霆，他本来就对肖劲光同志不满，这时喊了起来：“肖劲光这个人擅离职守，胆敢放弃黎川，这是有意破坏我们反五次‘围剿’的整个部署，应该军法从事！军法从事！”

李德这个错误武断的意见，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负责人的支持，他们无限上纲，把明明是“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造成的失利，算作肖劲光同志“失职”的罪责。并于一九三四年一月组织了临时法庭，对肖劲光同志进行了“宣判”。他们给肖劲光同志扣了不少罪名，什么“罗明路线在红军的代表”、“肖劲光机会主义”，甚至提出“打倒蒋介石的走狗肖劲光”等口号，把黎川失守、八角亭战斗失利、部分伤员被劫，等等，都归罪于他。在肖劲光同志提出这都不是事实时，他们却说：“虽然事实有出入，但是党已决定用开展对你的斗争来教育全党，你应当服从党。”就这样，在王明路线统治我们党的情况下，将肖劲光同志判刑五年，开除党籍，并宣布无上诉权。

伍修权同志谈到这里，我们插话道：宣判的消息我们从当年的《红色中华》报上看到了，宣判词上说肖劲光同志“在敌人五次‘围剿’面前，陷于机会主义的悲观动摇与惊慌失措”，显然这都是强加的不实之词。伍修权同志同意这个看法，他深沉地说，王明路线远不止使肖劲光一位同志受害，它使许多不同意这

条路线的好同志都蒙受了不白之冤，记得邓小平、毛泽潭、陆定一、郭化若等许多同志都受到过迫害。更重要的是，王明路线在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在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把毛泽东同志排挤出中央领导岗位，使党和红军遭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们问道：肖劲光同志被临时法庭判处五年监禁徒刑，以后情况怎样呢？伍修权同志高兴地回答：“由于毛泽东同志亲自干预了这件事，他坚决不同意这种错误做法，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慑于毛主席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所以没有执行对肖劲光同志的判处，把他下放到红军学校当教员去了。后来，在遵义会议上得到了彻底平反。”

十几年后，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于延安召开，在华东代表团讨论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时，伍修权同志作了一个发言。他郑重地提出，肖劲光同志是我党我军一位很老的同志，他遭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迫害，经受了那么大委曲，但他从来毫无怨言，兢兢业业，继续为党工作。这种品质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他建议在中央委员会里增加肖劲光同志。伍修权同志说：“后来，中央提出正式候选名单，上面有了肖劲光同志的名字。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提的意见，但说明当时党的生活是非



肖劲光同志（一九三五年）

常民主的，代表提的凡有道理的意见，中央就会采纳。”就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党代表大会上，肖劲光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夜战将军”王友均

徐深吉

王友均同志，一九一一年出生在湖北广济县一个农民家庭，自小参加红军，由于作战勇敢机智，被选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队当队长。一九三三年夏，王友均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一团团长，这个团善于夜战，常常出奇制胜，下举一例：

三四年八月，正是反六路围攻的时候，王友均率团在大通江河以东进行阵地防御，他查明大通江河以西敌军部署之后，趁着一个漆黑的夜晚，带领三十余人的一支手枪队，偷渡怒涛汹涌的大通江河，绕过敌人几道岗哨和障碍物，摸到敌人后方牛角墩（地名），插入敌人空隙，攀越几丈高的悬崖，突然袭击了敌军一个团部。他们无声无息地摸进敌营，用大刀砍死敌团长，接着解决了敌团部，将指挥机关全部毁掉。由于一枪未放，四周之敌沉睡梦中，丝毫无动。当他们发觉时，王友均同志率领的勇士们已换上敌人服装，带着俘虏和缴获的文件、武装等，安全地返回了自己的阵地。就这一次夜袭，引起了敌人的极度惊恐，后来每到晚上就提心吊胆，乱放枪。

不久，王友均同志就任九十一师副师长。三四年冬天，在通江县毛峪镇召开的红四方面军政工会议上，授予他“夜战将军”的光荣称号。不幸的是，三五年八月，当他任第十师师长时，于包座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二十四岁。

关于李汉俊

李书城^①致觉明的一封信^②

觉明兄惠鉴：

两信奉悉，因赴北戴河休假未及奉复，至以为歉。现就来信所述提纲，就我所知略述于下：

汉俊出身的家庭：其祖父家明先生是潜江县沱埠垸的中农，父亲凤亭先生是一个秀才，在潜江县城内作私塾的教师。

汉俊生于光绪十六年庚寅年三月。

在日本进东京法国教会学校晓星中学校，升入日本高等学校后，改为清政府的官费学生，以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当时与日本进步人士河上肇氏以师生关系常有往来。他信仰共产主义，得河上肇之启发甚多。学成回国后，即在上海同陈独秀等发起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初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鼓动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在上海《星期评论》和在上海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写过文章。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到上海访问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并商量成立中国共产党，汉俊参加这一运动很早，中共成立之初，他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一九二〇年冬，陈独秀赴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他代理上海共产党书记，至一九二一年七月止，约九个月，他对各地党组织联系发动尽力独多。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

中，汉俊为上海区代表，会议的会场就设在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十号汉俊的家里，他的兄书城住在楼上，他住在楼下^③，法租界巡捕听他们用法语讲话，即时回捕房派人来捕，他们马上将文件藏匿，有些人离开，只有几个人留在那里谈话，法巡捕扑了个空。他们以后转在嘉兴小船上继续开会。

汉俊由上海回武汉后，为掩护计，曾在武汉市政督办公署挂名义。民国十二年，汉口铁路罢工发生，“二七”惨案时，当夜有工友送信到武昌汉俊家中，嘱其速避，他即夜离开武汉转到北京，住其兄书城寓中，从此与党脱离了关系，由其兄介绍曾任北京外交部秘书。他常与苏联驻京大使馆有联系，并与李大钊经常会谈，曾到张家口向冯玉祥讲述俄国革命情形，赞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又在北京教育部任职。随后回到武汉，在武昌师范大学当教授，编有马克思唯物辩证法讲义，与该校教授耿丹提倡新学说，为学生们敬服。由此与当时在武汉教辩界的落后顽固分子结了私怨，种下他以后被杀的根源。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兴，汉俊与董必武先生等在武汉策划响应北伐军的活动，曾组织湖北各界代表团到长沙欢迎北伐军，汉俊为湖北教育界代表。北伐军光复武汉后，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成立，汉俊任湖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科长^④。湖北省政府成立，汉俊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是时，他加入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与董必武先生同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听董先生的领导。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分裂，共产党退出武汉，湖北省政府改组，由孔庚、李书城、叶祺为省政府常务委员轮流为主席，孔庚兼民政厅长，李书城兼建设厅长，李汉俊兼教

育厅长，张国恩、邓初民为委员，继续执行省政并兼管武汉中央政府遗留的中央机关的职务。西征军将到武汉之前，湖北省政府决定由司法厅长郝筱章将当时在武汉所捕获共产党嫌疑分子二、三百人全部释放。及西征军到武汉后，总指挥程潜兵力小，不能指挥桂军，桂军十九军军长胡宗铎、副军长陶钧籍武汉卫戍司令部职权，乱捕共产党人，派其外交处长同日本驻汉领事交涉，将李汉俊、詹大悲、詹的秘书危洪生捕至公安局，未经审讯，即擅行枪杀。其兄书城知道他们被捕消息后，即时往见程潜，程潜即时打电话给卫戍司令部，电话已不通，遂派其秘书长李某到卫戍司令部去交涉，但市街已戒严，不能通行，在这时，李、詹两先生即被害，以后几天危洪生亦被枪杀。以后武汉工人、农民、学生、妇女被以共产党“罪名”诬杀的不下数百人，武汉人称胡、陶为屠户。杀李、詹两人的第二天，武汉卫戍司令部又派人捕捉孔庚、李书城，软禁在卫戍司令部楼上，派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某（参谋长非袁济安）监视，经过一百多天才释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北省党和政府照烈士抚恤其家族。

再，李祖敬是安陆县人，不是李汉俊而是另一个人。汉俊安葬时，是我任湖北建设厅长时期，在武昌安葬的，不是省葬，也不是在张岳军主持省政府时安葬的^⑤。

以上就寄来的提纲，以我所知的加以补充和更正。有些材料是包惠僧先生前几年写给我的，^⑥他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上海建党时的共产党员。此致
敬礼

弟李书城启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二日

注释：

- ① 李书城是李汉俊的长兄。他早年留日，创办《湖北学生界》，参加了拒俄运动。回国后，在武昌进行革命活动，曾应黄兴之邀与吴禄贞赴长沙筹划起义。一九〇四年，他再度赴日留学，于东京参加发起同盟会，在陆军学生会员中组织“丈夫团”。武昌起义时任黄兴的总参谋长。中华民国成立后，任总统府军事秘书、南京留守府总参议等职。以后参加了讨袁及护法之役。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在北京发动“首都革命”后，他担任陆军总长。大革命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顾问并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七年清党时即脱离，此后被软禁，一度消极，开始学佛。一九二九年运动唐生智、阎锡山、冯玉祥联合讨蒋。一九三二年后又回湖北省任职。解放前夕，他仆仆于河南、湖南、湖北，对两湖地区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解放后，李书城曾任农业部长，并是全国人大及全国政协的常委。一九六五年八月逝世。
- ② 此信及注释由李书城的夫人薛文淑提供。觉明即原北京市文史馆馆员华觉明，已故。
- ③ 党的“一大”开会期间，李书城正在湖北主持倒军阀王占元的运动，不在上海，因此有些“一大”的情况不尽了解，而薛文淑当时就住在楼上。据她回忆，李书城和李汉俊的住室都在楼上，楼下是用餐的地方，“一大”的头几天会议就是在楼下开的。
- ④ 原来邓演达要郭沫若同志担任教育科长，但郭坚辞不干，遂推荐了李汉俊任此职。当时的教育科长还要管文化、宣传工作。
- ⑤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湖北省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李书城（当时又重任建设厅长）与孔庚联名提出抚恤前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李汉俊、兼财政厅长詹大悲遗属的议案。当时夏斗寅是省政府主席，因夏在护法战争时是李书城的部下，所以就决议同意了安葬李、詹二人（参见《湖北省政府公报》）。
- ⑥ 包惠僧曾于一九五八年寄给李书城一份他亲写的《怀念李汉俊》的材料。

关于瞿秋白烈士的资料

编者按：瞿秋白同志，是我党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一九四五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其作出了正确的评价。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掀起了“讨瞿”恶浪，给瞿秋白同志强加了“叛徒”等罪名。然而，历史是公正的，经党中央决定，恢复了瞿秋白同志的名誉。

曾任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六师师长的宋希濂先生及当年该师“特种军法会审庭”书记官高春林，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写出了瞿秋白烈士被捕和就义前后的经过。由于事隔多年，记忆难免有出入。现予发表，供参考。

瞿秋白烈士被捕和就义经过

宋 希 濂

（全国政协常委）

一九三四年，我任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六师师长，九月二十七日和红军作战中负了伤，送医院治疗，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才

回到长汀三十六师师部。

我回来时，瞿秋白先生已经被捕，从上杭送到长汀十多天了，这里将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先生被捕到就义的情况记叙如下：

一、被捕经过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部队离开江西根据地，进行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但仍留下了一部分力量于赣闽边区，继续从事游击战争，以牵制蒋军兵力。三十六师是于一九三四年十月继白衣洋岭战役后经河田进入长汀的。一九三五年二月间第十师他调，汤恩伯以纵队司令的名义指挥第四、第八十九两师及另外的一个师加上别动总队及江西保安团等，到了瑞金、会昌一带。约在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汤恩伯打电报通知三十六师，说有共军约七、八千人，归项英、陈毅统率，在瑞金、会昌、长汀间地区活动。说他奉委员长（蒋介石）命令，负责迅速肃清这股共军。他们到了那里不久，汤恩伯便从瑞金方面发动了进攻，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还有空军的帮助，逐步向赣闽边境的红军压迫，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和反击，伤亡颇大。由于兵力过于悬殊，项、陈两将军立即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依据当时的情况推断，红军大约主要是分成三部分分头突围。向东走的一部约一千多人，被三十六师一〇八旅所截击，陷入包围中，经过战斗，被解除了武装。从俘虏的口供中，得知红军的主力部队向西走，另有一部三百余人早先向上杭方面去了，在这三百多人中，有瞿秋白先生在内。钟彬旅长立即将此情况电报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师参谋长向贤矩根据这个情报急电报告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当时在上杭并无正规部队，只驻有福建省政府所属的保安团

（团长姓名，我记不起来了），蒋鼎文立电该团严密清查瞿秋白的下落。在此之前向上杭方面走的红军三百多人，已被该保安团所截俘，内中有二十余人，经该团查明是红军干部，寄押于上杭县政府的监狱里，瞿秋白先生当时化名何琪祥，说是在红军部队中做医务工作的，即在其中。保安团接到蒋鼎文的电令后，一则感到他们的责任重大；一则觉得如能将瞿秋白清查出来，可以邀功邀赏，所以，十分卖力气来进行这一工作。他们先将所俘红军士兵三百余人再逐一查问，证实这些人中没有疑问后，便肯定瞿秋白先生是在那二十多人中，于是进行个别审问，一次，两次，……仍然没有人供认，遂使用严刑拷打和“谁说出来就释放谁”的双管齐下的办法，结果其中有一个人经不起革命的考验而变节了，供出了何琪祥就是瞿秋白。蒋鼎文接保安第十团查出了瞿秋白的电报后，即命该团将瞿秋白解送到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听说该团派了一个连押送，三十六师还派了队伍到中途去接。

我经过很长时间的回忆，对于秋白先生被捕的日期和送到长汀的日期，始终难以明确，送到长汀的日期，可能为五月上旬或中旬。

二、秋白先生在长汀的生活和思想情况

三十六师司令部住在长汀靠西头路南的一栋中等地主所谓缙绅之家。进大门有一个小天井，靠左手边有一间厢房，长约一丈一尺左右，宽约七、八尺，门向南，窗子向西，室内有一张中国式的床，安置在东边靠着墙，一张书桌安置在西边靠着窗户，一个洗脸架安置在北头，还有一把木椅和一条板凳，秋白先生自到长汀那天起到就义止，就是住在这间屋子里。在瞿先生正对面

的一间厢房，住着一个副官和几名警卫，他们负着双重任务——监视和照料生活。中间是堂屋，不怎么大，空无所有。进里面就是所谓正房，左右各一间，两边还有几间厢房，我和向贤矩及秘书、侍从副官、卫士等住在这里。其他各处（如参谋处、副官处等）则住在后院和附近的一些民房里。

秋白先生原来穿什么衣服，我不清楚，我见到他时，他是穿着一件灰色夹布长袍，一双浅口的布鞋和蓝色线袜。

秋白先生每天除了刻图章或有时和人谈话以外，大部分时间便是写写感想和做诗，有时也谈谈古文和唐诗（当时在长汀，也找不到其他的书）。大约是一百张（或六十张）十行纸订成的一个本子，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瞿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用毛笔写了一长篇《多余的话》和一些诗词。这个本子，他托向贤矩代为寄交某人，秋白先生就义后，向贤矩曾交给我看，我只是粗枝大叶地看了一遍就交还他，没有认真研究，所以对于内容记不起来了。

据秋白先生说，他因健康情况不大好，所以没有随红军主力部队北上，原打算转到上海去疗养，不料在上杭被捕了。他在长汀一个多月，没有生过大病，但常有些咳嗽及头晕的情形。他身躯颇为单薄，脸部显得清瘦。

关于秋白先生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情况，向贤矩和他接触较多，可能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得多些，可惜向贤矩去世了。

我和秋白先生只谈过一次话，由于自己当时的反动立场，对真理和是非没有正确的认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彼此间意见是完全对立的。记得我回到长汀后的第三天，我到秋白先生室内去看他，先谈了一些生活情形和他的身体情况后，转而谈到政治问题。

我说：“我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的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是在农村里生长的，当了多年军人，走过许多地方，有五百亩地以上的地主，在每一个县里，都是为数甚微，没收这样几个地主的土地，能解决什么问题？至于为数较多，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大多都是祖先几代辛勤劳动积蓄起几个钱，才逐步购置一些田，成为小地主，他们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里的资本家比较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向这样的一些小地主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因此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

秋白先生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这是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但中山先生所标榜的三民主义，把中外的学说都吸收一些，实际上是一个杂货摊，是一种不彻底的革命。中山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都市里，对于中国的社会情形，尤其是农村情况，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过。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资本家或是小资本家，他们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呢？显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秋白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说了许多的话，我记不完全，只能概述当时他所说的大意。

接着秋白先生又说：“宋先生，你一路上看到有些地方人烟

稀少，田地荒芜的情形，当然是事实。但是不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弄得劳动力减少了，有土地没有人耕种呢？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为了保卫苏区，有许多壮年人参加红军或地方武装，使农村劳动力受到一些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你们对我们施行严密的封锁，苏区的经济完全靠发展生产来自给，在你们未向我们进攻以前，这些地方的田地并无荒废的情形，你们来了，老百姓逃跑了，土地无人耕种，所以显得荒凉，我想主要的是这个原因。至于一些房舍被毁坏，恐怕大部分是由于战争所造成。”

我和他进行了争论，争论的详细情形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最后我曾说过这样几句话：“根据江西省政府最近的调查报告，说自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在南昌暴动起，随后在农村搞分田运动，一直到共军退出江西根据地，仅七年的时间，江西省人口减少了八百万，我过去读历史，说黄巢杀人八百万，感到寒慄，今天你们搞阶级斗争，更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秋白先生对江西省政府的调查报告，表示怀疑，认为是有意夸大数字，借此来诬蔑共产党。同时秋白先生又说，在激烈的阶级斗争过程中，人员的死亡和人口的减少，是免不了的，造成这种情形，主要是要由国民党负责，因为国民党先后调集了百万以上的军队来围攻我们。

以上是我和秋白先生谈话的大概情形。

三、就义情形

蒋介石得悉拘捕了瞿秋白的消息后，即令国民党中统局派了

两个人（编者：即中统局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叛徒陈建中）由南京赶来长汀和秋白先生谈话，想劝秋白先生背叛共产党，并交出共产党内部的组织情况，但一点没有达到目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初，我接到驻南京办事处的电报，说本师有调动的消息。瞿秋白的问题如何处理？是需要及早解决的。因此，我分别打了一个电报给蒋介石和蒋鼎文，请示如何处理？我好像记得发给蒋鼎文的电报里，还谈到如送去漳州，怎样解决路上的安全问题。以后听说蒋鼎文也有电报向蒋介石请示。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我先后接到蒋介石和蒋鼎文均是“限即刻到”的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当天晚上我和向贤矩及政训处长蒋先启、特务连长余冰研究了执行这个命令的具体措施。商定：六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在中山公园枪决；在司令部通往中山公园的路上及中山公园的周围，均由警卫连严密警戒，禁止老百姓观看；十八日晨早餐后，由向贤矩将蒋介石的电令交瞿秋白看；由蒋先启随伴瞿秋白前往中山公园，并负责监督执行。

六月十八日早晨八点多钟，在警戒方面部署妥当后，向贤矩进入秋白先生室内，将蒋介石的电报交秋白先生看，据向贤矩告诉我，瞿先生看了后，面色没有一点变化，若无其事。九时许，我和司令部的大部分干部，共约一百多人，都先后自发地走到堂屋里来了，九时二十分左右，秋白先生在蒋先启的陪伴下走出他住了一个多月的小房间，仰面向我们这些人看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地走出大门。时间只是一刹那，但秋白先生这种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使我们这些人既震惊，又感动，默默离开了那间堂屋。

由司令部走到中山公园，只有六、七百步，这个公园占地不大，环绕一圈，不过两里多，周围有些树木，中间有一小运动场，靠东边有一个用土砖砌成的讲台，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建筑，亭台楼阁的点缀，这里是一点也没有的。

秋白先生在蒋先启的陪同下，来到公园，在那座讲台的前面停下来，当时除周围担任警戒的士兵外，在场的仅有特务连官兵三十余人。

执行后，蒋先启回到司令部向我和向贤矩报告执行情况，说秋白先生到了公园后，向在场的人作了十多分钟的讲演，主要是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是要实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界，使人人都能过美好幸福的生活。他相信这个理想迟早一定会实现，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定会胜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最后一定会失败等语（大意如此）。秋白先生讲完后，举起右手，高呼：

打倒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据蒋先启说，当秋白先生喊完口号后，他便命令士兵开枪，结束了秋白先生的生命，时间约在十时左右。

将秋白先生处决后，我叫人买了一口棺材装殓，即埋葬在中山公园的旁侧。

在六月十八日下午，我将处决瞿秋白的情形，分电向蒋介石、蒋鼎文报告。

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文学家——瞿秋白先生，竟死于我之手，将我碎尸万段，亦不足以蔽吾之辜！解放初期，我

自认是必死之人，万万没有想到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对我进行耐心的教育，使我得以认识真理，明辨是非，把我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而且宽恕了我的罪行，给以重新做人的机会，党之于我，真是恩深再造！

（一九六三年四月）

我所知道的瞿秋白烈士就义前后

高 春 林

解放前，我曾在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军法处供职，参加过审讯及宣判杀害瞿秋白烈士，因此了解他始自被俘及至刑场就义的全部过程。

瞿秋白被捕，身份暴露后，被押解到三十六师军法处。伪师部决定组织特种军法会审庭审理。并指定：军法处长吴淞涛任审判长，参谋处第二课长张翼扬，副官处少校副官陈定二人任审判官，我任书记官组织之。

关于开庭审讯瞿秋白，在伪三十六师内部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因此，参加旁听的官兵，开庭前就挤满了法庭的四周。我还记得，当秋白烈士被押解入庭时，挺身站立庭中，态度极为从容。当吴淞涛询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时，秋白答：何琪祥，年三十六岁，职业医生。继问有无其他姓名？秋白不承认有其他姓名，更不承认就是瞿秋白。吴淞涛当即呼提一人出庭（即叛徒，其姓名忘记，听说话是长汀附近口音），其脸圆，身材矮胖，当

时年约四十岁，系工农民主政府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勤杂人员。他被押进法庭立于秋白左侧。吴淞涛照例询问叛徒姓名、年龄、籍贯以后，就问秋白：“你认识他么？”秋白答复：“不认识”。吴淞涛再问叛徒：“你认识他么？”叛徒答：“他就是瞿秋白。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教育文化委员会委员。”吴淞涛进一步问：“没有认错人吧？”叛徒答：“没有认错。”于是吴淞涛转而问秋白：“你听到没有？还有什么说的么？”秋白剝切地说：“事已至此，没有什么可说的！”此时，张翼扬插问：“你们闯入水口镇干什么？”秋白告之因有肺病，想经水口镇突围赴漳州转上海就医。不料经过封锁线，众寡不敌被俘。吴淞涛随即征询张翼扬和陈定两审判官意见后，指示我当庭宣读笔录，如被告等认为无误命盖指印。事毕，吴宣布退庭，被告等还押。

当时审讯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何琪祥是否即瞿秋白，事经叛徒指证，并经瞿秋白认可以后，事已大白。吴淞涛、张翼扬、陈定等退庭后，立即向师参谋长向贤矩、师长宋希濂汇报。宋指示电报南京伪军委会请示处理。

此时，伪师以优待俘虏为名，将秋白调迁到单人监房，专派了湖南籍的副官蒋昌宜和江苏泰兴籍的上尉军医陈志刚去管理秋白的生活供应及保健事宜。在秋白同志移住单人监房的下午，我随师属处长级官员四、五人，曾去探看他。这间监房约十几平方。房门之侧有木质花格窗两扇，窗可透光，但其余三面都是砖墙，相当阴湿。屋之中央偏后置床。被褥用具均秋白随身之物，床头有一柜放置洗脸用具，皮箱一只放于床之一端。靠窗置三抽桌一张，木靠椅两张，组成了秋白最后读书的场所。伪处级官员由吴淞涛领进屋里后，分别向秋白作了介绍，并由副官处长龙莹介绍

了蒋昌宜、陈志刚的姓名，并假殷勤地问寒问暖，告诉秋白：凡关生活上的需要，请向蒋昌宜提出，并要保健医生陈志刚：“要随侍瞿先生左右。”究其实际，都是监视人员。秋白当时只提借《诗经》，并淡淡地说：“我生活上不需要什么！”在秋白冷漠的态度下，谈话就尴尬的结束了。

这间单人监房的门外，是一片狭长空地，为伪师部占用长汀文庙的一死角，很少人往来。空地两端都设有武装监视哨。秋白只可在院子里散步。据陈志刚谈：秋白终日读书不倦，因有肺病，健康情况欠佳。陈志刚还告诉我：秋白甚喜金石篆刻，有时用残余蜡烛捏成印章坯子，用小刀刻章。瞿曾篆刻了一枚名章送给他，字迹古雅可爱。我听说后，也曾求请秋白为我刻制“江平”蜡章，以供玩赏。后来在抗战中遗失，至今深感遗憾。

伪师请示电报去后不久，南京派了两个特务到长汀。当时由宋希濂、向贤矩陪同在会客室（实即师长办公室）与瞿秋白谈过一次话。事后、伪师秘书余寿湘向我们谈：特务谈话的目的，意在诱降。其内容以“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为理论依据，而秋白则强调马列主义可以解放全人类。余寿湘还对我们说：“宋希濂抱有怜惜人才之意，建议将秋白解送南京处理。而南京派来的特务则加以劝阻，告宋不必作此建议，并说建议也无用”。

瞿秋白烈士的《多余的话》，就是在这次与南京派来的特务对话以后写的。市上曾印行的《多余的话》的版本，是根据伪三十六师抄报南京的抄本。至于当时南京有无删改，没有见到印行本查对过。可惜，《多余的话》的原件，系我保存在档案内，档案在抗战前保存在南京三牌楼马标营房（即三十六师的南京留守处）；因南京抗战失守，档案也遗失了。

一九三五年六月，南京批准对瞿秋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指示伪师在执行后，拍制正、侧面照片各一帧报备。伪师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开庭宣判，由审判长吴淞涛和我两人出席。当吴淞涛当庭向瞿秋白宣读判决瞿的死刑的布告以后，询问秋白：“如对家庭有遗嘱，可以当庭书写。”秋白泰然作答“没有。”于是吴淞涛命我宣读“宣判笔录”后，即宣布“将‘被告’瞿秋白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此时，照应秋白日常生活的副官蒋昌宜，因与秋白相处多日，不免抱有同情心。他上前向秋白劝酒，秋白拒不喝酒；经蒋力劝，秋白勉强喝了一点后，就主动向庭外走去，卫兵班长在旁押行，伪师的特务连当时夹道戒严，持枪实弹如临大敌，队伍前列有号兵一班吹号前进，最后有一个凶相毕露的“监斩官”陈定骑着白马尾随押队。秋白行至大街中段，看见一个瞎眼乞丐蹒跚路中，秋白从其身旁走过并转身回顾良久，目睹者无不为之泪流。

秋白走至中山公园亭前，大声问：“这里可以么？”不等伪军表态就高呼：“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盘坐于草坪，从容就义。当时，我挤在围观的人群之中，闻枪声几响不忍正视。

（一九八〇年八月）